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5-0003-07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笔谈)

[编者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走势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以2015年为界,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经历了以供给学派为主,转向偏重凯恩斯主义的微妙变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针对这个问题,西南财经大学赵磊研究员组织部分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对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是耶?非耶?留待公议。在学术上我党主张百家争鸣,本刊不持立场。

[关键词]新常态;发展模式;透支消费;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1

西方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

吴宣恭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走势日趋明显,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7%,为25年来最低水平。我国经济总量庞大,在经历几十年连续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放缓也属正常,对GDP的回落不必过于担忧。问题在于,这轮经济衰退却是由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的:外贸出口受自身竞争力下降和国际经济不景气所累增速遽降,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众多社会矛盾凸显,国内消费水平徘徊不前,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技术创新力量不足,房地产泡沫持续虚高不下,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活跃而实体经济资金紧缺,投资规模缩减且回报率不断降低,就业压力沉重,加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市场欺诈、道德沉沦,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些对今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如不加以缓释或解决,经济增速还可能进一步减退。令人遗憾的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一些建议和措施,很难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经济日趋恶化的局面。

比如,有些学者漠视我国确实存在生产迅速增长与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看不到内需不振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导致的人民收入下降,而将扩大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大规模城镇化上。殊不知,城镇化是一个依托于产业化发展的自然过程,如果只靠行政支持,缺乏必需的产业聚集,是无法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故大众收入和消费水平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如大量农民失去生存所依赖的土地、“城市病”丛生等。

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就业压力增大,保就业就上升为当前的要务。已见的解决建议之一是,避开国家大规模投资,以融资支持、税收减免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但是,小微企业多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范围小,竞争力微弱,抗风险能力差,存活周期短,倒闭率和失业率偏高;更何况,依靠小微企业只能解决少数人一时的温饱,无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使我国屹立于世界经济强国

[收稿日期]2015-06-28

[作者简介]吴宣恭(1930—),男,福建省晋江市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赵磊(1957—),男,黑龙江省伊兰县人,西南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戚桂锋(1972—),男,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讲师,博士,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叶劲松(1954—),男,重庆市璧山县人,四川化工高级技工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之林。解决建议之二是,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我创造就业机会。发动和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应是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化活动。因为个人势单力薄,缺乏必需的技术设备,所办企业绝大多数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不能掌握核心资源,无法在社会上形成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多沦为小微企业。

大量和惯用的建议是利用私有制的积极性去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但是,一些具体的措施会引发更多的矛盾,诸如实行“非禁即入”,广泛开放过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必将削弱国家对重要行业和产品的控制力,同时会减少国家的收入;推行混合所有制、绩优企业首先上路,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和利益的流失,不利于加强政府的监管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鼓励私人经营原为非营利性事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明显增加病患的负担,损及民生福祉;推行政府购买私人经营的社会服务,势必增大政府开支,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放开私人资本组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其资本炒作的弊病将大于融资便利带来的益处,松弛国家对至关重要的金融命脉的控制,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至于为了支持私有企业而普遍降低其税负,更是慷公家之慨,助富人之私,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不符。

这些做法不仅会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部门,而且也会使国民经济的重要、关键部门与公共产品部门退出竞争性部门,实际上是全面实行“公退私进”“社退资进”,其后果是只见私、不见公。如此而行,私有制经济占据的地盘愈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愈大,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愈加剧烈,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愈加突出,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愈加严重,当前的经济难题就无法缓解,更遑论解决了。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人奉为圭臬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使用过的模式,那就是采取西方行之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如雇佣劳动制度和公司制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现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获取尽可能高的企业效率,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值,在少数人迅速暴富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会发挥作用,取得一定的成效。因为,在改革起步阶段,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人民群众普遍贫穷,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给予人们一点希望和好处,都能调动其积极性,使生产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使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我国是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在大大增长了的经济总量之上,凭借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利用自有的或国外的不可再生资源,继续高速发展,让人民过上

像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已经不是时代所允许的了。我国经济难题频出,社会矛盾丛生,充分表明这种发展模式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不更弦改辙就谈不上经济和社会的伟大振兴。这是因为:

第一,从资源供应看,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口第一大国迅速发展、普遍致富的需求。存量和产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历来都是世界各国争夺的最重要对象,竞争非常激烈。中国想要使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就需成几倍地发展生产,无论怎样强调资源节约使用,也要耗费比现在多出几倍的资源,这在国内显然无法实现充分供应。但是求助于国际市场,即使进口资源几倍涨价,要充分满足大量资源需求也困难重重。发达国家已经将一些重要资源视为禁脔(1990年G7就使用着全球能源的42.9%),决不会容忍中国与它们分享。某些美国议员不停地威胁要制裁中国对自然资源的争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资源贸易也有所忌惮。近年来,一些资源供应国被美国颠覆了,我国获得资源的途径被扰乱;有些国家则在美国的挑拨下,对我国在当地的开发采取不合作态度,中国企业屡受冲击;许多新兴国家也需要大量资源,迫切希望分得一杯羹。所以,我国如果继续坚持走这条道路,就要被迫加入一场巨大的资源争夺战,这对发达国家无异虎口拔牙,对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而言,可能触犯众怒,这些都不利于处理好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无助于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从制度和生产组织看,追随西方的发展道路,建立的是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所鼓励的是个人主义,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实行的是分散的经济行为,依靠的是不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少数人利用各种方式先富起来而多数人长期相对贫困,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继续这种发展方式,不能解决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也不能改变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发展悬殊的局面,更谈不上实现十几亿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三,从国际贸易看,我国的货物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有相当高的份额,国际市场无法继续支撑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发,复苏缓慢,正在进入相对低速发展时期,市场容量扩展有限,加之这些国家纷纷进行“再工业化”,影响了我国新兴产业产品的销路。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低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与我国抢占市场。在这种新常态下,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兴起,我国要保持目前的国际贸易份

额已成难事,遑论扩大。因此,依靠国外市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传统道路越走越窄了。

第四,从生态环境看,我国急促在约1/9的国土上谋求跃进式发展,而听任中部、西部广大地域长期闲置(或者是资源掠夺),从而造成沙石遍地、风尘漫天、河流干涸、植被退化,并且逐步危及东部地区。这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当前举国上下都看到这种灾害,开始想办法加以缓解。但是,如果不转换发展思路,采取根本措施,以往的办法只能治标,无法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更不能化害为利,将华夏神州改变为绿水青山、风和日丽的沃野,十几亿中国人民也就不能享有世界推崇的现代化生活。

所以,我国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终止这种非持续和非协同性的传统发展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亦即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多样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逐步消除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积极发挥国家组织经济的能力,充分利用巨大的人力资源和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大力开发可再生资源(而不仅是节约利用资源),尽力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完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改善生态、资源条件,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持续的腾飞。

早在1980年代,中国社科院农发所邓英淘研究员就深感传统的发展模式不适合大象一般的中国,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通过访问大量专家,以及同水利部门座谈、研究,提出了改变中国经济环境的重大设想:利用以风能发电为主提供的电力,将西南高原相当于几条黄河的丰富水源提升至一定高度,使其跨越横断山脉和巴颜克拉山脉,引流到西北和北方,灌溉辽阔的沙漠、戈壁和长期干旱地区,造出相当于我国现有可种植地的百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他称为“再造一个中国”),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包括生物能源、生化制品的其他现代产业,提供充足的能源、生产资料和食物、日用品,解决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大量进口粮食的问题,同时从养育森林和草原、涵养水土、改变中西部气候入手,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生态环境。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创新构思,既可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难题,又能造福子孙万代,使中华民族真正地实现和平崛起,因此可作为我国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试验形式或组成部分。

首先,它有利于解决当前许多难题,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产能过剩、生活消费不振、出口形势恶化、国外资源供应紧张、新增人口就业艰难、城市房价涨

势不止等。因为,西部调水造地主要是垦殖工程,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反而有助于消化积压产品;它纯粹是国内的自主行为,不依赖国外资源和市场,不与外国争利;它新造大片可用土地,能大规模提供建设和住宅用地,有利于各类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容易解决住房问题,抑制房价疯涨。

其次,我国之所以必须确定经济增长底线,最关键的是要保证必要的就业岗位,以维护社会稳定。西部改造工程能在广袤的地区开发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能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为劳动者提供极其广阔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收入,实现保增长和惠民生的根本目的。

再次,它能够真正地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多年来我国一直呼吁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总是难以实现,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拓宽视野,仍按传统的模式考虑问题,只在原来的产业结构中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整。西部调水造地的设想则高屋建瓴,是雄心壮志的改革,突破了旧的发展模式,从更高的层次上考虑国家的长远发展。实施这项工程,可能是全面改变我国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几十年来风沙肆虐北方,威胁京畿,我国也一直坚持固沙防沙活动,但成效小、成本大,有些地方还不得不节节后退,关键就在于缺水。水源不足,植被生物存活困难,更无法扩大繁殖面积。提调大量水源,灌溉沙漠、荒原,形成大片绿洲,改变地区气候,消除沙尘的根源,是根本改变北方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

最后,这个宏伟工程的实施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和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它规模宏大,建设周期长,无法由个人单打独斗,私人资本也将因利小而裹足不前,需要国家投入巨资和宏大的组织工作。最适合从事这种大型工程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该项工程建设过程中,公有制和集体组织将显现其独特的作用,也将通过实践探索出不同的有效形式。在千百万人共同缔造的新天地,必将出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平等互助、友好协作的大批新型劳动组织,消除因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西部调水造地工程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但决不是空想,凭借我国现有的条件,完全可以实现,理由是:

其一,我国具备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各种物质资料和技术。我国的风电、光伏产业,无论是在先进程度还是在制造能力上都居世界之首,产能严重过剩,因长年遭受欧美的关税制裁无法打开外销通道,

不如自己在西部使用,这样,在改造西部环境的同时,也可扶持风电、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举两得。近年来我国兴建了大批闻名于世的巨大水电站和输电体系,显示出我国强大的堤坝建设和水电系统建设能力;我国已在很短时间内建成了大量超长隧道和特大涵桥,表明我国拥有高超的隧道掘进工艺和涵桥建造技术。我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钢铁、水泥工业和建筑机械制造业,产能也严重过剩,这些在西部开发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总之,在西部建设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在物质技术上完全没有困难,而且有助于解决旧的发展模式无法解决的产能过剩问题。

其二,我国拥有不少建设这一工程的人力技术条件。我国具有长期治理江河的历史经验;拥有不少建校多年的水利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了大批水利专家和水利工作人员;长期进行治淮、治黄和南水北调工程,兴建了许多大型、巨型水利电力工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水利工程队伍。这些都充分说明,实施西部调水工程,我国在人力技术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其三,我国具有雄厚的财力,能为这一水利工程

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我国持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既在国外购买不到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科技器材,也收购不了良好的企业和矿山,只能用于购买日益贬值的美国国债。其实,这些外汇完全可以用来购买西部改造工程所需的普通的建设资源。2008年世界发生金融危机后,我国启动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现在同样可以再次进行大规模投资,让这项宏伟工程尽快上马。

其四,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潜力巨大的经济制度和号召力强大的政治组织,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发起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完全有力量动员和组织这场气吞山河的工程。

其五,中国人民具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改造自然、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思想支柱。红旗渠、大庆油田、“两弹一星”工程,都是依靠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在环境恶劣、设备简陋、器材不足条件下攻克的。只要拥有宏伟的目标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论多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条件,都阻挡不了我国向西部大开发进军的步伐。

意味深长的“透支消费”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表面上波澜不惊,甚至有趋于下行的压力。然而,“静如止水”的下面犹如“新常态”这个词所暗含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正在孕育着某种重大改变。在笔者看来,变化的看点,既不在于创新的层面(大数据、云计算、创客),也不在于结构的维度(大众创业、“互联网+”、“一带一路”、楼市股市),而在于政府对产能过剩的焦虑。最近,消费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其中蕴含着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变化,值得人们深思。

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会议指出,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有利于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升级。会议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将原在16个城市开展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信贷,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使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互补发展,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笔者建议,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要高度重视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其中的看点在于:发展消费金融由试点扩大至全国是一个创新。回溯历史,早在6年前,消费金融公司的横空出世就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创新”(严格说是模仿)为我们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

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样本。笔者6年前就曾撰文指出:“为了‘透支消费’,咱们政府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2009年5月12日,中国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8月1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择机成立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消费贷款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个人消费,以适应政府的扩大内需战略。’”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笔者当时做出了如下判断:“消费金融公司就是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

把储蓄率降成负数,这是对国人量入为出传统观念的公然挑战。说挑战有点夸张,因为《穷爸爸,富爸爸》早就给国人彻底洗脑,挑战的一方已经没有对手。如果横向比较,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看到消费金融公司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版的“次级贷款”。

与“激愤的价值判断”不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界和社会对“透支消费”一片讨伐之声,比如,“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对于“透支消费”的历史必然性,笔者给予了充分理解,而没有纠结于道德评价。有人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表示担忧,然而在笔者看来,不论你欢迎也好,忧虑也罢,“透支消费”在中国的展开是市场经济的宿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至于这个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主流经济学根本无法把握,因为它只能寓于马克思有关生产过剩的矛盾之中:其实,中国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推出消费金融公司,也是被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给逼出来的——既然不准“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让老百姓透支消费,你又怎样把越来越过剩的产品消化掉呢?

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将要发生某种转折的重大信号。中国终于要从“生产过剩”走上“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不过,中国这才刚上路,美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完了一个来回。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怪圈:一个“过剩”与“透支”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的怪圈。

6年前,当银监会在京、津、沪、蓉推出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之时,中国经济开启了从“生产过剩”走上“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6年后,当宣布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之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由“产能过剩”正式转向了“透支消费”的历史阶段。

这倒不是说“过剩”从此不再,而是说,因为“过剩”,所以必须“透支”。问题是:既然“过剩”,你就“使劲消费”好了,又何须“透支消费”呢?人们当然需要“消费”,“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马克思)。如此奇异的生产逻辑,若不想被“过剩”给憋死,你不“透支”,又何来“使劲消费”?

不论官方怎么定义新常态,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向”,才是新常态的本质定位所在。

中国经济:三种主义、两种前景与一个正确选择

戚桂锋

(中共山东省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部, 山东 济南 250021)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向新常态转变的阵痛期,只有站在“主义”的高度才能看清为何转变、向哪儿转变、怎样转变,从而科学界定和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常态。毋庸讳言,1990年代以来,站

在“主义”的高度审视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三种主义了。当前要破解中国经济改革难题,走出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的深水区,构建新常态,关键仍然在于

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种主义。

一是新自由主义。1980年代初,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它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倡导推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在政治和文化上主张去科学社会主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去共产党化,从而形成完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力量的推动下深刻改变了世界。从1990年代始,在内外颠覆势力的配合下,新自由主义被引入我国并严重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乃至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向着资本主义调整的重大演变,造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均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成为中国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

二是凯恩斯主义。1920年代末,适应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它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私企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化,其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国家这个理想总资本家的作用,把危机转嫁给老百姓,为资本家集团服务。然而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它根本不可能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之中,只能掩盖和造成更大的危机,最终还是靠二战转嫁了危机。2008年前后,受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被虚假包装的凯恩斯主义乘虚而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按照如上分析,凯恩斯主义不但不能解决还加剧了我国内需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为西方输送了利益,为新自由主义将国企彻底私有化提供了借口。

三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发表167年

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充分验证,社会主义国家如遵照该《宣言》进行建设和改革,就会取得巨大成功和成就;反之,则会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招致亡党亡国。当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改革,构建中国经济新常态,则问题和矛盾会迎刃而解。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转方式”,就是将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引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引导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调结构”,就是按照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以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抓手和切入点,以此带动分配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在扩大生产的条件下,实现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以发展中国经济。如此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问题就会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就会消除,中国经济就可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唯一正确的选择。随着经济基础的调整和巩固,上层建筑也会越来越牢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越来越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变成现实。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前途仍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种主义,如果任由西方忽悠,任由同属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误导中国改革,中国经济前景必将在黯淡中走向绝路,而在实践和比较中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则中国经济矛盾会迎刃而解,从而前途一片光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也会梦想成真!

从出口看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

叶劲松

(四川化工高级技工学校, 四川 成都 611130)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即内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时存在、时时起作用。这一矛盾既不能被掩盖,也不是靠顶层设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之类的话语就能压住的。这一

矛盾的尖锐化必将导致经济增长下滑乃至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中有充分表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贪婪、资

本间的竞争,会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会使劳动群众购买力增长受限(甚至负增长)。因此,由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生产增长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而放任自流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即放任资本家),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不安于缩减生产、不安于限制销售规模,而国内市场又不能容纳其生产能力,从而加强了资本主义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自由贸易、全球化等都只不过是掩饰资本主义内在深刻矛盾的说词。国外的苹果、三星就是这样。国内市场的容量越不能满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扩张行为便愈加不可遏制,它们企图在国内外销售的产品便越多。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出口,主要是出口换汇、进口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不是为了占据国外市场。因为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并实行计划经济,不会产生内需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原则上不需要通过大肆出口来解决因内需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可是,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国外市场的地方,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国内市场,这些地方已经被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所支配,所以,增加出口以占据国外市场的竞争也格外激烈。结果,各国资本主义企业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不断尖锐化。世界上一方大谈自由贸易、全球化,另一方则以高关税(现在更多是反倾销等)来对付——当然,也可能一方在大谈自由贸易时,又大搞反倾销。这些是争夺销售市场斗争不断尖锐化的表现。

中新网2015年6月8日电:“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消息……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97万亿元,下降9.7%。其中,出口1.17万亿元,下降2.8%……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9.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7.8%。其中,

出口5.4万亿元,增长0.8%;进口4.07万亿元,下降17.2%;贸易顺差1.33万亿元,扩大2倍。”这既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也显示了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销售市场斗争的尖锐化,尤其在欧盟和日本分别通过以欧元和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来增加出口以实现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015年前5个月,我国对欧盟出口8465.3亿元,下降2.2%;从欧盟进口5233.3亿元,下降14.1%。同期,对日本出口3375.4亿元,下降11.3%;从日本进口3513.7亿元,下降11.2%。也就是说,我国从欧盟、日本的进口,以人民币计价均有较大下降。但考虑到欧元和日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稳定,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从2014年初到2015年初一年时间里跌幅超过20%,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100日元兑人民币已经从7.5元下跌至现在的5元,跌幅超过30%),如以欧元或日元计价,我国从欧盟、日本的进口实际上有小幅增长,即我国对欧盟、日本的出口以本币计价有所下降,欧盟、日本对华出口以各自本币计价是略有增长。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几个月的出口情况不太好并不表明以后出口就一直不太好。是的,以后出口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在西方竞相扩大出口以缓解生产过剩的上百年历史中,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摆脱了生产过剩危机?没有!因此,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企图用加大出口来摆脱生产过剩危机,注定要失败。资本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生产过剩危机,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仅仅依靠“顶层设计”是不能消灭其生产过剩危机的(最多只能延缓这种危机),当年“马歇尔计划”带动的出口未能消灭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同理,我国的一系列出口战略在各国资本主义企业争夺国内外市场日趋尖锐的背景下也不能达到消化我国生产过剩的目的,唯有扩大内需,才是根本出路。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10-07

马克思“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诞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深度耕读

王建锋

(洛阳师范学院 马列理论教研部, 河南 洛阳 471022)

[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诞生地。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及国家哲学的三重批判,为其“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马克思通过宗教批判,揭示了宗教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深层意识形态关联,强调只有实践地破除宗教幻象及其对现实的人的思想制约和意识禁锢,才能引导人们认清自身遭受奴役的现实根源;通过政治批判揭示了使得现实的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获得新生的现实途径,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下,才能推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变,从而实现对旧世界的历史超越;通过哲学批判进一步揭示了颠倒的意识与颠倒的社会存在之间的本质关联,提出只有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双重解放。

[关键词]现实的人;社会批判;人的解放;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2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一文中,通过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及国家哲学深刻而又彻底的批判,初步确立了其“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社会批判和人的自由解放理论所关注的核心,“现实的人”既是马克思新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整个社会革命学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代社会,对“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产生的重要文献《导言》一文重新作深度耕读,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理论认识,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现实的人”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逻辑。

一、宗教意识批判:“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奠基

作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及宗教意识批判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和“现实

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奠基的基本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对“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颠倒的、虚幻的反映和认识,宗教及宗教意识一方面体现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较为客观地揭示了“现实的人”的生存困境。仅靠宗教所诉求的道德理想是无法实现“现实的人”追求其幸福生活的价值目标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教总是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宗教及宗教意识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困境产生、存在的总体现和总依据。“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要,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1](P1-2)}由此可见,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宗教及宗教意识既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工具,也是“现实的人”对自身无奈的现实生活与生存困境的真实反映。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

[收稿日期]2015-08-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CZX060)

[作者简介]王建锋(1970—),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洛阳师范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哲学、伦理学基本理论及应用。

要改变“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及其生存困境,首先就必须对禁锢人们思想认识活动的宗教及宗教意识进行批判,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重新确立“现实的人”作为历史活动者的主体地位,也才有可能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宗教及宗教意识的真正本质。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事实和理论认知,在《导言》一开始,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是其他一切社会批判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

对宗教及宗教意识进行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理论关照。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物。虽然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还没有明确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思想,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人本主义的观点,来阐述自己对“现实的人”深刻而真挚的洞见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曾经在天国幻想的现实性中去寻找超人,而找到的结果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可能在他正在寻找或应该寻找自己现实性的地方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了。^{[1](P1)}这就是说,作为历史活动的真正主体,“现实的人”是真实存在着的、且正从事着一定社会活动的现实个人,他们既是自身所享用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自身所享用的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换句话说,当且仅当每个人都处在其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并展现其作为“现实的人”活动的具体特性时,才有可能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历史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批判宗教及宗教意识最重要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1](P1)}。在他看来,宗教及宗教意识既是“现实的人”参与社会现实活动的产物,也是生活在这一现实困境中的“现实的人”对自身生活的精神慰藉和希望。因此,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乃是重新确立“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主体地位之必要而充分的理论准备。批判宗教意识和抛弃产生宗教现实处境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明显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完全不依赖宗教慰藉的新世界的真正诞生,才有可能合理的、幸福的“现实的人”的真实生活世界。

宗教及宗教意识里所呈现的痛苦和灾难,既是“现实的人”在其现实生存困境中的重要表现,更是他们在精神活动层面对这种现实中的苦难的苍白无力的抗议和斗争。在马克思看来,要改变“现实的人”现实生活的生存境况,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

思想观念上废除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鸦片,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德国落后社会制度的批判。因此,只有深入开展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才有可能使“现实的人”从此不再对宗教所宣扬的虚幻的、颠倒的社会状况存有幻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正是要撕碎锁链上虚幻的花朵,而不是要人们仍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对宗教批判最终有可能使“现实的人”能够围绕自身和自身现实生活的太阳转动。^{[1](P2)}换言之,马克思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深刻批判,其真实目的乃在于重新确立、重新发现“现实的人”及其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价值和地位。“现实的人”及其现实幸福生活的实现,必须诉诸“现实的人”及其具体的历史活动,而不是依赖虚幻的宗教及宗教意识本身。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进而认为,宗教及宗教意识只是人们头脑中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他自身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人而转动。^{[1](P2)}概而言之,作为“现实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产物,宗教及宗教意识一方面体现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性以及对理想幸福生活的期盼;另一方面也客观反映了“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真实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要改变这种现实的生存困境,实现“现实的人”的现实幸福,不仅要废除反映人们虚幻幸福的宗教及宗教意识,更要抛弃、改变产生这种虚幻幸福生活的实际处境,而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理论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产生这种苦难的实际处境所进行的理论批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P2)}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指的就是宗教及宗教意识里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虚幻反映和颠倒的错误认识。这种虚幻的、颠倒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恰恰就是对尘世的、“现实的人”的存在状况及其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因此,要改变尘世的、“现实的人”的现实困境,既要产生这种状况的宗教及宗教意识进行批判,更要对产生这种现实状况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及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进而重新确立“现实的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是遵循这样的理论进路,马克思认为,“彼岸世界的真理”被拆穿以后,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重构“此岸世

界的真理”。“此岸世界真理”历史任务的确立,在其必然性上,使对宗教的理论批判过渡到对产生这种苦难实际处境的实践批判。于是,在逻辑的理论维度上,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论批判就演变成了对法哲学的理论批判;在逻辑的历史维度上,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论批判就演变成了对德国现实政治制度的批判。但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无疑成了所有批判得以进行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的哲学基础。

二、政治制度批判:“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确立的历史依据

宗教及宗教意识批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作了奠基。但宗教及宗教意识批判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撕碎了禁锢人们认识和活动能力锁链上的“虚构的花朵”,其在现实性上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剪断禁锢在人们身上的真正锁链。在马克思看来,要改变“现实的人”现实的生存处境,彻底剪断禁锢人们精神活动的锁链并“采摘新鲜的花朵”,就必须把批判的逻辑从宗教及神学转向社会政治制度领域。这是因为,宗教及宗教意识是人的本质在其幻想中的实现,当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现实性的时候,反对宗教的斗争及形式,就直接地表现为集中反对以宗教及宗教意识为精神抚慰特征的世界的斗争和形式。^{[1](P2)}正是如此,对德国落后社会状况的政治制度的批判,不但更富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是愈加深入的批判之必然要求。

对德国政治制度进行批判以前,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德国社会的现状及当时德国社会在欧洲所处的历史地位。“如果从德国社会现状本身出发的话,即使采取唯一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1](P3)}在这里,马克思之所以用“时代错乱”这一尖锐、犀利的词语来界定当时德国的社会现状,依据的正是当时德国真实的社会现实:虽然在思想领域里有了一个历史的运动,但在整个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历史水平。“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事实了。”^{[1](P3)}马克思这一尖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理论批判,充分表明了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真实的社会状况: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相比,德国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没有同欧洲其他国家一道经历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革命行动,相反,它却同欧洲其他国家一道经历了社会复

辟。这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当时德国社会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真实状况。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政治制度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国的统治者害怕革命;二是先进国家的社会革命受到了各国反革命势力的迫害。与整个欧洲现代国家的社会革命状况相比,德国的社会革命仅仅在思想领域里有一定的历史变动。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埋葬的那一天。”^{[1](P3)}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肯定了德国社会革命在思想领域里变动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德国思想领域里的历史变动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性分析。那些具有德意志狂血统并自诩有自由思想的人,却让德国人到史前的原始森林中去寻找自由的历史。如果德国人自由的历史只能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找的话,那么德国人自由的历史和野猪自由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1](P4)}由此可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了人类在创造自己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深化了对“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的理解。马克思这一富有新人本主义思想的真知灼见,无疑具有深刻的、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显然,如果要实现人类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目的,就必须对产生这种落后状况的政治制度进行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虽然低于欧洲多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水平,但它依然应当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水平的罪犯,依然应当是刽子手行刑的对象一样。^{[1](P4)}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之所以把德国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社会理论批判的对象,其目的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批判德国社会的现实及其真实的历史存在形态,所以,批判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1](P4)}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德国政治制度的无情批判和深刻揭露,才能使受这种制度压迫的“现实的人”认识到压迫的存在,进而唤醒他们追求自身生存的目的、勇气和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让德国人不再有一时片刻地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1](P5)}。由此观之,这一见解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恰好表明了马克思对德国政治制度无情批判的根本旨趣,其真实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批

判,而是要通过这一理论批判,让“现实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变革自身现实生存困境的正当性、合理性。马克思认为,要彻底改变德国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时代错乱”,让受压迫的“现实的人”认识到压迫的存在,使他们彻底明白德国社会状况对其生存困境所带来的沉重性,就必须对产生这种历史状况的政治制度进行猛烈的、无情的批判。换言之,只有对德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批判,才有可能实现德国人民不可抗拒的、追求自身现实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

总之,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之所以要对德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它既是德国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公开完成和具体表现,更是现代国家最隐蔽的缺陷。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现实的人”追求自身现实幸福生活的目标,就必须对产生“悲剧性”现状的德国政治制度进行批判。而同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过去作斗争;在欧洲各国已经历过自己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重复着他们自己的悲剧。^{[1](P5)}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批判德国政治制度对欧洲其他现代国家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指出了“现实的人”未来历史活动的可能状况。“历史是认真的,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1](P6)}这表明,马克思对德国政治制度无情批判的真实目的,乃是为“现实的人”的幸福生活奠基,为之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现实依据和历史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一旦现代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那么,批判本身就不仅超出了德国的社会状况,而且也真正使其提高到了时代的高度。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德国社会的现状来说,单个人的解放和发展与整个国家的解放和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批判德国政治制度,既是为了整个德国社会的普遍解放和发展,也是为了每一个正在从事着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的普遍解放和发展。

三、哲学思想批判:“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确立的理论武器

在马克思看来,要解决德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改变德国政治制度所造成的时代性错误,寻找对德国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切入点,仅靠揭露德国社会不公正的历史状况是不够的。为了把批判引向深

入,就必须对德国哲学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与反思。这是因为,与欧洲多国在现实中经历了自己真实的历史过程相比,德国人仅仅在思想活动中经历了他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及历史活动。“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1](P7)}这就是说,要解决德国式问题,探索德国式问题解决的真正出路,就必须对反映这一问题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批判与清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继德国政治制度批判之后,马克思又把批判的重心转向了对德国国家哲学思想的批判。“当我们不批判历史未完成的著作,而批判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批判就恰好触及到了当代社会问题的中心。”^{[1](P7)}这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与德国社会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不相符合的国家哲学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德国现实政治制度的理论批判。

德国的国家哲学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对象,其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不仅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而且是唯一正式的、与当代欧洲社会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正因为如此,要使人民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社会活动成为现实,就必须对阻碍“现实的人”及其幸福生活得以实现的德国政治制度及反映这种政治制度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德国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现实的国家、法律、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观念上的国家、法律、制度的直接实现。观念上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对现实制度的直接否定。^{[1](P8)}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如实地指出了德国社会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德国社会在面对这种历史现实时的思想状况。在肯定德国实践政治派对国家哲学否定的正当性的同时,马克思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们理论本身的缺陷——他们没有看到“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中萌生的”,因此,“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P16)}。

在批判实践政治派缺陷的同时,马克思也对理论政治派的缺陷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政治派虽对敌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却对自身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他们不仅忽视了哲学思想本身就来源于现实世界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搁置了哲学思想本身也是对现实世界在观念上的反映、补充的事实。正是这样,理论政治派要么从哲学的一般前提出发,要么把从其他学科得出来的结论不加任何反思地直接作为哲学的一般要求和结论来使

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理论政治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对德国现实世界的批判,仅停留在思想领域,严重忽视了德国社会的现状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在他们看来,不把哲学反映的理论应用到现实中去,就能使哲学思想所反映的理论直接化为现实。但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此岸世界的真理”,就必须从此岸世界出发,对此岸世界的历史状况及反映此岸世界历史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因此,只有通过对此岸世界的历史状况及反映“此岸世界真理”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才有可能真正改变“现实的人”的生活处境,进而重新确立他们作为历史活动者的主体地位,并以此来恢复“现实的人”的真正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深刻的理论表述。^{[1](P9)}换句话说,黑格尔哲学以思辨的言说方式,完成了德国社会在观念层面上的、未来的历史活动。但在其现实性意义上,这种哲学思想所呈现的“历史”仍然是属于“彼岸世界的真理”,这与“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现实生活的生存处境是严重分离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必须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批判性的否定和否定性的批判。这既是对欧洲现代国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否定,更是对德国政治意识、法意识的整个存在形式的批判性否定和否定性批判。马克思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它现实的理想化仍然是属于“彼岸世界的真理”。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思想理论的产生,只是因为这些现代国家也置“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于不顾,或者说“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P9)}。显然,此时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方式还是黑格尔思辨哲学分析问题的方式,但毫无疑问的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处境的必要改变,而这就为其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作了重要理论奠基。

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德国国家哲学对欧洲其他现代国家历史发展及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如实地指出了德国国家哲学思想本身的理论缺陷。马克思认为,德国人在政治理论上思考了其他国家已经完成了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德国是这些国家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理论良心。但德国哲学思维本身的抽象与自大也总是与它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性之间保持着同步。^{[1](P9)}马克思这一批判性分析,充分表明了他对

德国政治制度及其国家哲学的理论批判有着深厚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马克思试图通过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批判,为“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提供某种精神性的引导力量。在他看来,要实现“彼岸世界的真理”向“此岸世界的真理”转换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对反映“彼岸世界真理”的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深度的理论批判,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对此岸世界的变革、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实践改造。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P10)}但毋庸置疑的是,反映社会进步的理论 and 思想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思想理论本身一旦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它就会转变成变革世界的物质性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P10)}由此观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了理论变革对改善“现实的人”现实生活状况及其现实生活处境的重要性,而且也揭示了变革“现实的人”的生存处境是他们历史活动实现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解放对德国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活动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彻底改变和颠覆一切奴役和压迫人民群众的社会关系。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如同德国过去的宗教改革是从僧侣的思想认识活动开始的一样,德国社会革命的变革也应当首先从哲学家的思想认识开始。“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P11)}换言之,彻底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被动的因素和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需要与变革这种现实状况相适应的哲学思想。这样,马克思对德国国家哲学的批判就实现了自身的飞跃:一方面,它使社会意识的神秘性在根本上被彻底打破;另一方面,它也使传统社会意识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地颠倒过来,从而使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解释,不再被归因为某种特殊的精神性存在。^[2]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德国国家哲学的深刻批判和强有力的理论解释,既阐明了精神活动对“现实的人”社会活动的意义,也阐明了物质基础变革对“现实的人”生存处境改变的优先性基础地位。

四、“现实的人”的普遍解放: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落脚点

任何形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都不是为批判而批判

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如此。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及国家哲学的三重批判,毫无疑问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最基本的命题,那就是“现实的人”的彻底自由与普遍解放。普遍的人的解放、彻底的社会变革,对整个德国人民来说,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从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出发所从事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解放和自由的社会活动。马克思认为,在德国,整个社会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就是每一“现实的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在德国,整个人民群众的普遍解放和自由是任何部分人民群众普遍解放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在德国,整个社会的普遍解放和自由,恰恰应当是由部分人民群众逐步解放、自由的不可能性而产生。^{[1](P14)}质言之,整个德国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必须依赖一个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这是因为,这个阶级是一个被彻底戴上锁链的阶级,对他们来说,这个社会领域自身并不会让他们享有任何特权,而只是求助于人们自身的社会权利。威胁这个社会领域的不是特殊的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求助任何历史的权利,而只是求助每一“现实个人”的权利,且最终形成一个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里解放出来的,并成为以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为自身神圣历史任务和责任的的社会领域。^{[1](P14)}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完全普遍性质”的社会领域的形成,才有可能使“现实的人”最终完全恢复到自身本身。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自身普遍自由的解放者,德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不断兴起的工业化运动才可以形成。这是因为,在德国,从本质上来说,组成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工业化活动所造成的。这一群体不是在历史进程的重压下被机械地挤压出来的,而是因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急骤解体,尤其是因中间等级这一群体的普遍解体而产生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这一群体来说,他们要使自己能够从这种制度的解体过程中完全恢复到自身本身,必须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公开否定来完成。迄今为止,无产阶级宣告世界制度的最终解体,只不过是如实地揭示了他们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制度最终解体的重要诱因。由此可见,德国无产阶级要改变自身生存、生活的现实处境,并最终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就必须彻底否定阻碍他们普遍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私有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德国,无产阶级之所以敢公开、彻底地否定私有财产,

那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把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原则的东西进一步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原则。因此,整个无产阶级最终的普遍解放和自由,是任何部分人民群众普遍解放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归根结底,他们是实现整个社会和自身彻底解放、自由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作为人类社会整个解放和自由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由此观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始终都是围绕“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改变来进行的,无论是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还是对德国国家制度及国家哲学的批判,都把“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观点,作为“现实的人”及其自由和解放理论思想奠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换言之,《导言》一文不仅赋予了无产阶级全新的历史地位,而且也赋予了无产阶级神圣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任务。在马克思看来,对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拥有的权利,就如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拥有的权利是一样的。^{[1](P16)}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就必须夺取国家政权的理论和思想,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指出了,如果无产阶级不摧毁一切束缚自身发展的奴役制,那么,任何一种形式的奴役制都不可能最终被彻底摧毁。这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不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他们就不可能承担起自身普遍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责任。马克思由此将“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结合起来,科学地创立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质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真相”。当然,这个“真相”还在发展,批判也必须继续下去。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示了无产阶级神圣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责任,由此一定程度上也为“现实的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提供了一条社会变革的途径和方式。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对“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的理论和思想作出深刻的阐述和分析,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解放和自由这一落脚点之上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深刻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开始对现代社会的政治进行哲学批判,而且也意味着他已经开始着手对现代国家学说及其现实的社会基础进行批判。^[3]换言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进行深刻理

论批判的同时,也迈出了为政治哲学奠基的重要一步。进一步说,就是把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归结于它们的现实基础。这样以来,马克思所面对的现实,就不是被思辨哲学所神秘化了的社会现实了,而是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非神圣化的社会现实,即世俗化的市民社会。与此同时,马克思所面对的人,也不是抽象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了,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现实化的人了。

概而言之,马克思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哲学的三重批判,都是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存环境来进行的。“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的现实环境,既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对象,也是这一批判理论得以展开、奠基的现实依据。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现实关怀,既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产生的理论旨趣,也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现实的人”之所以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是自然进化和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开端,因而也就成为了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前提和核心。^[4]当然,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可能还是

偏颇的而不是开阔的,是民族的而不是国际的,是德国的而不是整个欧洲的,更不是全世界的。甚至,《导言》通篇所用的语言、基调及所透视的问题也是德国式的,但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理论产生、发展的必然阶段。换言之,《导言》一文虽有完整社会批判理论视野的理论缺失,但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却首次完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理论的思想奠基,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疑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 姜迎春.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特点[J].江海学刊,2012(5):55.
- [3] 吴晓明.黑格尔法哲学与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J].天津社会科学,2014(1):22.
- [4]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观及其在理论上的创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6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17-05

科学事实的实验室建构根源探析

邱德胜

(西南大学哲学系, 重庆 400715)

[摘要]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科学事实是对事实的客观表述或直观呈现,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与价值无涉的。然而,兴起于西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实验室构建的研究结论与此大异其趣,指出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实验室建构科学事实的根源在于:实验室研究对象的非自然性、实验室研究目标的非真理性、实验室研究过程的与境偶然性、实验室研究结果的可能创新性。正是SSK对科学事实与科学论文建构过程的人类学研究,才逐渐打破了正统科学哲学对科学进行合理性辩护的神话,使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一种作为日常实践活动的轨道上来。然而,实验室研究所贯穿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片面否定科学客观性的叙事逻辑并不被科学共同体一致认同,因而,如何准确理解与合理把握科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建构性与实在性之间的界线和限度,还有待科学哲学和SSK的深入探究。

[关键词] 科学知识社会学; 实验室研究; 科学事实; 社会建构论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3

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科学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表述,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前提与基础,因而是无涉价值的。然而,随着19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的兴起,这种观念逐渐被打破。法国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拉图尔、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人类学家卡琳·诺尔-塞蒂纳等人文学者,不仅认为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还直接深入到科学知识生产的第一现场——实验室,试图找寻科学事实实验室建构的第一手证据。他们通过对科学事实、科学论文在实验室中复杂建构过程的考察,写出了多部实验室研究的民族志作品,其宗旨不仅在于揭示科学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更在于传达SSK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以最终实现对正统科学哲学的质疑与批判。本文拟通过对SSK科学事实实验室构建根源的梳理,进一步明晰SSK社会建构论的基本立场,促进大众全面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增强科技管理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一、实验室研究对象的非自然性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所谓“事实”(fact)就是指“已经被制作出来的东西”,与其在拉丁语中的词根facere即“制作”是一致的。然而,从科学实在论的视野看,事实就是已知的实体,尤其是科学事实,绝不会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世界皆由事实所构成,知识的目标就在于提供一种关于世界本来面目的如实说明,这种说明往往借助科学的经验规律和理论命题得以实现。但基于SSK的实验室研究断然反对这种观点,它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充满着建构性而不是描述性,是由决定和磋商组成的链条。实验室是一个操作人工物的作坊,而不是自然物显现自身的场所,换言之,实验室研究的对象不是本真自然,其研究对象具有非自然性。

[收稿日期] 2015-07-12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2013QNZX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3M542250);重庆市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Xm201358);西南大学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重点项目(SWU1409111)

[作者简介] 邱德胜(1975—),男,湖北省武汉市人,西南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首先,实验室很少研究作为本真状态的自然物,相反,其研究对象经常是想象或视觉、听觉、电等的踪迹,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纯化了的样本。实验室给予我们的印象是一个由桌子、椅子构成的工作空间,以及仪器和设备的累积。实验用的所有原材料被特地种植并被选择性地培育出来,多数的物质和化学药品被净化,并从服务于科学的工业或者从其他实验室得到,甚至实验所用的水也要经过特殊的处理。这些物质与测量仪器如同发表的论文一样,都是人类努力的成果。正如塞蒂纳所言:“实验室的现实是高度人工化的。它像一个工厂,不是被设计来模拟自然的建制。实验室中不仅不包容自然,甚至尽可能地自然排除掉了。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面对和处理的都是高度预构好了的人造物。”^[1]

其次,不仅实验的对象是非自然的或人工的,而且实验室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也是人工的。实验室研究是借助实验仪器、实验工具等人工建造物,来对实验对象进行观察、识别、筛选、控制,从而得出一些基本结论的过程。显然,实验室研究所得结论是人工物(科学仪器)与人工物(实验对象)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对自然界本身的描述。塞蒂纳指出:“科学研究是借助工具操作的。在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工具性不仅在科学家所操作的‘事情’的性质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体现在科学行动的专注中。这种借助工具所完成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截断了事件的自然路线。”^[1]由此看来,在实验室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很难找到一个与描述主义科学观完全相符的“自然”或“实在”——纯客观的自然必然地成为实验室的受害者。

再次,不仅实验对象非自然,而且实验现象也可能是人为建构的,而实验仪器和设备则成为实验室建构实验现象的帮手。正如拉图尔所言:“事实上,现象只取决于设备,它们完全是通过实验室所使用的仪器制造出来的。凭借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但制造者却将人为的实在说成是客观的实体。”^{[2](P64)}如何将人为的实在转化成客观的实体,这离不开科学论文的作用。科学论文一旦发表出来,人为建构的实在将被看作一种客观的实体,后人在引用相关论文时,不会再考虑实在建构过程中的人为或主观因素,于是,主观实在便转变为客观实体,并成为后续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为了使这种转变更为合理和自然,一篇篇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科学论文都可能是人为建构的产物。^[3]正如

塞蒂纳所言:“论文是对实验室的一种建构,完全类似于其他的实验室建构。”^{[4](P94)}

简言之,不论是实验对象、实验工具还是实验现象,它们都可能是自然世界所不具有的、是人工的,因而,通过对非自然物或人工物所做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最多也只不过是人工对象的基本规律的说明。由此可见,实验室研究对象的非自然性将导致实验室科学的不自然和非自然,这进一步表明了实验室科学所具有的建构本性。

二、实验室研究目标的非真理性

通过对实验室日常实践的考察,塞蒂纳等人发现,实验室科学家的科学实践并不是以探索真理为目标的,而是遵循着另外一个原则:“如果存在一种似乎可以控制实验室行动的原则的话,那么,它就是科学家对使事物‘运行’的关切,这种关切表明一种成功的原则而不是关于真理的原则。”^[5]拉图尔和伍尔加提出了与之相似的看法:“观察人工事实的构成,……真实性是事实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就意味着,科学家的活动是致力于有关陈述的加工,而不是致力于‘真实性’。”^{[2](P236-237)}由此看来,实验室的日常行动是以成功为目标,而不是以真理为目标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真理是实验室的又一个受害者。

需要说明的是,“使事物运行——产生结果——并不等同于对它们进行证伪。产生一些不顾潜在的批评的结果,也并不是实验室所关心的问题”^{[4](P4)}。当实验室产生了实验结果之后,科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防范在实验结果公开之后所可能面对的批评。于是,在结果公开之前,科学家会通过小型会议等各种方式来反复论证一些问题,如关于事物如何运行、为何运行和为何不运行,为使它们运行应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词汇等。在塞蒂纳看来,“这种词汇事实上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适合在被称作‘实验室’的知识作坊里对知识进行的工具性制造”^{[4](P4)}。这种工具性制造实际上也是事物运行取得成功的关切,而关注成功与追求真理相比,是一种更加世俗的追求,这种对事物运行的关切一旦取得成功,它将通过出版物在科学的世界里不断地演变为科学家的荣誉。

实际上,实验室的受害者远远不止“自然”和“真理”两个方面,科学理论也可能是实验室实践的受害者,这是因为,实验室的理论有时表现为一种“非理论的”特征。理论往往隐藏在对“发生了什么

情况”与“实际情况如何”的解释的背后,它们把自己伪装成对“如何理解它”这一问题的暂时答案。各种理论与实验室的工具性操作变得不可分离,这些理论也被依次编排到实施实验的过程之中。在塞蒂纳看来,实验室研究中的理论更类似于政策,而非信条。这样的政策使解释与策略性的机智、巧妙的计算融合起来。而此时政策的运用就如同实验室对“成功”的关切一样,必然会与一种利益结构相联系。于是,“纯粹的理论就可能被称为一种幻想,即科学从哲学那里保留下来的幻想”^{[4](P4)}。简言之,随着实验室科学实践的继续,“自然”“真理”乃至“理论”,便逐渐地消逝,而所谓的科学事实也不过是一种实验室的建构物罢了。

三、实验室研究过程的与境偶然性

在塞蒂纳等人看来,实验室的科学实践过程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而这种建构包含着决定和商谈的链条,通过这一链条,实验的结果也被建构出来。换言之,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必须做出决定,而如何做出决定,涉及科学家的一系列选择(包括对决定标准的选择与转换),而选择本身又与科学家所处的与境*密切相关。由此看来,科学家对科学事实的实验室建构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

首先,科学家的选择标准具有层次性和可转换性。实验室科学成果的做出往往与科学家的日常选择有关,而这种选择有人为的成分。换句话说,科学成果不大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相同的方式被再生产,重复一个已有的实验过程极不可能,除非实验过程的多次选择被固定下来。这种观点与柯林斯在“复制 TEA 激光器”“探测引力辐射”中关于科学争论的探讨不谋而合。^{[4](P4)}与实验室的内部建构相比,现实情况更加复杂,由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交流、合作和竞争,所以影响他们做出选择的标准将更多,而选择一旦做出,以前的选择将对后续的选择产生影响。在塞蒂纳看来,“以前工作的选择构成了能够使科学研究得以继续的一种资源,即这些选择提供了工具、方法,并提供了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利用的解释”^{[4](P96)}。而在拉图尔和伍尔加看来,每当一个陈述稳固下来,它就假扮成机器、铭写工具、技巧、常规、偏见、推论、纲领等,并被重新

引入实验室和研究过程。^{[2](P236-237)}由此看来,实验室日常选择的标准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选择一旦完成,与实验结论相关的选择标准的产生过程都将被人为地隐藏。正如塞蒂纳所言:“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与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4](P47)}拉图尔和伍尔加也指出:“一旦一个最终产物、一个铭写被获得,导致这种产物的所有可能性的环节都将被遗忘。图表或者数据单变成了在参与者之间讨论的焦点,产生这些图表和数据的物质性过程要么被遗忘,要么被作为纯粹的专业事物被视为理所当然。”^{[2](P63)}拉图尔还进一步指出:“事实除了是一个没有情态和……没有作者痕迹的陈述之外什么也不是。”^{[2](P82)}

其次,科学家日常选择具有索引性。索引性本是常人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塞蒂纳借用这个概念有其特别的含义。在她看来,“‘索引性’主要是指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和与境定位。这就造成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这些成果是由这些活动者的特殊利益、由当地的而非普遍有效的解释来运载的;并且,科学活动者利用了对他们活动的境况定位的限制。简言之,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和与境性证实了科学成果是一种具有索引逻辑标志的混合物,这种索引逻辑表示了科学成果的特性”^{[4](P33)}。

境况偶然性也可以理解为机会主义。在科学家的科学实践中,偶然性无处不在,科学家的日常选择事实上多半建立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一旦与某个实验相关的一系列操作在偶然性的选择中得以完成,实验结果便呈现出来,而此时的结果看起来是如此的合理和客观,但是它的过程充满着偶然性。正如塞蒂纳所言:“科学家是‘实践推理者’,实验室行动是在一种复杂排列的环境中进行的,科学家的行动就是设法降低环境的复杂性,从无序中制造出秩序,‘产生工作结果’”^[1]她同时指出:“在实验室呆上一天,通常就足以给观察者留下科学家在无序中操作的印象;而在实验室呆上一个月,观察者则将对下面一点深信不疑,即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都与消除和补救这种无序有关。”^{[4](P123)}

索引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与境定位,它与实验

* “与境”与英文中的 context 一词对应,也译为“上下文”或“脉络”。其含义主要包括“语义”和“生成”两方面:在语义构成上,包括理论、方法、价值等成分;在生成方面,包含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等因素。塞蒂纳主要在生成层面使用“与境”一词,但这层意思是 context 译法中的“上下文”“语境”或“脉络”所不具有的。

室的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而环境因素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首先,环境因素包含实验室的物质环境,如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的使用状况、实验物质的浓度、纯度等。其次,环境因素包含实验室的地方性特质。实验室的日常实践往往会受到当地一些政策或官方倾向的影响。如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为某些实验操作制定了特定的标准,如在实验室中应该选择哪种物质,物质的数量多少,做实验的时间应该是多长等,这些都会导致不同地方的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在结论上存在着差异。第三,环境因素包含实验室的规则与权力等。例如,某实验室有一台极其昂贵的大型设备,但关于这台设备如何使用则由实验室领导来决定,领导可能制定实验室的相关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会随着权力的改变而改变。

正是由于实验室科学家的日常选择会受到工序的机会主义、当地的特质,以及社会与境等的影响,因此其科研成果也就表现为一种与选择相关的复杂合成物。换言之,随着实验室的境况偶然性和与境定位的变化,实验室选择的索引性也将发生改变。同样清晰的是,实验室的选择一旦演变为最终的成果,这种成果将与其选择的偶然性和与境性不可分离,从而导致科学知识反映出地方性和特异性的特点。

四、实验室研究结果的可能创新性

实验室与境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导致了科学家选择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这也是科学事实是由实验室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塞蒂纳等人看来,实验室与境的偶然性对科学发展而言并没有什么坏处,反而有时候还会导致科学的创新。换言之,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被看作纯粹破坏性的,它不单单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也不再像遗传密码中妨碍正常的生物复制的“错误”,或者像热力学系统中的“紊乱”,相反,不确定性对日益复杂的系统的进步性组织而言是必要的条件,尽管存在着局部的信息错误或信息丢失。^{[4](P10)}

塞蒂纳借助遗传密码的复制来解释上述观点,在她看来,“人们认为遗传密码复制中出现的错误是导致突变的原因。然而,这种发生在(严格复制中)遗传层次上的随机事件,可能借助某种变异而使物种受益,这种变异相比原来的种群而言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这些物种通过结合一种有序的突变……而‘重新建构’自身”^{[4](P10)}。与生物的某些突变可能会走向好的结果一样,科学知

识也是一种被渐进地复杂化建构或重构起来的知识。在塞蒂纳看来,这里的复杂过程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科学具有建构‘新的’信息的能力,即产生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对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对问题的挑战做出回应,科学明显地越来越能够建构和重新建构它自身。”^{[4](P11)}

然而,在科学家的日常科学实践中,虽然他们经常面临诸多选择,但他们在做出选择时也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朝着某个目标迈进的。换言之,科学成果本身虽是实验室复杂建构的结果,但这种建构方向很明确,其目标就是得到创新性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有意图的定向研究的结果。虽然实验室存在着诸多的偶然性,但是科学家会想方设法将这种偶然性整合到生产创新性成果的过程中来,而如何整合这些偶然性则与科学家既有的知识和经验有关,如哪些研究该做,哪些研究不该做,哪些地方该忽视,哪些地方可以进行大胆的猜测等。为了得到创新性的成果,科学家还会对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材料加以修补,以实现预期的目标。简言之,科学家可能为了追求创新性的成果而会对实验室的各种偶然性加以取舍和整合,即对这种偶然出现的新信息进行建构或重构,在科学家个人努力创新的过程中,不存在非定向的或纯粹随机的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做决定相关联,而应被看作是社会互动和磋商的结果。同时实验室的成果与实验室的“思想”是这样一种社会事件,即这些事件是在与其他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磋商中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验室成果或是科学事实的产生都有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不过这种建构有时因为对偶然性的把握得当而孕育了科学的创新与进步。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实验室的科学实践并不在于追求关于自然世界的真理,而只是一种使事物成功运行而采取的权宜性的选择。这种选择还经常渗透着决定,而这种看似偶然的选择或决定将可能导致科学的创新。此外,科学事实的建构只是实验室实践的一个方面,科学家要想将实验室建构的科学事实固定下来,往往还得借助相关论文的发表才能得以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科学事实的出现是一种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实验室建构过程,在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中,与实验室相关的一些与境因素会渗透进

去,正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科学家的活动才具有了复杂的动机。而科学家的动机之所以复杂,除了受实验室内部因素的影响外,实验室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略,正如拉图尔所言:“如果我们想在科学家和工程师工作的时候跟随他们,所有这些研究(主要指文本与话语分析),无论它们多么有趣和必要,都是远远不够的。不管怎么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制定计划草案、阅读和写论文。他们总是争辩说,在技术文本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比他们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更重要的东西。”^[6]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对科学文本或话语作了如何详细的分析,科学家的研究动机还是很难发掘出来,而这种研究动机无疑会影响科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

应该说,正是SSK对科学事实与科学论文建构过程的人类学研究,才逐渐打破了正统科学哲学对科学进行合理性辩护的神话,使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一种作为日常实践活动的轨道上来。然而,实验室研究所贯穿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俯拾皆是,这种片面否定科学客观性的叙事逻辑并不被科学共同体一

致认同,因而,如何准确理解与合理把握科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建构性与实在性之间的界线和限度,还有待科学哲学和SSK的深入探究。

[参 考 文 献]

- [1] 肖显静. 实验科学的非自然性与科学的自然回归[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1): 107.
- [2] Bruno Latour,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邱德胜, 任丑. 科学家如何建构科学论文——兼议实验室研究视域下的科学论文观[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146.
- [4] Karin Knorr-Cetina.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 [5] Harry Collins. Changing Order: 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5: 41.
- [6]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6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22-05

走向后现代的鲍德里亚思想探源

苏丽亚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公共教学部,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后现代大师让·鲍德里亚受同时代思想家们的影响颇多。鲍德里亚汲取了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等人语言符号学的思想,将之用于剖析消费领域内资本逻辑的架构;深谙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要义,将符号学引入对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的解剖;还受到了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理论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些思想体系的先验整合与思辨重构,鲍德里亚揭示了意象物及其伪似的消费主义功能,从全新的符号学视角对现代社会的消费意识系统景观作了深层解码,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别致内涵,但与其实践地超越资本时代的旨趣渐行渐远。

[关键词]鲍德里亚;语言符号学;日常生活批判;景观社会理论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4

让·鲍德里亚是法国思想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他涉猎广泛,受到许多知名思想家的影响,思想丰富,在哲学、符号学、美学等诸多领域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才华。鲍德里亚紧跟时代步伐,在理论、方法和写作风格上不断创新,从而使其社会批判理论能够为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参照、方法和策略,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知名理论家。

让·鲍德里亚所处的时代恰逢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期。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社会逐渐从大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泛滥,一切都被符号化、商品化,商品的符号化及其所建构出的一系列影像体系,成了满足人们需要的一种独特方式。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对传统的反对和批判,对确定性、稳定性的消解,已然成为时代的一个主流倾向。在愈加丰富和多元的大众传媒的中介下,我们的生活世界日益被符号和意义所虚化与取代。时代的这一变革在鲍德里亚思想体系中突出地反映了出来,他的思想中充斥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斗争:从支持现代性到逃离;从发展马克思

思想到与马克思思想决裂;从符号决定一切到完全转向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这些无不显现出新旧时代在其思想深处的交融与对立。鲍德里亚由此把符号学理论运用到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中,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用消费意识形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模式,深刻地揭示了当今时代的消费社会特质。消费社会及其消费行为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其独特的形式维护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它通过符号的编码形式,以无意识的方式完成着对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操纵。为了能够对这个新到来的消费社会作出超越传统的解答,鲍德里亚自觉地汲取了众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思想家们的思想观点,而语言符号学、日常生活批判和景观社会理论构成鲍德里亚的主要思想来源。

一、物的符号意义的语言符号学分析

语言符号学是鲍德里亚思想的首要来源。鲍德里亚坚持认为,资本生产逻辑对于物质产品的依赖必须通过符号作为中介才能实现,而语言更是人们

[收稿日期] 2015-07-06

[作者简介] 苏丽亚(1980—),女,河南省许昌市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沟通世界的中介,因此,资本逻辑在消费领域内的扩张,必然要依赖语言和符号。

结构主义者认为:“所指不过是一个瞬间,在无休止的指意过程中,意义并不是在主客体间的稳定的指涉关系中生成的,而仅仅是在所指的无限的、模棱两可的游戏中生成的。”^[1] 鲍德里亚充分汲取结构主义的这一重要思想,尤其是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的相关思想和理论。然而,鲍德里亚并未照搬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而是力图将之运用于对资本逻辑在消费社会的扩张的分析上。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创立的,其核心思想之一是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区分。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认为符号是语言最基本的构成单位,语言本身构成一个系统,而言语则受语言结构的整体制约,人在言语时并不是主体在言说,而是根据语言结构规则进行新的结构组合。

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在使用语言的时候,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构成明确的意指关系。由于言语也是语言,所以在具体言语时,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表现为一一对应关系,不构成明确的意指关系,而是被分别理解为语言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在日常语言分析中,语言的物质层面将不断地从讨论范围里隐退,所以我们对物的认识只能在符号所指涉的关系中得到。但是,此时语言的物质层面与观念层面并非完全断裂,而是内在地与现实生活保持着特定的映射关系,正如并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观念,也不存在没有观念的物质。然而,鲍德里亚将上述符号语言学引入对媒介社会的符号状态分析中时,割裂和摒弃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将能指和所指看作可以任意相互指涉的。

在这方面,罗兰·巴特给予鲍德里亚以深刻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巴特对物的符号意义的语言符号学分析上。在鲍德里亚关于物的意义的研究范式和框架方面,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义符合学这两种对于资本主义符号逻辑具有穿透力的分析范式。而结构主义符号学正是巴特提供给鲍德里亚的,甚至有学者指出,巴特是当之无愧的鲍德里亚分析方法的引路人。

巴特生活于一个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主流文化的时代。巴特的切入点是用符号学分析物的存在方式。巴特认为,“在经验的层面上,我无法使玫瑰和其所传递的讯息分隔,如同在分析的层面上,我也不能混淆玫瑰是能指及玫瑰是符号,能指是空的,符号是完满的,那是一种意义”^[2]。所以,按照巴特的观

点,我们送出去的玫瑰不再是具体的物,而成了承载着爱情的符号,玫瑰是能指,爱情是所指,第一个玫瑰当然是实体,但在所指的层面变成了符号。可见,巴特的符号学解构了所指/能指、符号/意义。巴特认为,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语言也好,符号也好,都存在着非意向性关系的可能,而正是这种非意指关系的存在,赋予了符号对于所对应的事物的抽象能力。在《神话学》中,巴特主要从对商品的分析中揭示由物到符号的幻化过程,这时候他的理论还是依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的。巴特之所以把自己的书名定为《神话学》,是因为他的神话包含了特殊的意指过程,在意指过程中,内容消解了,变成了一种形式,是空无内容的形式使其成了神话。在《神话学》中,巴特区分了两个层级的内容。作为语言学系统的第一层级是指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空洞的符号,这个符号在第二层级与自己的所指构成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意义。就像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画面被宣传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对象一样,他代表的更多是画面所意指的内容,我们既可以认为是法国的帝国性,也可以理解为法国没有种族歧视问题,这就是神话。因此,意识形态的表征不再表现为直接的对应关系,他以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在无意识中完成对大众的操控。

在《流行体系》中,巴特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已经不是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蕴含的符号意义。他在对服装的分析中指出,我们在购买服装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蒙上一层意义面纱的消费意象,“意象系统把欲望当作自己的目标,其构成的超绝之处在于,它的实体基本上都是概念性的:激起欲望的是名而不是物,买的不是梦想而是意义”^[3]。在这里,服饰流行无需与现实中的衣服对应,作为符号,我们更关注的只是符号释放的意义、被符号化的物。巴特认为,这正是现实与虚象颠倒的神话世界。

与索绪尔不同,巴特思考的更多是符号学的意识形态表达。在巴特的理论中,他把符号学批判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相联系,将马克思的批判推进到符号经济学的批判中。鲍德里亚则在巴特的影响下,先行解构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从而颠覆了使用价值的基础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使用价值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改造,比巴特更深刻的是,鲍德里亚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符号学的语境下进行说明。鲍德里亚由此认为,当代社会的逻辑基础是艺术品拍卖。以此为开端,在一系列符号的中介下,整个世界被转换

为一个符号系统。

二、日常生活与符号学

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鲍德里亚思想的又一重要来源。列斐伏尔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称为“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4],看到了日常生活领域已经从被遗忘的角落变成了资本主义统治与竞争的主战场。面对消费问题的日益凸显,特别是文化领域的统治,西方左派学者开始研究新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

列斐伏尔认为,在消费社会,消费占据首要的地位并取代了生产,对以消费和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异化的批判应是首要的批判,要扬弃异化,全面异化是必经之路,而在这个传媒时代,我们都被塑造为文化符号,因此,革命应从大众文化开始,“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5]。基于此,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对变革与节日的重新发现和推崇上,这是列斐伏尔的乌托邦情结,这种乌托邦精神也影响到了鲍德里亚。应该承认,把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建立在脱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上,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比如卢卡奇对工具异化的批判。而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将批判的逻辑泛化到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符号消费异化上来,最终都走向了颠覆生产这一主题,并将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发展成符号拜物教,严重摆脱了物质生产,成为一种语言现象。

早期的鲍德里亚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列斐伏尔想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作文化层面的批判,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目的,把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考察由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想借助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找到变革资本主义的有效途径。然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重大区别。列斐伏尔认为,以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生产力、生产关系对于当下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不具有直接的适用性,必须建构出一系列日常生活的范畴,这些范畴的一个同一性所在就是“日常性”。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解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存在,而是要透过表象呈现本身,发现作为意识形态投射的消费物,正是这种蕴含意识形态投射的消费物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表现。我们要透过日常生活的遮蔽,发现这一切都是通过消费这个中介表现出来的事实。也就是说,工业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同质性力量,不但逐渐地扼杀和窒息着人们的创造力和反抗精神,而且逐步地呈现出将社会同化为没有对立

和反抗,甚至没有一丝波澜的“平面”。

鲍德里亚之所以成为建构消费社会理论的旗手,不是表现在他对列斐伏尔的继承,而是表现在他对列斐伏尔的超越。列斐伏尔认为,空洞的能指掩盖了消费社会的真实现状,其实,在其背后存在的那个异化的主体以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力量控制着非理性的消费。列斐伏尔根据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普遍性分析,指出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应是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但是,他只是谨慎地用符号学去诠释物的意义,没有进一步去发展符号学的批判功能,也就没有向后现代蜕变。而鲍德里亚比列斐伏尔走得更远些,他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中全面引入符号学,符号成为他反观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他认为,世界充斥的全是一片漂浮的符号,我们被符号所包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符号获得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全无人的主体性。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使鲍德里亚在后期滑向了客体主义的深渊。

在列斐伏尔的“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中,我们尚且有可能呼唤一场现实的革命,但在鲍德里亚带给我们的符号世界里,连作为异化的主体也消失了,这种大胆在鲍德里亚这里完成得如此彻底,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内容及现实的革命要求所赋予的批判功能都被替换了,这使得鲍德里亚的思想深处到处弥散着后现代虚无主义,这也导致了他最终与列斐伏尔的决裂。

三、从景观社会到符号社会

法国情境主义运动给予鲍德里亚同样不容忽略的重大影响,尤以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对其影响最大。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是20世纪西方盛行一时的国际境遇主义的代表人物。面对这个物化的时代,德波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它的生产阶段,进入到崭新的再生产领域,我们的时代表现为表象的无限积聚,它以丰裕的现象学实现着对人们的意识形态统治。德波把这种布展出的景象称为“景观”——“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6]。景观作为可视的景色,这种客观性被主体有意识的表演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在德波看来,资本主义的异化使一切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人们对这种非现实表象折磨的景象就是景观社会的重要规定。日常生活下的人们在景观的充斥之下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接受状态,

这样一来,被现代资本逻辑所制约和操纵的社会全部生活都自我昭示为一种景观的极度积聚。景观社会的出现和盛行,其实不过是商品拜物教原则的彻底贯彻和完全实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劳动产品而且还包括被资本所渗透的一切,统统成为相对于主体的外在的景观。在德波这里,景观已经与商品不同,它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象。景观社会已经取代了商品社会,意象统治一切,并且在看似不干预中却实行着隐性的控制,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最深刻的奴役。大众因为迷恋景观而迷失在虚假的生活中,失去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而资本家则牢牢地控制着景观,从而实现着对人们整个日常生活的操控。在马克思那里表述为人与人劳动关系的物化颠倒,在德波这里则成为已经颠倒的物化本身的表象化的再颠倒,现实即是景观,景观即是现实。

德波看到了景观布展为人们的欲望呈现,并且,人们在对景观的留恋中肯定了我们的现存社会这一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德波深刻地描述了景观的功能就是在无意识中实现对人的虚假消费的制造,这一切悄然发生,我们不再仅仅关注物的使用价值,更关注消费背后所代表和凸显出的地位和身份。凡是不经过广告与意象加工的物品,就不具有优先消费权。意象统治了整个世界,所有的关系都被纳入景观之中,这个社会不再是我们通过实践创造的那个世界,我们已经被这个影像世界所催眠,我们甚至愿意远离这个社会,迷入景观。面对这个全面布展开的景观社会,德波是悲观的,他认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已经全面布展为景观,景观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抽象和虚空化。德波深刻地展示了意象物的存在方式,但是他没有像鲍德里亚那样开启消费社会的大门并深入其中,只是站在了其入口处。

鲍德里亚对德波景观社会的思考更加深入,他把符号学运用于社会批判,指出当代社会已进入消费社会,并且认为符号的编码功能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我们处在符号统治的时代。商品借助广告媒介,实现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全面超越,德波将意象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称为景观社会,在景观社会,主客颠倒的景观所制造的意象统治着一切;而在鲍德里亚这里,意象就是符号,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就是符号社会,人们的社会身份也是通过其在整个符号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符号体系居于主体之上。在德波的景观社会,物的使用价值已经不

再重要,商品物成了景观物,意象才是商品的真实存在,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以景观为中介的;受德波的影响,鲍德里亚开始分析物如何被符号所编码,符号的区分逻辑如何构造人的社会区分及其存在的合法性,而人的身份和价值又是如何通过符号价值体系得以实现,人如何成为功能化的人。德波的分析虽同样深刻,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分析意象的产生机制。德波对鲍德里亚的影响,使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轨迹完成了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仿真社会的转变,德波因此成为鲍德里亚思想后现代转向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只是鲍德里亚在面对这个空无的只剩符号的世界时,看不到人的主体性功能,从而陷入了人对物的无能为力之中,最终走向了以“象征交换”为核心的社会替代方案而陷入虚无,这是客体对主体的胜利。鲍德里亚误读了作为商品本身的符号价值功能,放大了我们身处于其中的消费社会商品泛滥的情况,其实,没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几乎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认为,物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和劳动异化导致了主客体的颠倒,而商品拜物教正是马克思对西方社会主客颠倒的科学指证。不管是德波还是鲍德里亚,都看到了随着媒体的大众化,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必然会选择影像化或符号化这一新的为资本服务的方式,而景观拜物教或符号拜物教的实质仍是商品拜物教。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鲍德里亚思想主要渊源的 analysis 可以发现,鲍德里亚实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语言符号学、日常生活批判和景观社会理论等诸多思想资源的融汇。然而,由于出发点和开端的根本制约,鲍德里亚不可避免地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其后期思想的发展,如象征交换及其死亡思想的提出,把鲍德里亚自身带入到一个后现代主义下的虚无主义境地中。即便如此,鲍德里亚对这些思想进行整合和汲取的价值与意义不容忽略。作为一种代表新视角的批判理论,鲍德里亚的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追寻技术与文化问题的答案。

另外,鲍德里亚以一种虽抽象却深刻的方式,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批判理论的时代价值。对此,特里·伊格尔顿给出了较为深刻的评论:“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竟然会在现代性不死的情况下‘死亡’,这只是后现代主义期望发生的事情。如果后现代主义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性确实已经

结束,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就非常可能随之而被废除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在现代矛盾里挣扎,如果在这些矛盾得到解决之前现代性不会结束,如果定期发布的关于现代性的讣告是夸张不实之辞,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一如既往地是相关的,当然这和说它是正确的并不是一回事。‘现代性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伪装成陈述性命题的行为。”^[7]伊格尔顿的这段话其实是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那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价值。整个后现代主义近乎一致地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经典社会批判理论,其共同依据是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已经失去了时代效力,已经丧失了理论的科学范式。甚至包括鲍德里亚在内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明确将马克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看作现代性的“共谋”。然而,他们自身提出的一系列针对当下时代问题的理论体系,不但从深层上绕不过马克思的影子,而且对于解决当下社会问题和矛盾而言,也没有太多的建构性成果。相反,这恰恰表明,并非马克思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反而是这些借由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深深地处于他们批判的“现代性”的中心而无法自拔,因为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思想正是深层地隶属于这个资本主义统治时代的观念构成。

鲍德里亚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用一种全新的符号学视角对消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性进行了解码,作为西方独树一帜的社会批判理论,鲍德里亚的确开启了一种批判理论的全新模式。由于鲍德里亚处在由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现实物被符号物所取代,因此,作为独树一帜的批判理论家,鲍德里亚把我们带入了符号的虚拟世界,通过分析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触及到了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操控的真实,得出了资本的逻辑借助符号奴役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结论。作为一个批判理论家,鲍德里亚以不同于马克思的方式指向了现代西方社会受符号操控的事实,并运用符号学分析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是,在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深受符号统治的时代、任何事物只有变成符号才能存在以后,鲍德里亚走向了符号决定一切的理论困境,其试图用对符号的批判来代替对现实的批判,用文化的逻辑来消解生产的逻辑,其结果必然是陷入由符号编织的意识形态之中,沦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同时也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富有批判张力的东西。

[参 考 文 献]

- [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7.
- [2]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许蕾蕾,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71.
- [3] [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号[M].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
- [4]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43.
- [5]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 New York:Harper & Row,1971:60.
- [6]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 [7] [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8-11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27-07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原意解读

薛振春¹, 刘伟², 马兰兰²

(1. 河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2.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先秦儒家义利观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义利关系方面的思想。孔子对义利主体进行了明确区分,最典型的莫过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是指居社会高位的统治阶层,“小人”是指居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对于统治阶层,要使他们明白仁义之所在即是国家大利,而谋取国家利益之途就是实行德治,惠泽于民,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对于普通民众,要告知他们物质利益之所在,并对其因势利导,加以道德教化,使之合理正当地谋取利益。孟子的义利思想多是从政治层面针对在位统治者而阐发的,认为统治者为政应首先“制民之产”,然后才能“驱而之善”。孟子通过区别“士”与“民”,明辨“恒产”与“恒心”之间的关系,为孔子德治理念中“先富后教”的具体主张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孟子看来,“士”的历史使命是救世担当和培养独立的理想人格,而“民”的任务首先是足食富之,然后才是道德教化。荀子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和孟子的义利观,主张在对利益主体进行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在政治层面应对统治阶层提出崇仁尚义、不与民争利的要求;对于下层民众的物质需求,则要求统治者养欲教民、实行先秦儒家的王道之治。不同于孔孟的是,荀子倾向于从人性论的角度为人的利欲根源寻找理论依据。先秦儒家并不否认人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为,只是要求不同利益主体应在具体情况下对利益的选择保持合理的价值取向。如何从现代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从而实现其现代转换,这是当下亟待推进的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如何求利、怎样权衡利益的取舍,先秦儒家利益观可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义利观;孔子;孟子;荀子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5

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先秦儒家在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特殊社会环境和具体语境下,对义利问题曾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先秦儒家所言之义利包含的内容是有具体指向的,一旦脱离当时的具体环境,其关于义利的诸多思想就可能被误读。鉴于此,本文拟将先秦儒家义利观放回到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并结合孔子、孟子和荀子的相关论述,对其内涵进行原意解读。

一、见得思义——孔子义利观

孔子在《论语》中关于义利问题的阐述有很多,在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孔子在阐述义利观时有一个明显特征,即首先对利益主体进行明确划分,然后再对不同主体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使其义利观与自己德治天下的整个思想体系相辅相成。

首先,孔子在对义利问题进行阐述时,明确对义

[收稿日期]2015-07-21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5ZX013)

[作者简介]薛振春(1990—),男,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利主体进行了区分,最典型的莫过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P40)}。孔子不仅把“义”与“利”二者各执一端,而且还以“君子”和“小人”这两种主体分别对应之。“君子”与“小人”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以往学者们将这句话理解为:德行高尚的君子知晓仁义,德操不修的小人只懂得谋取利益。由于明白道义的君子与只知道利益的小人在道德上有高尚与低劣之分,因此,自然而然地就会推断出君子之义重于小人之利。对孔子这句话如此理解并进行这样一番推论不免过于武断。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大学》中有记载,“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2](P2)},朱熹为此作注,“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这里的“后贤后王”,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君世主,也就是列于社会高位的统治阶层;而“小人”指的是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另外,余英时通过对“君子”含义的考证后也认为,君子的最初本意是特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只是到孔子这里才逐渐具有道德身份含义,但是《论语》中所述之“君子”,承袭了古代社会身份的涵义。余英时还特别指出:“‘君子’和‘小人’相提并论时,前者指在位的贵族,后者指供役使的平民。”^[3]与之不谋而合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也详实地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君子”的这种身份特征:“内在涵养与外在处世都和谐、淡泊的‘上等人’,即‘君侯式的’高贵的人(君子)”,以及“人们把有儒家教养的人称为君子——‘君侯式的男子’,本来的意思是‘勇士’,在孔夫子本人口里则意味着‘有教养的人’。君子这个词产生于那种对于政治权力有世袭卡里斯马资格的宗族进行等级制统治的时代”^[4]。在这里,马克斯·韦伯不仅明确了“君子”这一身份的社会地位,清晰地突显出这一时期儒家之“君子”所体现的人格特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关于儒家之“君子”的相关记载,也从侧面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君子”的涵义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佐证。

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君子”当指居社会高位的统治阶层,“小人”当指居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此外,对于这句话中“喻”字的意义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何晏集解》、邢昺疏的《论语注疏》中有注:“喻,晓也”,也就是明白、知道的意思。这种按照字义来解释这句话,即明确“君子”与“小人”所知晓的事情有所不同,也是后儒对孔子此言的通常解释,并从中演化成今天我们所了

解到的通常含义:君子才能懂得义,而小人只懂得追求利。但是,在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喻通“谕”,据《说文解字》解释:谕,告也。段玉裁对此作注:“凡晓谕人者,皆举其所易明也。《周礼·掌交》注曰:谕,告晓也。晓之曰谕。其人因言而晓亦曰谕,谕或作喻。”^[5]另外据《广韵》所注:谕,本作谕,譬谕也,谏也。由此可见,将“喻”解释为“告知”引据似乎更为充足。现代人阅读古代文献,务必回到文献创作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回到古人提出某些思想的传统语境中,切不可将我们现代人的语言、语法及其使用习惯生硬地套用在古人思想和古代文献中。因此,通过语境还原,孔子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针对身居社会高位的君子阶层,需要告知他们道德仁义,而对于身处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需要用利益引导他们,使不同阶层的群体各求所需,从而各得其所,如此理解似乎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对于有社会地位的统治阶层来说,使他们明白仁义之所在即是国家大利,而谋取国家利益之途就是实行德治,惠泽于民,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对于广大普通民众,需要告知他们物质利益之所在,并对其因势利导,加以道德教化,使之合理正当地谋利取益。

其次,立足于以上对义利主体的明确区分,孔子进而针对不同主体的不同情况,做出了仁治天下的理论设定。这一理论设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统治阶层而言的。据史籍记载,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先代贵族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宋国,由此可以大致推测,孔子乃殷商后裔。虽然到他这个时候家族已经没落,但这似乎并没有黯淡孔子心中的君子荣耀,因此,孔子在精神上一直以上流社会人士自居。所以,孔子的很多思想主张主要是直接与统治阶层对话,并没有直接面对下层百姓。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统治阶层忝居高位、尸位素餐者多,德高恤民者寡,这极有可能是孔子赋予“君子”以道德属性的现实社会背景。孔子时代的“君子”多身为贵族,即在位统治阶层,大多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孔子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君子喻于义”:认为对统治阶层要告知于仁义道德,让他们懂得广大民众之所需并努力为满足百姓需要创造良好条件,因民之利而利之,从而使百姓实现安居乐业。与在位统治阶层境况明显不同的是,位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终日为生计操劳,满足生活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因此,“因民之利”中的“民之利”应指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这里所言之“利”应是一般意义上满足个人

需求的物质利益,即百姓维持正常生活的合理欲求,所以,“民之利”的“利”同样没有道德属性可言。作为统治阶层,要知晓社会大义,体察百姓疾苦,满足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使“民之利”得以实现。统治阶层只有以民之利为利,施行仁政,方能治国平天下。

最后,孔子还对统治阶层这个义(国家大利)的主体在利观念思想中进行了理论设定,即通晓礼乐道德,以仁治天下。这实则就在政治实践层面正确诠释了“君子喻于义”的完整内涵。接着,孔子又对利的主体“小人”作了理论设定。它的首要涵义是满足生计需求,然后在食饱衣暖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来接受道德教化。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这种“小人喻于利”的理论主张同样需要统治阶层去具体执行,这就是先秦儒家所提倡的富而后教的治世模式。早在孔子之前,春秋时期齐国之相管仲就曾讲到,“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在中国农耕时代,农业是社会的根基,温饱问题是关乎全社会民众的基本问题,人们生活最重要的需要莫过于衣食。因此,在基本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要求百姓忍饥受冻去讲求礼义廉耻,这是根本不现实的。管仲明确表达了物质生活的殷实富庶对于一般民众道德教化的现实意义。当然,物质生活的满足只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前提条件而并非充足理由,要真正实现精神富有,还需要其他的必要条件。这里只是强调物质生活对于道德教化的基础作用,在这一点上,孔子的义利思想与管仲的牧民主张的出发点非常一致。《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P144)}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也就是说,富民是教民的基础,而教民是在位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手段。由此可知,对于教化民众而言,使民众生活富庶这个前提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仓廩衣食对于百姓生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几乎都认识到,治国之道的首要之处在于得民心、顺民意,正所谓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所以,孔子对管仲提出的这种先仓廩衣食而后礼义廉耻的治国主张深以为然,并在此意义上要求统治阶层对广大民众实施“庶—富—教”的治世模式,从而实现仁治天下的社会理想。

二、居仁由义——孟子义利观

如果说孔子对义利问题的阐述多以先秦儒家仁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为最终归宿,那么孟子的义利思想则主要是对社会正义内涵的发挥。孟子不仅继承捍卫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而且立足于其尚仁的观点又发展出了贵义的思想,“义”贯穿了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如果将孔孟的仁义思想具体纳入义利范畴之内,可以说,孔子之仁是爱人,而孟子之义是助人;如果说仁的本质是博爱,那么义的精髓就是广利。在一定意义上,孟子义利观中的“义”则凝聚着广利天下的思想和情操。对孟子义利观的阐述,需要结合《孟子》中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有何利国主张,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7](P1)}依据孟子建议梁惠王“言仁义不言利”这句话,以往很多学者得出孟子重义轻利的结论,甚至还有人由此断定孟子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走向贬斥利、抬高义的极端。学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和理由,然而似乎有失公允。要把握孟子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义利思想,需要对相关文本进行认真考究,并对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

首先,孟子这一思想有着确切的对象。孟子在“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中明确将主体界定为“王”所处的这个阶层,是针对特定对象“王”所阐发的。也就是说,孟子对重视仁义、不必曰利的主体范围作了限定,它只是针对在位统治阶层,并不是要求天下所有人都只讲仁义、不顾利益。其对义利问题的阐述首先对利益主体作了明确划分,在这一点上,孟子的思路与孔子是一致的。此外,对于此句中的“义”也要做符合当时具体实际的理解。孟子从国家大利的角度和广利苍生的视角,将此处的“义”主要阐释为治国方略。在孟子当时所处的七雄并争的战国时期,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略:一种是先秦儒家孔孟主张的“王道”政治。孟子坚定地认为,君主如果能够轻徭薄赋,以仁政教化百姓,以道德感化力使天下人自觉归顺,就可以实现国家富足强盛,天下长治久安。另一种是不重视仁义道德、以富国强兵为政要的“霸道”政治,这是当时各诸侯国君主热衷的政治路线。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战端频起,争城掠地,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国家之间相互攻伐,国内

百姓不堪繁重的赋役之苦。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孟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春秋无义战”^{[7](P324)}。由此可见,先秦儒家对当时不合礼法、不符道义的战事与政治持坚决反对的立场。孟子认为,国家统治阶层如果不讲仁义,只知谋求眼前利益,不念生民涂炭之苦,只顾开疆拓土之利,终究会导致城毁庙摧、国将不国。另外,对于孟子所说的“利”也要仔细斟酌。梁惠王讲“将有以利吾国”的“利”是使动之意,也就是“使我的国家受利”的意思。然而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中,国家乃君王一家一姓之国家,“利于国”与“利于王”常常难以分清界限,所以梁惠王所言“利于国”就与使其个人得到好处在本质上所差无二。但是孟子讲的“何必曰利”,并不是接着梁惠王“利吾国”之“利”的意思来讲的,而是特指“霸道之利”。对此,朱熹做注:“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2](P345)}据此,把此句中的“利”理解为“霸道之利”,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由此可见,孟子提出的“言仁义不言利”的观点,乃是针对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君攻伐争利这一当时社会现状而阐发的,要求君王实施“以仁义德政为利,不以个人私利为利”的治国方略。

其次,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面对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发问,开门见山向梁惠王表明自己的观点,即君王要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接着,孟子就从正反两方面分别论证了君王“以义为利”和“以利为利”分别会给国家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后果,然后,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君王以义为利,求利有道。孟子对梁惠王言,上至君王、大夫、士,下至庶人百姓,如果全国上下人人都争相言利求利,那么国家就将陷入危机;如果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君被弑杀,那么这个弑君者一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如果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被弑杀,那么这个弑君者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万乘之国拥有千辆兵车,抑或是在千乘之国据有百辆兵车,这已经算是拥有很强大的实力了。如果人人都见利忘义,那么他们得不到利益是不会满足的。然而,从来没有人讲仁爱而遗弃自己的亲人,没有人讲正义而不先顾及自己的国君。可见,孟子先是从反面对君臣上下只知以利为利、求利无道的做法做出了弑君杀父的后果预料,然后又从正面阐述如果以义为利,那么就能“仁不遗其亲”“义不后其君”^{[7](P1)}。因为求利有道,不以其道则不得利。在这里,孟子所论述的求利之“道”就是行仁政之王道。

另外,孟子为了推行仁政,针对统治阶层明确提

出了“与民同乐”的要求,并将其作为衡量统治者的“乐”是否正当的一个原则。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时,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7](P33)}作为身居高位的统治阶层,只有做到与民同乐,才能得到域中百姓的诚心拥护与爱戴。因为对于身处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而言,令他们所忧抑或是所乐的事情无非维持生计的衣食住行,作为一国之君只有做到以民为本,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时刻关注百姓所关注的事情,尽力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深得民心,进而得天下。“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8]百姓要维持日常生活就要满足衣食需要,也正因如此,衣食缺乏对百姓而言是他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境,因此在先秦儒家看来,解救百姓的生活困苦是一国之君所应该履行的责任和道义,如果君主切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可以说是符合道义的。同理,孟子认为,齐宣王“好货”“好色”之疾并非不可原谅的大错,“王如好货,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7](P36)}仁政不过是先王善推其不忍人之心的结果,只要君主做到推己及人,与民同乐,王道理想自然就会实现。孟子要求统治者要以义(国家大利)为利,不要以个人之利为利,躬行仁义,以天下万民之利为利,从而实现家国大治,而对于统治者自身合理的利益需求则不必苛求,其在统治者实施利国利民政策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在位统治者的个人私利与国家大利在治国的实践过程中会实现统一。因此,按照孟子的思想理论,统治者无论是从谋求自己利益方面去思量,还是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但就落实在现实行动上而言,他需要采取的最优政治路线只能是先秦儒家的王道之路。

总之,在孔子富而后教的德治思想基础上,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仁治思想,提出了王道的社会理想,而王道之首义在于实行仁政。仁政的基本含义是薄赋省刑,治民之产,实施礼乐教化,使百姓过上温饱殷实的生活。正如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所描绘的:在每户百姓的五亩小宅周围,树之桑麻,饲之家畜,这就保证了百姓衣帛食肉的供给;让百姓按时令进行农耕生产,这就消除了数口之家忍受饥馁的忧患;使百姓免除饥寒之苦,得到衣食的满足,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施伦理教化,使其明白孝悌之义,这样一来,天下民众就必将自觉归顺。在这里,孟子不仅为梁惠王指明了一条王天下的王道之

途,而且更是描绘了一种古代农耕社会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生活,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小农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如上所言,先秦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很多时候是在与在位统治者阶层直接对话中而阐发的,关于义利的思想也不例外。因此,孟子的义利思想也多是针对在位统治者从政治层面而阐发的。孟子对王道理想的阐释,承袭了孔子先富后教的理念,亦遵循了“因民之利而利之”的原则,正所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7](P171)},故认为统治者为政应该首先“制民之产”,然后才能“驱而之善”。比较孔子与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孟子通过区别“士”与“民”,明辨“恒产”与“恒心”之间的关系,为孔子德治理念中“先富后教”的具体主张找到了理论依据。“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7](P17)}孟子将利益主体分为两类,即“士”与“民”(类似于孔子所划分的君子与小人)。在孟子所处的时代,“士”已经开始脱离原来所处的贵族阶层,逐渐丧失所拥有的贵族身份而沦为为四民之首,这是“士”社会身份的变化。与此同时,孟子在精神方面对“士”提出了独立人格的要求:即使饱经忧患,身处艰难困苦的环境,“士”亦当有人格自尊,成就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然而,这种精神要求并不适用于“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7](P17)}。所以在孟子看来,“士”的历史使命是救世担当和培养独立的理想人格,而“民”的任务首先是足食富之,然后才是道德教化。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所提出的王道仁政,就是士君子阶层广利万民的社会理想。

三、以礼正利——荀子义利观

荀子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和孟子的义利观,主张在对利益主体进行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在政治层面应对统治阶层提出崇仁尚义、不与民争利的要求;对于下层百姓的物质需求,则要求统治者养欲教民、实行先秦儒家的王道之治。这是荀子与孔子和孟子在义利观方面的相似或相通之处。不同于孔孟的是,荀子倾向于从人性论的角度为人的利欲根源找到理论依据。

首先,《荀子·荣辱》篇云:“好利恶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9](P25)}也就是说,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道德君子还是下层的普通小人,在本性上同有好利恶害之心,这是没有什么

本质差别的,只是他们用以求取利益的途径不同而已。这样,荀子就从人性的角度,为人们求利的欲望和行为找到了理论依据。荀子在《性恶》篇中说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9](P241)}于是,在提出人的自然本性是恶、而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这一观点之后,荀子继续论证了人的本性天生就有好利之心,如果依顺这种好利本性,那么就会产生争抢掠夺而丧失谦卑辞让。在荀子看来,好利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本能,这种自然本性本不具有道德属性,后来人们之所以对求利行为做出是非对错的道德评断,根本上乃是由于人们求利手段的合理与否。荀子在利欲问题上所阐发的此类观点还有很多,比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此人之情性也”^{[9](P243)}。饱食暖衣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所以求利乃人之本性。荀子虽然肯定了物质利益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但是并不认为人可以肆意妄为地谋求利益,因为在荀子的义利观念中,求利存在着一个是否合乎道义的问题。对于任何人而言,义与利都是兼而有之的两种需求,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先王也不能去除人们追求私利的欲望,只是他们能谨守道义来克制对利欲的追求;即使是桀纣这样的暴君也不能去除人们对道义的爱好的,只是他们对道义的爱好的战胜不了对利益的追求。荀子明确指出,可以通过教化让民在好利的同时又不违背道义的原则。所以,荀子提出处理义与利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以义取利,这一观点既承认人人皆有好利的自然本性,同时也反对“惟利所在,无所不倾”^{[9](P259)}的极端唯利论,以使自己的义利观更加合乎义理和人情。

基于自己的人性论,荀子分别阐述了不同利益主体在政治层面上的不同主张。他认为,国君要想治理好国家,就要使道义胜过私利,一旦私利胜过道义,社会就会混乱不堪。道义与私利的取舍完全取决于一国君主:国君重义则义克利,国君重利则利克义。因此,一国之君不应该谈论财富多少,诸侯之君不应该谈论利害得失,大夫与士不应该谈论财货流通,自士以上不与普通民众争职业和财利,如此一来,百姓就不会为生计困扰。荀子对居上位的统治者提出的要求是,国家百姓大利重于个人私欲,国君需要做到崇德尚义,不与民争利;而对于下层普通民众来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利”^{[9](P312)},积极谋生,无所谓是非对错。在肯定了求利是人的自然本性,以及物质利益是人生存的基础之后,荀子对义利问题的分析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如何求利上,而是进一

步在后天修为上对义利与荣辱的关系展开深刻思考。荀子在《荣辱》篇中写道：“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9](P24)}对人而言，荣辱显然并非简单易事，尤其在荀子所处时代，它常常与人的安危利害联系在一起。因此，荀子只有论述清楚“安荣”与“危辱”的问题，才会得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的观点。

不过，对于荀子在“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句话中所表达的观点，需要对其进行仔细分析之后才能做出评判，切不可失之于片面。对于荀子荣辱观的分析，可以先借助《正论》篇中的相关论述来思考：“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9](P187)}在这里，荀子把荣辱区分为两端，即义荣、势荣和义辱、势辱。其中，由于个人道德高尚而获得的荣誉为义荣，相反，因为个人不道德的行为而遭受的耻辱为义辱，这两者皆为“由中而出”，取决于己；而由权势地位带来的荣誉为势荣，外界强加于己的侮辱为势辱，这两者都属于“外至而来”，与个人的善恶无关。由此看来，“先义而后利者荣”之“荣”应该将其归结为义荣，同理，“先利而后义者辱”之“辱”也应当理解为义辱。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往往不乏这样一些情况，即先义后利者未必不遭势辱，而先利后义者极可能取得势荣。因此，在对荀子将人的行为荣辱归结为义或利进行分析时，切不可忽视了荀子对势荣、势辱的阐述和区分。

荀子对荣辱类别的区分是为了明确君子与小入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君子虽不免遭受由于外界因素施加于己的势辱，但不可以由于自己的道德行为失据而招致义辱；小入虽可以得到因为外在权势而带来的势荣，却不会获得由于自己德性操守所追慕的义荣。“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辱，唯小入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9](P187)}既然义荣与势荣只有君子才可以兼而有之，那么能够做到先义后利的只有君子；既然道德修养高尚的君子不可以有义辱，那么也就只有小人才可以先利后义。正是由于先讲利而后言义，所以才有可能招致义辱与势辱。分析荀子的义利观与荣辱观，可以察觉居社会高位的君子阶层，得到因社会权势带来的势荣实属平常的现实存在，君子阶层的社会基础为其获得义荣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可能，但是要真正拥有义荣并非易事。荀子对义利先后与荣辱类别的辨析，其目的是为君子阶层的道德行为提供一种实践理性指导以及道德价值取舍的应然判断。荀子通过对义

与势、荣与辱进行鲜明对照，要求君子阶层先义后利，重义荣而拒义辱，而这一要求仅仅是针对居社会高位的君子阶层，并不包括孳孳为利的小人群体。

其次，在对待民众的教化问题上，荀子的理论与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以及孟子的王道仁政主张大体一致，即主张在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又与孔孟有些不同。荀子在对孔孟的义利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同时又根据现实需要，重新对义利观念进行了创造性综合。针对统治阶层提出的节用薄赋的富民措施，荀子希望统治者奉行节约，从而减少百姓负担。荀子认为，节用是百姓富裕、国家富足的必要条件，“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9](P86)}，明确指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统治者节制用度，先使百姓富裕起来，国家才会府库盈余。如果统治者肆意挥霍奢侈浪费，势必会导致百姓贫穷，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最终生存难以为继，如果真走到这一步，即使统治者想巧取豪夺也不会有任何收获。另外，先秦儒家不仅要求统治者节用薄赋，还倡导使民以时，减少对百姓人力的使用。因为在农耕时代，劳动力始终是从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基本要素，是民富的基本条件。孔子提出“使民以时”^{[1](P4)}，认为要根据时令季节合理安排，在不误农时的情况下派遣劳役。孟子也提出要“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7](P5)}。由此可见，先秦儒家认为，只要不夺农时，让百姓安心生产，就必然会物质富足，百姓生活富裕，从而为改善社会风气提供现实基础。荀子提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9](P87)}，并且认为只要统治者满足这些富民的基本条件，以政裕民，首先做到民富，而后自然会真正实现国富。

与孔孟有所不同的是，荀子提出这些民富国强的主张主要是基于养欲教民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如前所述，孔子提出富而后教的治世模式，其原因为何，孔子并没有多讲；孟子对于自己治民之产等具体的仁政主张，主要是基于“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理论依据。而在荀子的义利观念里，义与利之间有着真正的内在关联。荀子认为，礼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生而有欲”，如果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去追求，而一旦物欲追求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限度，就很容易发生争夺与混乱。为了避免产生这种社会混乱，国君便制定了礼制来解决人的无限欲求与现实物质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荀子看来，不管是言仁言义还是言礼，在现实经验的层面都可以指制约人们行为的伦理规范，所谓“礼者养也”^{[9](P190)}，

是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成人之利也。因此,荀子认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必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不能脱离物质空谈道德,义不可能脱离利而单独成义,道德起源于现实物质,当然也就为指导人们现实活动而存在,义的目的不在自身,而是以利为事。义与利的关系落实到政治层面上的治国主张,就表现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9](P293)},教理民性以富养民情为前提,富养民情也必须接受道德的教化与约束。

在荀子看来,欲的多寡和是否存义与世之治乱并无必然的关联,善恶治乱的关键不在欲而在心,在心之是否“中理”,心之所在中理,则欲虽多,也无害为善、为治、为义,反之亦然。荀子认为,作为人的生理本能的欲望情感是一种自然存在,这种自然本能并无善恶之分,但如果脱离道德伦理的有效节制任其恣意泛滥,结果势必会走向恶。行义的意义则体现为:正确引导人的自然欲求,使之得到合理的满足,“欲”在荀子思想中是需要满足和实现的对象。因此,荀子的人性论实则表明,人天生而有欲,这种自然欲求无所谓善恶,是构成人性、推动人的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天然存在,然而人满足自然欲望需要遵守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理性原则。荀子根据现实情况对人性进行理论分析,将义理与利欲统一起来以体证生命存在的内在本质。义与利的统一是荀子结合先秦儒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所进行的思想综合在其义利观念中的体现,在个人层面,义利统一可以修成圣贤人格;在国家层面,义利合一则可以实现王道之治。

四、结语

义利的内涵,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理应做区别分析,对于正当物质利益的追求,先秦儒家从未否定过。因此,后世学者对先秦儒家义利观进行正确考察和分析,既是对先哲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说到底,先秦儒家学说之宗旨是培养一种践道者,即塑造一批能够担当文化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中的精英文化品格,可以用于右任先生“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那种社会担当和圣人情怀来形容,而这份担当和情怀只是就特殊的精英阶层而论的,并非针对所有人,尤其是下层广大民众。

在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中,义利之辩重在区分公利与私利。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利的主要涵义包括两点:物质利益和为我动机。财富是中性的,其本身

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关键是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和求利行为的动机,由此产生优劣好坏的各种结果使人们做出衡量和取舍。先秦儒家从未避讳在道德领域言利,且一向持坦然中肯的现实态度。君子虽忧道不忧贫,但总可以“学,禄在其中矣”^{[1](P178)}。在义与利的先后、取舍问题上,先秦儒家只是要求见得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1](P158)},从未将利与义推至相互对立的境地。在政治领域,先秦儒家一向主张统治者应推行德治仁政,对于在上位的统治阶层提出成贤成圣的道德要求,对于下层广大民众则一直主张富而后教的安治模式。先秦儒家对于广大民众的物质利益需求从未有过忽略抑或否弃,而是将满足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的任务提到在位统治者施政的首要议程。因此,在先秦儒家义利思想中,利益并非如洪水猛兽般为人们所讳言,先秦儒家一向重视中庸之德,凡事不主张过与不及。然而,后世儒家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将义利思想进一步发挥,将其抽象到“天理存,则人欲亡”的地步,这种将利益推至与道义正相对立的思想,必是与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原意相悖的。

如何从现代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儒家义利观,厘清哪些是先秦儒家思想,哪些是几经历史发展变化后异于先秦儒学初衷的后儒思想,弘扬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精华,正视并尽力纠正其中的理论不足,从而实现先秦儒学的现代转换,这是当下亟待推进的工作。另外,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如何求利,怎样权衡利益的取舍,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可给予人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参 考 文 献】

-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宋]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3] [美]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141.
- [4] [德]马克斯·韦伯.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 康乐,简惠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6.
- [5] [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03.
- [6] 陈国庆.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48.
- [7]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8] [战国]吕不韦. 吕氏春秋全译[M]. 廖名春,陈兴安,译注. 成都:巴蜀书社,2004:594.
- [9] [清]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34-06

我国外汇储备属性的法理分析与规制建议

吴礼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外汇储备是国民创造的财富, 国民与政府围绕外汇储备所形成的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并以税收的形式为国家所征收, 因此, 应当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高额外汇储备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 然而过多的外汇储备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繁荣, 反而存在着诱发通胀的风险, 并大大降低资金的利用率。因此, 应当通过一系列的宪法性货币规则, 如设定外汇储备总额、限定其用途、将其纳入预算管理、建立透明机制、启动审计制度, 对外汇储备的规模、使用、管理等加以严格规制。

[关键词] 外汇储备; 通胀税; 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宪法性货币规则

[中图分类号] D922.2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6

多年来, 日益飙升的外汇储备一直都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6月19日公布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 2014年第一季度, 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增加了1 258亿美元。至此, 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增至3.94万亿美元, 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1/3, 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言人于2014年7月24日新闻发布会上所公布的数据^[1], 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已毫无悬念。但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年4月20日公布的数据来看, 至2014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达到峰值, 即39 932.13亿美元, 此后呈微弱的下降趋势, 至2015年3月, 已降至37 300.38亿美元(数据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不过我国的外汇储备基数极大, 虽然总量有所下降, 其规模仍不容小觑。高额的外汇储备未必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 2014年5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非洲访问时曾表示,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2]。而就目前来看, 此项负担日益沉重, 并且其本身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经济层面, 更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2011年底, 《人民日报》刊文《外汇储备是谁的?》^[3]对外汇储备的权属问题进行了分析, 紧接着

《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题为《外汇储备到底是谁的?》^[4]的文章, 表达了较为类似的看法。这两篇文章虽引发了有关外汇储备的权属、用途、规模、合法性等问题的思考, 但均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面对近4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资金, 如不能从法理层面上对其性质、权属、合法性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界定, 必然会导致监管和使用上的混乱, 甚至会引发寻租和腐败。基于此, 本文拟从法理学的视角, 对涉及外汇储备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梳理, 并结合当前大力反腐的背景, 探讨加强外汇储备监管的法治化路径, 为防范可能由此引发的经济风险和金融腐败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一、外汇储备的属性

谈到外汇储备, 首先引发的问题便是外汇储备资金的权属界定, 即外汇储备到底是谁的钱? 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外汇储备是谁的?》一文引用专家的观点认为, “外汇储备是央行的钱, 也代表国民财富, 不能理解成一般意义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 不能无偿使用”^[3]。下面我们根据该文作者的逻辑对此论进行一番梳理。要了解外汇储备是谁的, 当然要了解我国的外汇储备是

[收稿日期] 2015-0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FX0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C820109)

[作者简介] 吴礼宁(1981—), 男, 河南省民权县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货币宪法、财政宪法。

怎么来的。对此该文作者指出,“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出口商品或劳务,挣回美元等外汇,然后将这些外汇的一部分或全部卖给银行获得人民币。外商对中国投资也往往需要将手中的部分或全部外汇资金换成人民币,也得将外汇卖给银行。……外汇一旦被央行购买就成为国家外汇储备”^[3]。从中可以看出,外汇储备的积累途径大致有两个:一是出口创汇,二是外商投资。然而对于由这两种途径积累的外汇储备之属性,尚需进一步辨明。

1. 出口创汇积累的外汇储备的属性

对于通过出口创汇积累的外汇储备之属性,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央行,而是通过银行卖给央行,并获得了等值人民币”,“外汇储备是央行用‘发票子’这种向社会负债的方式‘买’来的”^[3]。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也说:“外汇储备谁也没有去创造,就是印钞票买回来的,所以也不存在还给谁的问题。”^[4]此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的钱,跟纳税人及市场主体无关。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就整个交易过程来看,人民银行印刷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纸币,换取了本身同样没有任何价值的外币。然而这两种没有价值的纸币都被法律赋予了请求权,持有人可据此要求对方交付相当于票面价值的财产。既然如此,一个逻辑形成了:生产者生产出具有价值的商品,以此换来外汇,此时国内市场上的商品数量没变,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也没变。而现在是人民银行根据生产者持有外币的数量印刷具有同等请求权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换取生产者手中的货币。结果是国内市场上的商品数量没变,流通中的人民币增加了,进而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每个持币人都遭受了同等比例的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人民银行手中凭空多出一笔请求权,即变相印出了一大把外币。这个过程同征税没有本质区别,不同之处无非是一个用货币换货币,一个用完税凭证换货币。而用来购买外汇储备的票子最终体现为流通中的现金、各类银行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人民银行票据等各种央行负债。

接下来我们抛开经济学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公式,计算一道小学二年级的数学题:假定市场上原有商品9 000件,流通中的人民币总量9 000元,每件商品的价格是1元,物价稳定。今年新增商品1 000件,人民银行新发人民币1 000元,每件商品的价格仍是1元,物价依然稳定,但人民银行获得了1 000

元的通胀税。也就是说,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人民银行也在征税。后来甲公司生产1件商品出口美国,换来0.16美元,但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于是向人民银行请求兑换1元人民币。人民银行为满足甲公司的要求,便打开印钞机印了1元人民币与甲公司交换。在这个过程中,甲公司似乎得到了公平的对待,0.16美元兑换1元人民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增加了1元,变成了10 001元,而商品总数不变,仍是10 000件,于是每件商品的价格从1元变为1.000 1元。这时甲公司和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发现他们再也不能以1元人民币购买一件商品了。市场交易中0.000 1元的价格差是会被忽略不计的,其实大家并没有觉察到纸币的贬值,甲公司仍然认为得到了公平的对待。甲公司不断地出口商品,不断地兑换人民币,一年内共出口商品2 000件,兑换人民币2 000元,于是流通中的人民币变成了12 000元,每件商品的价格也相应地变为1.2元,这时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了通货膨胀,而人民银行却再次凭空多出2 000元的财产请求权,一年下来,人民银行共可获得3 000元的收益。其实,人民银行多出的收益就是通胀税收入,说到底还是人民银行以税收的形式获取了人民创造的财富。不过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不这样认为,他说,“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发行纸币,虽然纸币的印刷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由于纸币的内在价值相当于与其币值等值的外汇,因而不存在铸币税”^[3]。然而正如我们刚刚分析过的,人民银行在印出一张纸币的同时,纸币本身就已经贬值了,所以这时的纸币与其所兑换的外汇根本不等值。只不过从人民银行发钞到持币人觉察到通货膨胀,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所以持币人往往会对这种不对等的交易毫无觉察。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出口创汇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乃是人民银行向公众征收的通胀税,而纳税人不单单是出口创汇的企业或个人,还是所有人民币的持有人,因为在出口创汇和外币兑换本币的过程中,所有的人民币都在同一时间内贬值,也就是说每个持币人都按同一税率缴纳了通胀税。

2. 外商投资积累的外汇储备的属性

对于由外商投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之属性又当如何界定呢?在我国境内,除非国家另有规定,外币禁止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外汇管理条例》第8条)。因此,外商用于投资的外币须先转化为人民币才能使用,于是人民银行再次通过印钞来

购买外商手中的外币,并支付对应的人民币,外商以兑换的人民币进行投资。如此看来,整个过程似乎与国内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对此,丁志杰认为,“这部分恐怕谈不上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了”^[3]。其实不然,人民银行通过印钞换取外币,便获得了票面所载的请求权,可以据此请求相应主体交付与外币币值相当的商品。很显然,人民银行再次以零成本换取了财产请求权。与此同时,外商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之后便会将这些货币投放市场,购买劳动力和商品。结果是国内市场上商品减少,纸币增加,纸币开始贬值。如此看来,人民银行所获取的请求权最终仍是国民缴纳的通胀税。对于外来投资者而言,整个过程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即通货膨胀对企业没有构成直接影响,因为只有当他们将兑换来的人民币投放市场之后才会发生通货膨胀,而纸币在他们手中之时仍是“坚挺”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随着外币不断流入国内,结果是国外市场上通货的减少和商品价格的下降,当地人所持纸币的购买力上升,这意味着国内的持币人在向外国的消费者交税。如果人民银行所持外币不被用来购买外国商品,还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以对中国来说毫无价值的纸币换取了中国的财富,是外国的中央银行向中国国民征收了通胀税。当然,除非发生重大国际危机,附着于所持外币之上的请求权不会丧失,人民银行握有请求兑换的权利,这些请求权其实就是外汇储备。归根结底,外汇仍是国民向人民银行缴纳的通胀税。

然而,丁志杰坚持认为,新发货币最终会被企业和居民持有,这些货币也是财富的一种形式,因而新发货币谈不上是“征税”^[3]。但是纸币只是财富的一种法定表征形式,而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把纸币本身同其所表征的财富混为一谈。纸币之所以能够代表财富,不是因为其自身有价值,而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其流通媒介的职能,并以政府信誉做担保,强制其流通。如果抛开这一点,纸币本身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如果纸币不是财富,充其量不过是公民——持币人——的完税证明,持币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外汇储备说到底还是国民创造的财富,并以税收的形式为国家所征收,由中央银行代为管理——前提是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

二、公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的延伸

在厘清了外汇储备资金的属性之后,我们需要

继续辨明外汇储备资金的权属。通常我们会有一个直观的判断:外汇储备是国家的钱。然而这个论断如果成立,则需要首先满足一个条件:发钞机关为国家所有。这个问题并非不是问题,因为当今世界仍有许多中央银行属于私人所有的部门。那么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如何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的规定,作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以下职责:“(一)发布和履行与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四)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五)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六)监督管理黄金市场;(七)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八)经理国库;(九)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十)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十一)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十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从这些职责可以看出,人民银行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都在行使着特定的国家权力。只不过其所行使的权力本身具有特殊性,即事关货币、金融的行政和立法权,特别是体现在立法权上,如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制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及以《中国人民银行令》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等形式存在的文件。《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第3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第6项)。无论我们将人民银行的权力归入经济工作的范畴,还是归入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显然这些都是国务院应有的权力,将此项权力交给国务院的特定部门行使,具有宪法上的依据。而根据《立法法》第8条立法保留条款,事关金融、财政和税收的事项,应当制定法律,全国人大据此制定《中国人民银行法》便具有了宪法上的正当性。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宪法》第62条第3项),既然我们把人民银行看作国家机关之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制定《中国人民银行法》显然是对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的确认。由此可以看出,同国务院其他部委一样,人民银行的权力来自《宪法》。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人民银行乃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其具有“公法人”身份而

不是一个私人的公司或机构。

既然人民银行属于公法人,那么人民银行的资产当属于国有财产。《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外汇储备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说到底,这些全民所有的财产乃是“中国劳动者多年来辛勤劳动的积累”^[4],在本质上是政府对国民的负债,国民与政府围绕外汇储备所形成的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最初是用来表征税收关系的。就其结构而言,税收法律关系类似于私法上的契约关系,因此宪法学家常将税收法律关系看作公法上的债权与债务的关系。不过由于税权所具有的公权力属性,决定了公法上的税收征稽与缴纳关系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不同之处。按照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给付,债的发生可能基于法律,也可能基于约定。公法上的税收征稽与缴纳关系类似于私法上的法定之债,即国家基于法律要求人民进行金钱上的给付。不同之处在于,税收涉及到对人民自由的限制或干预,因此应受到法治原则的限制,即作为债权人的国家应当依法行政,而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应受到充分保障。^[5]更为重要的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给国家设定了特定的给付义务,即国家应向国民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公共物品。在当代社会,民生福利原则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民生福利原则不仅要求政府提供国防、治安、外交、司法等纯公共物品,还要求政府提供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在内的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准公共物品。^[6]这些要求的实现,最终也必然依赖于税权的有效行使。也就是说,国家在承诺为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提供必要保障,并为国民谋求个人幸福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也必然以取得包括税权在内的财政权为前提。反过来,国民既然愿意接受一个政府及其所提供的保护,也必须为此支付对价即纳税。同时也说明,税权的存在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必须以国民的同意为第一要义,税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社会契约的宗旨。

把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界定延伸到货币经济领域同样是适用的,因为国家货币权力的行使产生了大量的负债,同税收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国民同意将货币发行权交给国家,则意味着国家有权通过发钞向国民征税,而外汇储备则是国家所征

收的通胀税收入,最终应归国民所有,而受委托管理这份资产的,是经由国民同意成立的政府部门。不过,把货币法律关系界定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还只是停留在了问题的表面,在实质意义上,现代民主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国民为了满足自身或整体的利益需求而对自我进行的财产权限制,国家只是作为国民的代理人具体地进行征收与支出而已。正如康德所言:“是人民在向他们自己征收赋税,这是根据权利的法律去行动的唯一模式。这种做法可以通过代表人民的代表机构这些中间组织来完成。”^[7]至于通过征收通胀税而积累外汇储备收入的,自然是中央银行这一中间组织。但是关于通胀税和外汇储备收入的完成,未必能够从社会契约理论那里获得解释,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废除通胀税的努力将会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我们不如将其纳入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范畴之中,并通过外在的宪法规则对其加以规制。

既然外汇储备在本质上是一种税收,就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赵锡军的说法是值得推敲的。赵锡军认为,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多印的钞票,而这部分钞票没有对应的商品,因此这些钞票也没有价值,外汇储备是印了钞票买回来的东西,没有谁去创造,所以也不存在还给谁的问题。^[5]按照他的这种逻辑,既然外汇储备没有对应的商品,没有价值,就意味着生产者出口创汇的结果是我们以有价值的商品换来了无价值的废纸。这显然不是政府多年来鼓励出口创汇的初衷。而事实上外汇储备是国民创造的价值,应当同税收一样,由国家通过补贴医疗、教育等途径,还利于民。至于还利的途径,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向国民大规模“派糖”的做法,如果用外汇储备“派糖”,只不过是社会财富进行了一次再分配,并不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主要途径应当是利用外汇储备向国外购买商品和服务,其中一部分用于福利支出,如购买医疗卫生产品用作全民的福利,另一部分商品则可以直接投放国内市场。当然,对于第二种途径,从表面上看消费者个体在购买这些商品时仍需付费,但随着社会财富量的增加,通胀将被稀释,人民币的购买力回升,全体国民将从中受益。此外,我们还可以考虑以外汇储备置换、收购在华外资企业及其股份等。

三、外汇储备之规制建议

高额外汇储备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如可以稳

定经济、提高偿付外债的能力等,然而过多的外汇储备也会成为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的沉重负担,不仅存在着诱发通胀的风险,而且会大大降低资金的利用率。且一直以来,“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被低收益的美国国债所占据,而本可以用来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投资则被迫减少”^[8]。不仅如此,受美元贬值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存在大幅缩水的现象。既然外汇储备是国民的血汗钱,缩水的结果自然是国民财富的流失。《外汇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并未就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增值问题对公众做出过任何披露,公众所知的仅仅是美元贬值和外汇储备的缩水。我国在外汇储备管理上存在诸多漏洞,外汇储备的利用方式、投资途径不透明,缺乏监督,导致寻租和腐败时有发生。根据外汇管理局2011年的年报,我国外汇管理局下设5个驻外机构,分别是华安公司、华新公司、纽约交易室、华欧公司、法兰克福交易室。而在2013年的年报中,纽约交易室变成了华美公司。据《经济观察报》2014年7月14日的资讯:被称为“四朵金花(华)”的几个驻外机构,其投资方向、规模、运作机制颇为神秘,更多的投资信息没有公开,外管局储备管理司(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对此也保持缄默。从法理上来讲,作为受委托管理全民所有资产的机构,与私人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行使的是国民赋予的公权力,因此应当接受法律、监督机关和公众的监督,其运作模式应当公开透明。从立法上来看,外汇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外汇管理条例》,但是该条例对于外汇管理的方式、程序及监督机制都缺乏必要的规定,而作为最重要的财政立法的《预算法》亦没有将外汇储备纳入预算管理,从而使得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资金成了几乎不受法律控制的资产。有鉴于此,笔者建议通过一系列的宪法性货币规则,对外汇储备的规模、使用、管理等做出严格规定。

1. 设定外汇储备总额

在谈论到4万亿美元多不多的时候,丁志杰援引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外汇储备不得少于3个月的进口额、10%的GDP和30%的外债,而2010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可以满足22.5个月的进口、相当于GDP的48.44%和外债的5.2倍,并据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外汇储备总量比较充裕。^[4]其实相关理论最初是由美国金融学家特里芬在1947年提出的,他认为一

国的外汇储备与其进口比率应维持在25%左右,即维持三个月的进口外汇需求,并以20%和40%作为储备的下限和上限。^[9]根据特里芬的观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高出正常水平上限4倍多,而丁志杰在借用相关理论时只提到下限,未提及上限,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如果特里芬的观点是可取的,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则明显高于正常水平,并带来如下问题:其一,与外汇储备失控相对应的是高通胀,加剧了中国本就严重的货币超发问题;其二,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回报率低,且一直受美元贬值影响,不断遭受损失;其三,存在安全隐患,无论是美国国家破产还是国家间发生对抗,都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虽然存在这样的风险,我国却无相关的法律文件对外汇储备的总量加以限制,于是出现了外汇储备规模失控的现象,因此应当通过专门的货币规则对外汇储备总额的上限和下限做出规定,将其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2. 限定外汇储备用途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外汇储备不能直接用于投资,更不能无限度地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能采取“派糖”的形式来发放,而应将其中相应的比例用于向国外购买商品、服务或收购在华外资企业,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由于外汇储备在本质上是通胀税收收入,最终应用之于民,所以立法上应设定用于民生福利支出的最低份额。针对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有大于1/3的份额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并引发了一系列金融风险,建议我国政府严格控制购买外国政府债券的规模。

3. 将外汇储备纳入预算管理

现代国家预算制度就是要将国家的财产资源做合法且合理的分配,并根据分配的内容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建设公共福利事业。^[10]该制度体现了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因此《预算法》通常被看作宪法性法律,其调整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收支权限及其行为。在我国,外汇储备收入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其收与支自然应纳入预算管理。我国现行《预算法》第19条规定:“预算收入包括:(一)税收收入;(二)依照规定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三)专项收入;(四)其他收入。”外汇储备收入可以适用“其他收入”条款,但由于对外汇储备收入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界定不清,实践中并未将其纳入预算管理。因此,在《预算法》修改之时应对外汇储备收入的性质加以界定,并将其与公债收入、货

币发行收入等收入类型一起纳入预算管理。

4. 建立外汇储备透明机制

同货币政策透明一样,提高外汇储备管理过程的透明度,对确保公众知晓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府行为,监督外汇储备的规模及其用途,避免或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都具有重要意义。^[11]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的外汇管理活动都蒙有一层神秘面纱,人们看外汇储备的面貌始终如雾里看花,即便是一些可见的年报、公告等,所披露的也多是无关痛痒的事件和数据,对于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向、经营方式、盈亏状况均无可考之籍,从而也就无从监督,更无从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应当要求外汇管理部门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定期、详细、准确披露有关外汇市场的操作信息,公布驻外机构的财务状况,并接受公众监督,对于涉及外汇管理的重大事项,如购买他国国债、投资海外房地产等,还应举行听证,谋而后断。

5. 启动外汇储备审计制度

审计制度是指由行政机关内设的审计部门,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实施审计监督的一种制度设计。审计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规范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行为,对于外汇储备的管理也是如此。《审计法》第18条规定,“审计署对中央银行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在我国,外汇储备由人民银行下设的外汇管理局管理,因此应当将外汇储备纳入人民银行财务收支范畴。由此可见,对外汇储备实施审计监督有法可依,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功能,给外汇管理部门套上法治的笼头。

四、结语

人类历史的政治法律实践一再表明,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乃是腐败的根源。因此法治理论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强调对公权力的法律约束。在外汇储备领域,外汇管理部门代表国家监管、安排使用外

汇储备资金,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如不能对其加以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势难避免腐败和寻租的发生。尤其面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资金,一旦发生腐败和寻租,其所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量。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官员贪污腐败案例时有发生,表明这里也不是一片净土。腐败的治理不仅在反,更在防,即通过刚性的外在规则和严格的控权机制,将外汇管理部门的自由裁量权降到最低,提高其腐败和寻租的机会成本,将腐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网. 国新办就2014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举行发布会文字实录[EB/OL]. (2014-07-23)[2015-06-10]. 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4-07/21/content_33014759.htm.
- [2] 赵月若雪. 我国外汇储备再创历史新高 合理有效运用是关键[N]. 中国经济时报, 2014-06-23(002).
- [3] 田俊荣. 外汇储备是谁的? [N]. 人民日报, 2011-10-17(017).
- [4] 黄莹莹, 王昭. 外汇储备到底是谁的? [EB/OL]. (2011-11-21)[2015-06-10].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11/21/c_131252996.htm.
- [5] 葛克昌. 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M]. 台北: 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 26-27.
- [6] 洪莹林. 政府征税权与纳税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C]//刘剑文. 财税法论丛(9).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157.
- [7] [德]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 沈叔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56.
- [8] 尹守革. 李克强直言外汇储备变成负担 原本可以不这样的[EB/OL]. (2014-08-10)[2015-06-10]. <http://business.sohu.com/20140512/n399434162.shtml>.
- [9] 郑顺炎. 论我国外汇储备及外汇管理条例[J]. 中外法学, 1998(3): 99.
- [10] 杨志恒. 预算政治学的构筑[M]. 台北: 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 1991: 201.
- [11] 吴礼宁. 将货币发行收入纳入我国预算管理的立法建议[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5): 2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40-05

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法律冲突的解决

刘远山¹, 袁世华², 杨光夏³

- (1.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2. 海南经和纬律师事务所, 海南 海口 570100;
3. 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 海南 海口 570100)

[摘要] 随着国际影视版权贸易的热化, 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这导致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过程中的法律冲突逐渐增多, 冲突规范在解决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冲突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法律适用上, 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是区分适用著作权本体、合同自体法规则, 但也有国家或地区适用单一准据法。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属于合同问题, 可将其归入合同法律适用的问题中进行讨论。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中, 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 但我国法律适用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绝对自由”是有限制的。在当事方选择法律的自由受到限制的领域, “最密切联系原则”暂时位列法律适用法原则的首位。确定合同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即为特征性履行方法。在确定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特征性履行地时, 应以分割论为指导原则, 具体分析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和当事人, 从而分别确定合同准据法。基于影视作品对输入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对许可方和被许可方巨大利润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 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应有例外规定设置, 如直接适用保护国法、强制性规则、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

[关键词] 涉外影视著作权; 文化; 许可使用合同; 冲突规范; 意思自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

[中图分类号] D997.3; G11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7

在全球化环境下, 国家间影视作品的交流频率加大, 在影视著作权涉外利用中许可使用方式尤其多见, 不同国家的不同规定使得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发生纠纷后存在法律冲突。但是, 国际统一实体法在解决其法律冲突的效果方面不够理想, 于是, 各国对冲突规范在解决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冲突方面的作用逐渐被重视。冲突规范是指明某一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如何适用法律, 有别于能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规范的法律适用规范。冲突规范的优势恰是其灵活性, 这是国际统一实体法所欠缺的, 如此以来, 一国国内

冲突规范的调整规制可以有效改善国际统一实体法的僵硬、弥补其空白。然而, 统观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民商事实体法, 延及缔结的区域性条约都没有专门针对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冲突解决的冲突规范, 仅存的法律文件所做的规定也仅是将其当作一般知识产权的合同问题来对待。因此, 本文拟从冲突规范的角度依次研究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一般冲突法、一般合同法适用原则, 提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解决影视著作权涉外合同所涉法律适用问题的最佳设计, 以及对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例外性规定, 以期

[收稿日期] 2015-07-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FX103)

[作者简介] 刘远山(1963—), 男, 湖北省天门市人, 海南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民商法。

更加有效地解决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冲突问题。

一、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一般冲突法适用

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是具有涉外性质的影视著作权本体法律关系与合同法律关系的复合,是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问题。在一个特定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欲区分著作权本体法律关系与合同关系,过程是复杂的,结论也是不明显的。然而,在这种综合问题的法律适用上,究竟是适用单一准据法还是区分适用著作权本体、合同自体法规则,一直都处于争议之中。有学者认为,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应适用同一法律作准据法,既避免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又避免了对合同内容分割适用法律造成的新法律冲突^{[1](P219)},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实践中遵循此种方法。与适用单一准据法相比,区分适用著作权本体、合同自体法规则受到更多学者的欢迎,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适用法中占据重要地位。传统上的合同法律适用方法论有“分割论”与“单一论”之别。相比于单一论主张的对合同种类、诸要素不加区分而统一地使用某特定法律的理念,分割论更合理、可操作性更强,原因在于其针对性强。分割论源于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巴托鲁斯,其产生的年代较早。巴托鲁斯将合同的形式、合同的履行所应依据的准据法分配于不同地域,即合同形式要件由合同缔结地法律规制,合同的履行在进一步区分内容、违约、争议(程序事项)后,分别适用契约所在地、履行地和法院地法律。

由于实践中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件的产生,必然会伴随涉外影视著作权本体法律关系和许可合同法律关系问题,因此,在讨论法律适用规则之前,亟需厘清与著作权有关的问题和合同方面的问题。

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合同中,著作权本体法律关系适用于来源国法已经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亦被多数国家或地区立法所采纳,但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合同中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较多分歧。^{[1](P221)}因为,在影视著作权或者说著作权权利归属上,总有部分内容实质上属于影视著作权法律关系的构成且与许可合同的成立、效力紧密相关,如影视著作权许可的登记、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对抗效力、影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实质性要件与形式要件、权利要素的效力等。

Ulmer^[2]认为,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合同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为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所共有的,理应适用统一规范。例如,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授权的合法性问题需依保护国法律规范与调整。

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及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上,台湾地区法律学者曾陈明汝^[3]认为,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成立要件、效力和当事人之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依据合同之准据法,而只有工业产权如商标权许可合同标的受权利注册、登记成立地法支配。大陆地区法律学者杨长海^{[1](P319)}则与曾陈明汝意见相左,认为保护国法是调整知识产权涉外许可合同的实质性要件与形式性要件的准据法。

鉴于影视著作权独具的特性,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涉外民商事合同的特殊性,对于其实质与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规则所具有的特殊性也应予以关注。但无论如何,它仍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合同问题,因此,应当将其归入合同法律适用的问题中进行讨论。

二、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适用与一般合同法原则

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中,法律适用原则贯穿性地起到了指引作用,无论是全球性条约还是区域性条约协定,均认可意思自治原则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更是采纳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指导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4](P287)},其地位与意思自治原则可谓并驾齐驱。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适用中,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即为特征性履行方法。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是兼具多种法律属性与特征,对于构成其法律关系的各要素,应当在合同的适用法律问题基础上条分缕析。

1.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的运用

“意思自治”滥觞于《法国民法典》,自由资本主义形成以来被奉为经济、法律运行的最高准则。在涉外许可合同的法律适用上,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均立于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之上。意思自治原则在各国家或地区民商事法律和冲突法中主要表现为期待、允许当事人协商选择合同的准据法。笔者分析其原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的大趋势下,公民的经济自由有时也体现为选择法律的自由,特别是公民有权选择与其本身及其合同无密切联系的法

律。深入而论,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冲突规范指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占首位,如《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意思自治原则同样体现在《合同法》第126条和《民法通则》第145条。《日本法例》第7条第一款规定,关于法律行为的成立、效力,按当事人的意思确立应以何国的法律为准。《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也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欧共体1980年《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第3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于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法律。泰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匈牙利、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均在其本国的法律中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及其地位。^[5]笔者认为,解决合同的法律冲突与纠纷问题,可以借鉴如下方法:当事方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将所有与合同有关的纠纷交由某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律来调整,以避免法律冲突。

各国家或地区总是基于具体的文化传统、法律理念和国情,对当事方自主选择法律的行为予以相应的限制。参考各国民事立法、法律适用法和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意思自治原则所赋予当事方的选法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发挥功能的空间也不是全覆盖的。中国法律适用法在拟定、修改及定稿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国际条约和发达国家的立法技术,其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律适用及限制,可以透出国际条约和国外法律相关规定的影子。中国法律适用法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绝对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初衷是善意的,行为是合法的;二是不得违反公共秩序;三是当事人协议变更所选择法律的时间须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亦不得影响合同形式上的有效性和对第三人权利造成不利影响;四是不能选择外国的法律适用法;五是特定合同直接适用中国法,当事人无权选择,已做选择也无效^[6]。在当事方选择法律的自由受到限制的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上升至法律适用法原则的首位。

2. 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性履行方法

很多许可合同之所以未就法律适用条款达成一致,是因为合同双方在棘手的实质性问题上的谈判选择法律的更多。^{[2](P102)}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基于对对方当事人国家法律不熟悉的考虑,害怕适用对方法律会对己方利益造成损害(或潜在损害),从而承受不可预知的风险。因此,如何处理涉外影视著作权法律关系双方对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

使用合同准据法未约定的情况(或约定无效的情况),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需要规制的问题。通过研读部分国家或地区法律适用法的立法,笔者发现,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在法律实践中解决此问题的主要方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当涉外合同当事方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合同所应适用的准据法时,则应将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作为准据法的原则。即使是粗略地研究最密切联系原则也会发现,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合同领域里是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辅助而存在的。这项发轫于美国法中的原则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所选择和移植,更在有些民商事国际条约中有所体现。

E. Bartin^[7]曾主张,涉外知识产权许可合同适用合同签订地法律,笔者认为此观点存在不合理之处。因为,合同的缔结方式有多种,在涉外合同的签订方式中传真、邮件等方式的应用已很普遍,双方谈判过程也可能异地、异国进行,如此以来,合同签订地的确定就具有了复杂性。假使择当事方任一所在地确定为合同签订地,也未必合理,因为双方可能是通过信函或者网络沟通好后而另行选择的一方便地。^[8]

确定合同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应依据最具特征的义务履行行为来确定,即特征性履行方法。^[9]依据特征性履行方法确定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准据法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较为复杂的原因如下:首先,许可使用合同是持续性合同,影视著作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是存续不变的;其次,在影视著作权人和被许可人法律关系维系期间,双方权利义务的稳定状态中又夹杂着不确定因素;再次,有专有许可和非专有许可之别,专有许可下又有独占许可与排他许可之分,影视著作权人与被许可人在合同中所承担的义务难以一刀切地定量。鉴于上述原因,在确定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特征性履行地时,应当以分割论为指导原则,具体分析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和履行人,从而分别确定合同准据法。

就特征性履行方法而言,依其确定的最密切联系地不止一个,因此所应适用的国家法律亦存在多种可能。例如,影视著作权人可以主张如果没有其名下的影视作品,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合同关系下的各种附随关系及经济报偿即无从谈起,由此,其所在地是最密切联系地。然而,被许可人会主张著作

权人所获得的经济回报是基于其对目标影视作品及著作权的运作,因此被许可人所在地是最密切联系地。除当事方的上述主张外,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实际履行实施地,以及作为目标影视著作权的利用实施所在国,也与其具有最密切联系。

为了解决著作权涉外合同所涉的法律适用问题,各国家或地区曾为此做出过积极努力,设计了诸多制度安排,专家学者也著书立说提出了多种立法设计。但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最终最密切联系原则被认为是最佳设计。^[10]除此之外,笔者还总结了其他三种主要解决方法。一是主张著作权人惯常居所地与涉外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联系最密切,应适用该地所在国家的法律,其理论根据为著作权人所在国家是影视作品或者影视著作权来源地,也是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内容的来源地。例如,《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就肯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习惯居所地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的理论。而Ulmer^{[2](P102)}则认为,仅在特定情况下,即在许可合同性质为非专有许可合同,或者是专有许可合同但被许可人分布于多个不同国家之时,可以适用目标著作权人所在国家法律。二是主张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适用被许可人惯常居所地(主营业或者总部所在地)之法,其理论根据在于涉外影视著作权合同的“利用”理论。在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签订之后,被许可人的运作、经营影视作品和影视著作权的合同义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被许可人的“利用”是达成双方缔结合同目的的关键。虽然著作权人也负有部分合同义务,如监督、技术援助等,但是这些都是附随义务。因此,被许可人的履行是最具合同履行特征的,其惯常居所地国法律应该被适用。该主张在《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第43条中也有所体现。此种观点也有其缺漏之处。假设,被许可人并不是在与其具有最密切联系地国而是在第三国利用经营、运作目标影视著作权,此时与影视著作权涉外许可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应是影视著作权实际实施利用地,该国的法律应被适用。三是主张适用保护国法律。在国际法上,保护涉外当事人权利的程序中普遍适用着“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影视著作权的实际实施地最可能成为保护国,适用该国法律意味着合同所涉全部法律关系受到同一法律的调整。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适用保护国法模式有可能造成新的法律冲突,即当著作权人授权同一被许可人在多国使用的情况下,则存在多个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而这些地区的法律很可能

互相冲突。如果遇见这种存在多个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则应以被许可人惯常居所地法作为准据法。

三、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例外性规定

1. 直接适用保护国法

涉外知识产权合同的一般法律适用法,无关合同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特别规定,均与其他合同事项受同一法律调整。涉外影视著作权法律适用规则的例外性规定,是基于影视作品对输入国的文化的影响。涉外影视作品的输入国,无论是想加以利用还是抵制所引入影视作品对其国内的社会或是民众的文化、潮流、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手段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控制涉外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Beier^[11]认为,涉外知识产权合同的特殊形式应适用保护国法律,因为,只有先满足保护国关于被保护知识产权的形式要件,才会有获得该国法律保护的可能,而且各个国家或地区法律关于程序性事项和形式要件之规定都是强制性的。我国学者杨长海^{[1](P338)}也认为,保护国法中关于知识产权合同的形式与实质性的特殊规定应构成例外规则,合同当事人须首先满足保护国法律关于形式要件的规定,其次才是关于实质要件的规定。

笔者认为,制定影视作品著作权涉外利用的例外规定是有必要的,因为与其他知识产权相比,影视作品隐含的作者众多,同时也造成了精神权利的复杂性,此外,还可能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其特殊性可致使其合同诸要素的法律适用规则部分地背离一般合同的国际私法规则。如Ulmer^[2]就认为,著作权涉外许可使用的对抗效力属于程序事项,具有公法效力,应适用保护国法律而非合同的准据法。通过考察目前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笔者发现,涉外知识产权合同的形式要件一律适用合同的准据法的制度占主流,对世界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论影响颇为深远的《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也采纳了此种立法安排。但对于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形式要件效力而言,其实质要件效力受保护国规制的更加紧密。由于各国家或地区法律大多没有否定涉外影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当事人可自由就合同应适用的准据法作出约定,这使涉外知识产权合同当事方所选择的准据法与保护国法律之间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12]

2. 强制性规则

强制性规则是直接适用法之一种,是指涉外案件不必经冲突规范的指引,而由一国法律规定强制适用于特定案件的规则。直接适用法多数情况下存于民法典或者国际私法之中。由于知识产权法律具备“公法性”特征,著作权法除具备公法性质外,还关乎一国的文化传承,因此,涉外影视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也受到更多的强制性规则的规制,这从中国引进国外电影、电视剧必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批可见一斑。强制性规则不仅排除了特定冲突规范的适用,更排除了当事人自主约定准据法的选择权。

3. 公共秩序保留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共秩序被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在国际私法领域被称为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在英美法中被称为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2](P89,47)},在德国被称为保留条款或排除条款^[13]。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是一种否定性的强制性规则,是当我国法院认定,若适用当事人选定的准据法或者国际惯例将会损害本国的基本政策、利益、道德时,受诉法院有权排除其适用,迳而适用中国法律的一种保留制度。^[14]我国《民法通则》第8章规定,“依照本章规定应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能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当我国引进外国影视作品时,在该涉外法律关系所依据的准据法、应适用的国际惯例将危害本国的公共利益时,一旦出现纠纷,纠纷的受诉法院可以直接依据我国法律认定将要适用的准据法等无效,而直接适用中国法律。

四、结语

涉外影视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冲突规则,即使从世界范围看,也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但基于影视作品对输入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对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巨大利润等多方冲突,很难简单地适用

哪一种冲突规范是最恰当的。对于影视作品产业并不发达但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应从他国涉外影视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适用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求同存异,总结、完善和发展可行的规则,重视例外规定的设置,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涉外影视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冲突的冲突法规范。

[参 考 文 献]

- [1] 杨长海. 知识产权冲突法论[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 [2] Eugen Ulm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nflict of laws[M]. Deventer: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ing Division, 1978.
- [3] 曾陈明汝. 国际私法原理[M]. 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1993:278-281.
- [4] 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 [5] The European Max Planck Group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Principles for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 Oxford:OUP Oxford,2011.
- [6] 曲三强.论影视作品的著作权[J]. 中外法学,2006(2): 54.
- [7] Bartin E. Principl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et[M]. Paris: Dormat-Montchrestien, 1930:69.
- [8] 刘仁山. 国际合同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晚近发展[J]. 环球法律评论,2013(6):44.
- [9] 李冠群. 国际私法系统视野下的最密切联系原则[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0.
- [10] 谢宝朝. 合同冲突法的当代发展及我国的立法完善 [D].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2.
- [11] See Beier. Conflict of law problems of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J]. IIC-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d Copyright Law,1982(2):178.
- [12] 齐爱民,何培育. 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法律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J]. 知识产权,2011(2):34.
- [13] 肖永平. 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
- [14] 马德才. 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45-04

非法买卖卵子问题成因与规制建议

张书增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目前,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和内在原因导致大量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出现,在市场需求刺激下,买卖卵子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尽管其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但仍然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巨大、供卵者对卖卵行为可能造成的身体危害缺乏足够认识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因此,我国应当建立科学完备的卵子库,加强对在校女大学生的宣传教育,出台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对买卖卵子行为的惩处力度,扩大惩罚主体的范围,对于违法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键词] 非法买卖卵子;代孕;卵子库;捐赠卵子

[中图分类号] D9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8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利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中介机构和医疗机构,以商业化的形式进行非法买卖卵子活动。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严禁非法买卖卵子,但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缺乏明确性、处罚对象有限、处罚手段单一,加上高额利润的引诱,非法买卖卵子行为依然屡禁不绝、频繁发生。本文拟通过分析非法买卖卵子行为频发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以期尽早消除非法买卖卵子这种既违反法律规定又违背伦理道德的商业行为。

一、问题的引出

2015年1月11日,新华网刊登了一篇名为《非法代孕产业链一单挣40万 大学生按姿色标价》的新闻。^[1]根据该报道,中介机构所瞄准的对象一般都是20岁左右的在校女大学生,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卵子质量好、成活率高。这些女大学生根据条件要求被划分为不同的档次,所得报酬从3万元到10万元不等。中介机构利用基于互联网的移动设备,通过聊天软件等进行宣传、发布广告,然后对报名者个人资料进行整理,优先录用那些学历、外貌、身高、体重等条件均佳的女生,给她们打大剂量的促

排卵针,刺激其内分泌,然后运用卵子提取技术把卵子取出,卖给买家。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卵子行为,但非法买卖卵子的黑中介、黑诊所依然存在,其地下活动依然故我。为什么买卖卵子行为在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然频频发生?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去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笔者将就此问题浅谈一下自己的认知与见解。

二、非法买卖卵子行为频发的原因分析

造成当前我国一些代孕中介机构、私人诊所、公立医院的部分医生非法从事买卖卵子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买卖卵子的市场巨大

买卖卵子的市场巨大是造成目前我国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猖獗的客观原因。目前,受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下降、日常工作压力加大、晚婚晚育等众多外部因素与自身内在因素的影响,我国患有不孕不育症的人群越来越多。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育龄妇女中有10%患有不孕不育症^[2],加上男性患者,不孕不育患者在我国所占比例大大超过15%,这意味着在我国每年大约有将近100万患有不孕不育症的

[收稿日期] 2015-07-18

[作者简介] 张书增(1991—),男,河南省周口市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法、法理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夫妇们需要借助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来实现他们的生育愿望^[3]。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卵子需求者,但仅有需求者没有供应者也形不成买卖。而现实中由于受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影响,一些女大学生基于各种原因自愿做供卵者,如有的想与同龄女性攀比、有的想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等,卖卵子可以快速实现这些愿望。

由于买卖卵子市场潜力巨大,牟利性高,一些中介机构、私人诊所乃至公立医院的部分医生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便无视法律、肆无忌惮地进行非法买卖卵子活动。有的中介机构为了使自己从事买卖卵子的生意更具吸引力,甚至打出了“包生男孩只要100万”的广告。据武汉一家中介机构的吴姓老板透露,他们顺利完成一次卵子买卖,中介机构可以净赚六七万元。^[4]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不惜违反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与中介机构暗中勾结,参与非法买卖卵子活动。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2009年7月,罗马尼亚执法人员发现30名以色列妇女和一群以色列医生涉嫌卵子非法交易,经证实其中至少有两位医生受雇于以色列公立医院。^[5]在国内,2012年10月16日,深圳市卫生监督局查处了两处非法买卖卵子的场所,经卫生监督部门证实,有部分公立医院医生参与了该非法买卖卵子活动。^[6]可见,不论是中介机构还是医疗诊所,抑或医务人员,都可从非法买卖卵子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对于那些女大学生供卵者来说,本身条件越好其卵子的卖出价格就越高,如一家黑中介开出的最低价格是2万元,如能同时达到“90后、本科以上学历、外观漂亮且多才多艺”三个标准,则可获得近10万元。这对一些在校女大学生是不小的诱惑。

2. 供卵者对卖卵行为可能造成的身体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

供卵者主要是一些在校女大学生,她们对卖卵行为可能造成的身体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是造成我国非法买卖卵子行为频现的主观原因。在校女大学生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条件而成为那些不孕不育症患者群体和中介机构紧盯的重点对象。但买卖卵子的过程及之后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并不像一些中介机构所宣传的和部分女大学生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一些女大学生会轻信中介机构的花言巧语,认为卖几颗卵子并忍受一时的痛楚就能赚一大笔钱是绝对划算的,忽视了其背后所隐含的可能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巨大损害的危险性。据了解,黑诊

所为了获取卵子,一般会通过给供卵者打大剂量的促排卵针等激素类药物促其排卵,刺激女性卵巢分泌与卵子的排放,直至达到预期的数量为止,然后运用卵子提取技术把卵子取出,这可能导致供卵者大出血、子宫感染等。据广州医学院黄青副教授介绍,正规医院一般是在做试管婴儿前进行促排卵,且考虑到安全性,卵子会控制在10个左右,但卵子买卖机构往往会不顾供卵者的身体健康,一次就会促排四五十个卵子^[7],这样容易引发多种并发症,可能造成不孕、中风,更有甚者可能会导致脑血栓、内分泌紊乱或诱发肿瘤等。而那些卖卵的女大学生之前由于受到了中介机构“低风险,高回报,无伤害”口号的蛊惑,加之不完全了解卖卵行为往往会伴随着严重的身体危害,最终导致她们作出了可能影响其终身的错误决定。

3.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是造成目前我国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猖獗的直接原因,也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执法不力。代孕网站堂而皇之地在网上做广告进行买卖卵子的宣传,买卖卵子的信息更是通过QQ、微信、贴吧等进行传播。而我国卫生部门只负责监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而对这些互联网站、电视传媒、聊天软件和中介机构的非法宣传,公安、工信、工商等部门虽然在执法权限上都能监管,但因为没有明确的分工,现实中很少有部门去管理,从而造成“都有权管,却没人管”的尴尬局面。

二是立法缺失。首先表现为行政立法上的不足。虽然我国卫生部门已经制定实施了有关禁止商业性卵子买卖行为的部门规章,如卫生部2001年颁布实施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3年8月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准则》,但这三个部门规章的法律层级较低,效力有限。目前我国缺乏专门规制买卖卵子行为的特别法和上位法,这也导致了相关规章的威慑力不足、实施区域较窄。而且这三个部门规章仅仅对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有关买卖卵子的问题上进行了法律上的约束,对公立医疗机构之外的个人和中介机构的买卖卵子行为则没有明显的约束力,其法律约束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而对于那些参与买卖卵子的黑诊所和中介机构,由于它们没有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查处时最多只能按照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处罚。法律规定的威慑力不足和法律约束主体范围狭窄,是导致一些私人诊

所和中介机构敢于从事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主要原因。其次表现为刑事立法上的不足。我国《刑法》并没有直接对非法买卖卵子的行为在定罪量刑方面给予具体的明文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对该行为直接适用《刑法》。假如一定要对该行为进行刑法上的惩罚,那么也只有运用类推解释的方法对其进行法律推定,而与该行为最具有关联的罪名也只有非法经营罪、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等。但按照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处理刑事案件时是禁止采用类推解释的,这样就不可能对非法买卖卵子的行为给予上述三个罪名的惩处。而且根据《辞海》的解释,器官是指多细胞生物体内由多种不同组织构成的结构单位,具有一定形态特征,能行使一定生理功能。^[8]根据这一解释,目前还无法把卵子界定为人体器官。因此,就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来看,很难对非法买卖卵子过程中起助推作用的中介机构给予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惩处。同样,由于在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基于取卵过程会导致供卵者的身体健康问题,能否直接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尚有待商榷。这就更加促使中介机构和私人诊所产生钻法律空子、逃避法律制裁的想法,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中介机构和私人诊所参与到非法买卖卵子行为中。

三、对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规制建议

为有效遏制非法买卖卵子行为,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卵子中介机构、私人诊所及部分医务人员,特提出以下规制建议。

1. 建立科学完备的卵子库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公立医院都面临着不孕不育患者“无卵可借”的尴尬局面,整个社会对于建立卵子库的呼声极为强烈。因此,为了帮助不孕不育症患者实现其生育愿望,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卵子库,进而促进家庭和谐、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领域的首要任务。首先,卵子库建立应在广大健康成年女性无偿、自愿捐赠基础上进行,而国家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其捐赠行为给予鼓励性的经济补偿。其原因在于,一是卵子非常宝贵。据研究,正常女性一生排卵也只有400多个左右,且20~30岁之间女性的卵子质量最好。二是取卵过程很痛苦,即使在正规医院进行卵子捐赠,也需要一次促排10个左右,并通过卵子提取技术取

得,其过程会伴随着精神上的痛楚,也可能造成身体上的损害。三是捐赠者需要为此付出时间、精力和误工损失等,因此应当给予她们必要的经济补偿。这一方面可体现出基本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能够以此鼓励一些年轻女性积极捐献卵子。对捐赠卵子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各国补偿标准不一,美国是5000美元^[9],西班牙和捷克分别是900欧元和500欧元^[10]。借鉴国外对于供卵者的补偿标准,笔者建议我国也应对捐赠卵子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只不过该补偿主要是鼓励无偿的、自愿的卵子捐赠行为。其次,应当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卵子库的运作给予监督,保障卵子库朝着正规化、程序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最后,应建立科学、完备、合理的管理模式,真正做到便民高效,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服务。例如,国家可以制定出台《卵子捐赠法》,就卵子库建立的相关要求进行具体规范。同时,应加强对有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知识的宣传,促进民众对建立卵子库的深入了解。

2. 加强对在校女大学生的宣传教育

正如前文所述,供卵者主要是一些在校女大学生,她们对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法律性质缺乏足够的认知,也不知道非法买卖卵子行为背后所隐藏的身心危害,只知道卖卵子能够获取高额报酬,这是造成非法买卖卵子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使在校女大学生能对非法买卖卵子行为有足够和正确的认知,促使她们懂法守法,爱惜自己,远离商业性卵子买卖活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各高校应开展与卵子买卖内容相关的法律知识讲座、辩论赛、学术论坛等活动;二是各高校应邀请医护人员在“三·八”妇女节、新生入学等时间节点在学校设立宣传站,积极宣传非法买卖卵子的危害;三是应鼓励在校女大学生通过正规公立医院自愿捐献卵子。

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造成目前我国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猖獗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建议从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同时入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在立法层面上,西方一些国家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颁布实施了规范卵子捐赠及与卵子买卖行为相关的法律。例如,英国1985年颁布了《代孕安排法》,禁止各种新闻媒体刊登有关代孕安排事宜,并将商业性代孕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德国1989年颁布了《收养经纪法》,规定一切意图中介潜在委托夫妻和代母的商业广告均构成刑事犯罪;法国1994年

通过了《生物伦理法》,直接将买卖人体精、卵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加以惩罚。^[3]借鉴西方国家对卵子捐赠及卵子买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对于卵子捐赠与买卖行为,可在参照卫生部施行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台《卵子捐赠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国家能参照捐献精子的规范制定捐献卵子相应的补偿标准,为类似卵子这些生殖细胞组织移植捐献单独立法,建立一套合理的捐献管理体系,相信捐卵带来的伦理方面的问题也会小很多了。”^[11]

在未来的《卵子捐赠法》中,首先,应当明确禁止任何商业性买卖卵子的行为,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商业性买卖卵子行为,应加大惩处力度,扩大惩罚主体,增加处罚手段,以起到威慑犯罪的作用。由于目前中介机构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电视传媒、聊天软件等进行前期的广告宣传,其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对于互联网、电视传媒、聊天软件及中介机构的查处并没有特定的法律授权机关,这就使得主管机关因职责不明确而相互推诿,形成不了有效的合力。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查处互联网、电视传媒、聊天软件及中介机构的权力赋予工商部门、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及工业和信息部门等,通过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加强合作、交流、沟通,最终形成对买卖卵子整个过程进行法律规制的治理体系。同时要严肃查处未经合法登记的中介机构,非法从事买卖卵子的私人诊所和相关医务人员等,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其次,应当就如何建立卵子库进行系统而完备的规定,完善卵子库的监督运行机制,同时应对捐赠卵子者,以及卵子申请者加以限制,比如捐献者必须年满18周岁,对于申请者必须经由公立医院开具证明,确实属于不孕不育者才可申请;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并对捐赠卵子者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最后,应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以牟取利益为目的的非法医疗单位与中介机构,以及医生在取卵过程中对一些供卵者所造成的实质损害与隐性侵害,借鉴国外立法理念与技术,在我国刑法中分别设置相应的罪名,诸如组织买卖卵子罪、发布和传播买卖卵子信息罪、故意伤害罪等。

在执法层面上,应贯彻实施上述立法,由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和惩罚非法买卖卵子活动。惩罚主体应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非法组织买卖卵子活动的中介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2)以互联网、电视传媒等方式进行发布和传播买卖卵子信息

的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3)未经卫生部门批准从事卵子捐赠与买卖的私人医疗机构;(4)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商业性卵子交易的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可实施的处罚方式应主要有:关闭中介机构及用于发布和传播买卖卵子信息的网站、电视传媒等;对有关主要负责人进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处以行政拘留;取缔未经卫生部门批准而从事卵子捐赠的公立医疗机构与私人医疗机构,并对涉案的医疗机构和医生给予没收违法所得、暂停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限期整改、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等处罚;对于在买卖卵子过程中有触犯到上述有关刑事立法建议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应当在执法过程中对一些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加强监督与教育,同时采用各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有关非法买卖卵子的宣传网站、电视传媒、聊天软件、中介机构、私人诊所和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可匿名发送电子邮件至举报邮箱,同时有关方面应给予举报群众以物质上的奖励作为鼓励。

四、结语

目前,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了大量患有不孕不育症妇女的出现,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法律规制的缺失导致了許多商业性买卖卵子行为的出现,其不仅违反了现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也违背了有关的社会伦理道德,而且还可能引发许多新问题的出现,如买卖卵子合同的效力问题,基于买方提供的精子和卖方提供的卵子所形成的胚胎在孩子出生之后的身份问题及在未来的继承问题,以及在取卵过程中对供卵方身体造成轻伤以上的损害将依据何种法律和如何定性的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是应当尽快建立卵子库,逐步完善与之配套实施的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鼓励广大健康成年女性积极捐赠卵子,同时给予其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补偿;二是要加强对在校女大学生的宣传教育;三是要进一步健全现有的法律法规,明确联合执法主体,加大惩罚力度,扩大惩罚主体范围,增加处罚手段。

[参 考 文 献]

- [1] 新华网. 非法代孕成产业链一单挣40万 大学生按姿色标价[EB/OL]. (2015-01-11)[2015-06-16]. http://www.zj.xinhuanet.com/adnews/2015-01-11/c_1113951093.htm.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49-05

一种问题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以《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分析样本

张宝锋, 侯利文

(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0;
2.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是罗伯特·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一项重要考察,是作者研究20世纪后期美国公民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鸿篇巨著。该著作反映出作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采用问题视角,层层推进:在问题导向部分,作者将客观呈现与主观建构相结合,指出20世纪后半期是美国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逐渐流失的时期,以引发读者的种种猜想和思考;在问题展现部分,围绕着“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变化的趋势”这一主题,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全方位、多领域地验证了美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在20世纪晚期出现的衰减趋势;在问题探因部分,采用自问自答、逐步归因的方式,揭示了美国社会资本衰减的可能性原因;在结果陈述部分,探讨了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的衰减趋势会导致的后果,指出美国社会中社会资本的衰减会导致其功能的紊乱,同时选取一些具体案例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削弱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在路径探讨部分,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首先建构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建立起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其次使集体行动(如社区事务和社区参与)成为可能,然后推动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议程、实现社会变迁。《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人们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借鉴:一是学术研究必须要做到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不是堆积大量的数据、华丽的辞藻,一味地回避;二是拓展了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美国社区衰落与复兴问题的框架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指引我们深入思考其身处之地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参与问题。

[关键词] 问题意识;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公民参与;社会资本;社会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C912.8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9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继对意大利民主进行研究之后对美国民主社会的一项重要考察,作者在书中承继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问题意识和传统,是帕特南在经过多年持续研究、广泛搜集散布于美国社会的各种数据和案例的基础上,经独具匠心地梳理而形成的研究20世纪后期美国公民社会发

展变化的一部鸿篇巨著。该书对一个社会资本逐渐式微的民主国家进行了独特的社会学解读,其伟大之处不在于宏观庞大的理论建构或提炼,而在于大量实证资料的积累与筛选。《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于层层推进之中找出“元凶”。诚然,该著作并没有穷尽美国社区衰落之

[收稿日期] 2015-07-02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三重”重大项目(2014-SZZD-01);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资助项目(2014-zd-085);201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张宝锋(1966—),男,河南省鹿邑县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城市社会学;侯利文(1985—),男,河南省洛宁县人,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美国休斯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

原因,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本对美国社会资本式微叙述的扛鼎之作。正如保罗·斯塔在《新共和》一书中所言,此后如果任何人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学术讨论,都必然要参阅帕特南的这本书,思考这些议题。

“独自打保龄(Bowing Alone)”语带双关,在作者看来,其意是指20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美国社会的社区生活逐渐衰落、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等造成的美国公民社会的衰落、公众意识的式微。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是复杂而不确定的,但其后果是明确的,即美国公民社会参与的衰落、民主社会根基的动摇。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帕特南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论证和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影响程度(各种因素该为此现象负多大责任),指出美国社会在当代所遭遇的挑战,并试图找到应对之策。本文以罗伯特·帕特南的巨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样本,采用问题视角,从问题导向、问题展现、问题探因、结果陈述、路径探讨等不同方面,系统解析帕特南在该著作中的行文思路、内在逻辑,以及该著作所体现的科学研究精神,以期为人们理解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提供参考,为人们的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

一、问题导向:客观呈现与主观建构相结合

与学术上的其他文章和著作一样,帕特南也是在对美国社会的现实进行全方位和各个时段的比较分析之后发现问题的:美国社会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社会资本不断流失。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宾夕法尼亚州的格伦谷桥牌俱乐部是在何时、因为何种原因而解散的,尽管在1990年的时候,这个社团仍有40多个成员会像50多年前一样定期凑在一起打打牌。”^{[1](P3)}作者开篇就通过援引这样的一系列社团的遭遇,指出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悄无声息的变化,即社会资本的流失,而且这种现象已被公众所感知:“在1999年的几项调查中,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的公民生活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开始减少,他们童年时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要高过现在,整个美国社会关注的是个人而不是社区。超过80%的人说,社区应该得到关注……”^{[1](P15)}客观的现实,加之人们的主观建构与认同,社会资本的流失在美国俨然已成为“铁一样”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

二,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美国人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社区生活里,不过就在几十年前,一股静悄悄的潮流毫无预警地逆转了这个浪头。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我们在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渐渐疏离了亲友和社区生活”^{[1](P17)}。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它确实是已然发生了。

在全书的导论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事实的排列和相关民意的调查,说明了美国公民参与状况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思考美国社会发生变化的主题之下,指出20世纪后半期是美国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逐渐流失的时期,以引发读者的种种猜想和思考。

二、问题展现:全方位、各领域

围绕着“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变化的趋势”这一主题,帕特南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验证了美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在20世纪晚期出现的衰减趋势。

社会参与的本质就是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因此,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社会参与情况,就要考察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在这一部分,帕特南首先分析了美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的变迁情况。就政治参与而言,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字之后得出结论:“罗珀民意测验所测量的每一种社区参与形式的频率出现了显著下降,从最常见的(在请愿书上签字)到最不常见的(竞选公职)。今天,美国人玩任何一种公民游戏要比20年前少得多。”^{[1](P33)}这是从罗珀政治与社会趋势调查(1974—1994)发现的事实,即美国的政治参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是行文至此,我们还可以假设这一下滑趋势可能只是美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的变化,而不是由于某些因素而导致的趋势性的变化。帕特南的分析打消了我们这方面的想法,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变化是两个过程相结合的产物,即“超年龄群变化”和“跨年龄群变化”的产物,前者可以很快发生也可以很快地被颠覆,后者过程虽更为缓慢、微妙,但一旦发生很难出现逆转。在他看来,美国社会政治参与的下滑趋势正是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公民参与来看,法国著名政论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指出,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在组织社团、参与组织。这与《社团百科全书》所列举的数据相一致,美国非盈利性社团的数目在1968—1997年间几乎翻了一番。非盈利性社团是

公民参与的主要平台与载体,从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公民参与度在20世纪后半期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推翻美国社会参与衰减的事实。但严谨的帕特南在深入分析这些数据之后发现:“在20世纪后几十年,美国自愿社团的数目虽大约翻了三番,但平均会员数似乎是原来的十分之一——社团数目是增多了,但大部分社团却小了许多。1960—1990年组织发展的繁荣,体现为社团数而非基层参与的增加。”^{[1](P43)}紧接着帕特南以美国社会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社团——美国退休者协会和家长教师协会为例,从个别组织会员数和社区的实际参与度两个方面验证了美国公民参与的衰减。

帕特南并没有就此得出结论,而是继续追踪美国社会在宗教参与、工作联系、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利他主义、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社会信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通过历史与现状的比较,运用大量的数据,印证了美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衰减。

三、问题探因:自问自答,逐步归因

接下来的主题是回答“为什么”,帕特南主要探求并揭示了美国社会资本衰减的可能性原因。我们认为,研究者此部分对数据的分析和说明可以看作社会学研究中因果分析的范例,其方法论意义甚至大过其理论解释意义。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经常采用一种独特的、以自己向自己提问、在研究进展中又不断替读者向自己的研究结论质疑,从而引发更深入思考的叙述方式。

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研究假设:社会参与的减少是否与具有一定社会特征的时空变化有所关联,同时把“具有一定社会特征的时空变化”这一变量化为一系列的指标,如忙碌和时间的压力、经济难关、妇女加入劳动大军、居住地频繁变动、郊区化及其扩展、电视、电子革命和其他科技变革、经济结构和规模的变化、婚姻和家庭联系的断裂、代际更替等。与此同时,作者提出了确定因果关系的四项参考标准:一是相关性因素,即提出的这一解释因素是否与因变量社会参与相互关联?二是这一相关是虚假的吗?是否存在中间变量导致了这一相关?三是所提出的解释因素是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四是所提出的解释因素是否有可能是公民参与的结果而非原因?作者在这一部分就是按照这四项参考标准逐步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真假的。

比如,在考察“时间和金钱压力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时,按常理来看,“最有可能导致我们推出社区事务的嫌疑犯就是时时刻刻的忙碌”,即没有时间、太忙了等。已有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解释,“认为‘我总是觉得急匆匆’的人口比例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激增了将近一半。在整个1980、199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得非常辛苦’,而且经常‘很晚都在加班’”。再如,“DDB Needham调查中,之前一年至少每月‘工作到很晚’的那部分美国人从1985年的29%稳步攀升到1999年的38%”^{[1](P218)}。因此,不论是人们的习惯还是现实中的实际情况,都显示了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少,同时社区参与也在逐步下降。但研究马上又从他人的角度向自己提出了存在偏误的可能性:“首先,一个人拥有的闲暇时间的长短似乎对于他是否参加公共活动影响甚微,这里存在因果倒置的可能;其次,在那些感觉最不忙碌的人和感觉最忙碌的人中,对公共活动的参与都出现了同样程度的减少。”^{[2](P221)}这些质疑都是致命的。如果不对这些可能性进行验证和排除,前面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将大打折扣。而正是这样的一种从他人角度提出质疑然后又不断证实或证伪质疑的过程,使研究者将研究引向了深入,从而发现了虚假表象背后的“元凶”。

否定了时间因素之后,种种线索似乎把“元凶”引向了“金钱压力”。首先,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明显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间。“1975年初,在40年里最严重衰退的最低谷,仍有74%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家庭收入足以满足我们几乎所有的主要需求’,但到了1999年,尽管经历了连续8年的增长,这个指标却降到61%”^{[1](P222)}。其次,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将集中全力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对社会参与势必也有所减少。“资金的焦虑不仅导致更少人去看电影——这也许是囊中羞涩的自然结果——也导致和朋友相处、打牌、家庭娱乐、去教堂、志愿服务以及对政治的兴趣变小。”^{[1](P223)}但是,帕特南并没有立即宣称其找到了“元凶”,而是自找麻烦似地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首先,是对经济萧条期的反驳:“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的减少似乎在1970年代经济困难之前就开始了,并且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后的繁荣中,这种趋势没有任何逆转。”^{[1](P223)}其次,在对不同阶层进行调查之后,他发现社区参与的减少幅度对不同阶层的人而言没有差异,即在不同的阶层中社区参与减少的幅度大体一

致。至此,帕特南得出阶段性的结论:时间和金钱压力都只是次要的因素,其对社会资本的减少负很少的责任。如果作者不进一步对这些质疑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他前面得出的结论就会马上失去意义。也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自问自答,才增强了其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说服力。

帕特南正是在这样逐步归因的过程中,分别实现了对夫妻双职工家庭、流动性与扩张、科技与大众传媒、代际更替等因素的剖析,完成了本部分对“为什么”的条分缕析。正如风笑天所言:“在已经得出的结论后面,又展开如此详细和复杂的分析过程……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站在读者和他人立场上、自己对自己质疑的方式,使读者跟着研究者的思路,一步一步地走向令人信服的结论。而那种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回避或忽视对结论构成挑战的各种细节和疑问的做法,往往会受到读者更多质疑。”^[2]

四、结果陈述:问题引发的后果如何

帕特南在问题探因之后探讨了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衰减趋势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解决的是“那会怎么样”的问题。他采取的行文路线是,先交代社会资本的功能,进而指出美国社会中社会资本的衰减导致其功能紊乱,同时选取社会的一些案例,具体考察社会资本的削弱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在此部分和导言中,帕特南在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功能给出了经典概括。他认为,首先,社会资本能够让人们更加轻松地解决生活上的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其次,社会资本是社区前进车轮的润滑剂,在那些能使人们相互信任、社会成员可以重复互动的地方,社会交往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再次,社会资本拓宽了人们与命运息息相关的诸多途径的认知;最后,社会资本还通过心理和生理的过程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深入地思考一下便知,这些功能对于社会参与、解决集体行动中“搭便车”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在美国的衰减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困境和后果。囿于篇幅,帕特南在书中只是列举了社会资本的衰减对于儿童福利和教育、健康而有益的邻里关系、经济繁荣、健康和幸福,以及民主社会的公民身份与政府绩效五个领域的影响。比如,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坏事情发生在好孩子身上;有利于建立安全有益的邻里关系,减少犯罪发生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身

心的健康与幸福;有利于民主程度的提升和政府的绩效与管理等。

五、路径探讨: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

历史可以为我們提供宝贵的经验,既然美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存在过辉煌的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蛛丝马迹”。帕特南正是在认真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的思考,针对美国公民社会的下滑开出了“一剂良方”,开启了社会资本家的议程。

回溯历史后,帕特南发现,进步时代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强社会资本,这也是镀金时代留给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美国民众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改革方法,其改革议程为:“19世纪最后30年,这些组织(如兄弟会和文化社团)主要关注成员个人关心的事情,包括休闲和自助。在19世纪最后10年里和20世纪前10年里,这些协会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社区问题上,最后转向政治改革。早先的那种面向内部的创造社会网络的阶段,为后面面向外部的政治改革阶段铺平了道路……社会资本的投资对于政治改革来说,不是一个备选项,而是前提。”^[1](P465-466)]其遵循的路径大致如此,首先是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的建构,建立起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其次,这种信任可以克服“搭便车”行为,使集体行动(如社区事务和社区参与)成为可能;最后,推动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议程,实现社会变迁。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出发点和起点都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因此,这将为我们的改革提供切入点。本部分作者提出的七个方面的思考无一不是沿着这一路径,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改革,最终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功用;看似“毫无意义”,实则雷霆万钧。

可见,帕特南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做出的创造性的思考,旨在激发更多学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而探讨出更加系统的、更富有建设性和创造力的解决方案。与其说这是结束,不如说这是作者复兴美国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努力的开始。

六、结语

马克思曾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而这正是帕特南在其书中所体现的科学研究精神和研究路向。首先,他在深入思考美国社

会所发生的变化之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主题;其次,他围绕着这一主题,深入考察了主题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再次,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逐步归因、自问自答等方式向读者展现了其探究的具体过程;最后,他就问题引发的后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社会科学提供的方法论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必须要做到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不是堆积大量的数据、华丽的辞藻和一味地回避。帕特南的论证过程和成书过程时刻昭示着逻辑性、严密性,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我们读过此书之后最大的收获。二是拓展了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美国社区衰落与复兴问题的框架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指引我们深入思考其身处之地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问题。

帕特南其书论证之严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社会调查数据之充足。在该书中作者先后用到了DDB Needham 生活方式调查数据、定时日志研究数据、罗珀社会与政治趋势分析数据、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一些调查公司的数据等,数据之充足,可获取数据之多、之广、之易,令人震撼。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其不足之处:其一,作者运用的这些数据更多是第二手的,甚至是多手的,其数据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可能会存在问题;其二,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对数据的处理略显随意,比如,在论证“时间与金钱压力”与“公民参与减小”之间的关系时,作者经过大量引证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只能对不到十分之一的总体衰减作出解释”^{[1](P234)}。这样的论述在书中曾多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作者的无奈。这正如帕特南在1994年回应托姆·罗康的批评时所说的话:“尽管这证明不了什么,但我也必然要说明学者和公众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别。学者总是想知道我们不参与是不是真的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如何,网络如何,等等。但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话,他们总是对要做什么不加以评论。公众总是不关心它们是否是真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些都真实,他们总是高度关注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更难解决。”^{[1](P521)}

[参 考 文 献]

- [1] [美]罗伯特·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祝乃娟,张孜异,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风笑天. 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方法论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2004(1):73.
- (上接第48页)
- [2] 刘余香. 论代孕的合理使用与法律调控[J]. 时代法学,2011(3):68.
- [3] 吴国平. “局部代孕”之法律禁止初探[J]. 天津法学,2013(3):48.
- [4] 新浪网. 武汉现卵子黑市,女性捐卵一次得万元 中介赚六七万[EB/OL]. (2011-09-08)[2015-06-18]. <http://hb.sina.com.cn/news/s/2011-09-08/3863.html>.
- [5] Somfalvi A, Romania. 30 Israelis detained in egg trafficking case[EB/OL]. (2009-07-20)[2015-06-18]. <http://www.y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749054,00.html>.
- [6] 向雨航,李鑫. 有公立医院医生涉非法买卖卵子[EB/OL]. (2012-10-19)[2015-06-18].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2-10/19/content_7134547.htm.
- [7] 冯士军,蓝风. 卵子黑市盯上青春女孩:挣钱“捷径”风险重重[J]. 妇女生活,2013(2):6.
- [8] 夏征农. 辞海[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851.
- [9]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of oocyte donors[J]. Fertility & Sterility,2007(2):88.
- [10] Shenfield F, De Mouzon J, Pennings G, et al. Cross border reproductive care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J]. Human Reproduction,2010(6):25.
- [11] 王地. 卵子买卖背后凸显法律缺失[EB/OL]. (2011-11-18)[2015-06-18]. 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1-11/18/content_85946.htm.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54-07

《申报》与晚清书画助赈的初兴

高俊聪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申报》在书画家群体以己之力贡献社会的初期,以新型传媒的姿态,多角度、多方位地影响与支持着晚清书画助赈事业的早期发展。《申报》通过灾情报道、救灾动员,在让民众了解灾情的同时,唤起其救灾意识;助赈新闻的刊登进一步促进了书画助赈这种新型赈灾方式的传播,起到了积极宣传的作用。同时,书画助赈同仁也非常注重对报纸这种文化中介的利用,通过在《申报》上发布助赈启文、公布润例广告、公开收支清单等方式,推动了书画助赈活动成为公开、透明的阳光事业。另外,报纸登载的相关评论文章、读者来信、报馆告白等,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的作用,有利于助赈机制的有序化、合理化发展。《申报》对书画助赈的支持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报纸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促进了国内助赈风气的形成;助推了慈善活动的透明化、公开化;实现了新式传媒与新型救灾方式的二元重构。与此同时,助赈事业的发展以及报纸媒体的介入推动书画家纷纷定润,社会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增强;刊登润例成为书画市场的重要一环;助赈的需求,间接推动了书画界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 申报;书画助赈;舆论监督;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 D632.1;G219.29;K252;J292.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0

书画助赈是由画家个人或团体为救助灾民、难民而开展的书画作品捐赠、义卖活动。书画作品包括匾、屏、折扇、对联、堂幅、横幅等。随着晚清义赈的兴起,1878年之后,书画义卖蔚然成风,成为晚清义赈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晚清书画助赈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慈善事业的新变化。对于晚清书画助赈,目前学界关注、研究得较少,尚无专文探讨。晚清以降,书画家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开始参与社会事务;书画作品趋向商品化、大众化;书画市场的近代化转型也得到全方位推进。报纸在书画界的变革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推动了书画市场的扩大化、书画家的社会化。此处,报纸作为新兴媒体对书画界从事的慈善活动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从多方面影响其发展。《申报》创刊于1872年,是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

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称《申报》为申报纸,把它作为中国新闻纸的代名词”^[1]。鉴于此,笔者拟从《申报》入手,以窥探晚清报界对书画助赈的作用。

一、《申报》对晚清书画助赈的促动

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其灾难之重及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2],唤起了各界的慈爱之情。江南富庶绅商最早兴起了义赈,跨区域对华北深受灾荒之苦的民众进行救济,并取得了明显效果。《申报》通过对灾荒与救荒信息的报道,推动了助赈活动的发展,书画家和艺术家受其影响,以捐赠书画、艺术品的形式加入到助赈队伍的行列。

1. 灾荒报道与救灾动员引发各界同情

“丁戊奇荒”持续时间达三四年之久,波及山

[收稿日期] 2015-06-10

[基金项目] 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项目(Y1327041)

[作者简介] 高俊聪(1990—),女,河南省洛阳市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北方五省,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灾难极大,“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不会少于一千万人,而那些在灾荒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大约也不会少于两千万人,他们一无生计,只剩下他们空空的两手和嶙峋的瘦骨”^[3]。这是中国近代罕见的特大灾荒。

对“事实真相的报道是劝赈的前提”^[4]。《申报》具有收集信息便捷、辐射广、影响大、独立性和自主性强的优势^[5]。1875—1879年《申报》对灾荒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追踪报道,将灾荒造成的严重后果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首先,《申报》报道了大量灾民死亡的情况。人员伤亡情况是衡量灾荒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从《申报》报道来看,此次灾荒不仅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而且社会上还出现了为食人肉而杀人的现象。“山西饥荒之苦至斯而极矣,每日死者约有数千人,道殍相望。又闻极穷之家见有过往行人,稍形羸弱者,要而杀之,以果其腹。竟不止食死人之肉而已也”^[6]。其次,《申报》报道了社会治安混乱的情况。很多灾民面对生存危机卖儿鬻女,造成当时人贩猖獗,“幼孩弱女无须价买,但得啖饭处便可相随也”^[7]。另有走投无路的灾民顾不得失德干起了不法勾当,“饥民在途,手执利刃,强行索食,车带杂粮五斗,立即抢去”^[8]。再次,《申报》报道了农业和工商业遭到破坏的情况。总之,灾荒期间,民众通过《申报》对灾情的报道较全面地了解到了灾荒的实情。

面对严酷灾情,《申报》率先发起了救灾动员告示:“方今晋省,惟此奇荒,死亡接踵,凡有血气定必念切救援。”^[8]《申报》作为当时的主流报纸,以同胞之情来唤起民众的慈善之心,其劝捐对象涉及到士庶绅商各个阶层,“凡善举之事,随时随地可以量力倡助集而成之,不必尽富商大贾动辄解赠巨万而后可以济事也”^[9]。书画界人士中不乏家道殷富的士绅大贾,在《申报》的呼吁和号召下,他们没有置身事外,其救灾意识被唤醒。“夫晋省灾荒,为近今所罕见,析骸易子,惨不忍闻。某等幸居乐土,全赖天庥,而囊鲜青蚨,仓无红粟,爰藉笔墨之灵,聊作赈资之助”^[10],这段以碧梧秋馆之名刊发的文字,既反映了灾荒的沉重,也表达了书画家的救灾意识与心愿,此类以画社或画家群体命名的文章,《申报》所载不少。又如乍浦书画社的启文:“近阅贵报,见各处水患情形,诚耳不忍闻而心为之恻者,爰集二三同人,愿减取书画润资,悉以助赈。”^[11]

2. 助赈报道引导民众关注

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2]的“民捐民办”赈灾活动。面对灾情,社会人士广泛参与,除富商大贾之外,妇女界、学生群体、广大艺人等社会各界也都开始参与助赈活动。在书画界,以捐助书画作品参与助赈的情况也广见报章,《申报》紧抓热点,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书画助赈创举,对这种新式助赈方式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

1878年6月,《申报》登载一篇果育堂来信,称:在本月初,“有不告姓名童子持到颜鲁公臧君碑、墨、榻一部,嘱为售出作捐。又待鹤斋来绉心古字画八幅;老建窑炉、瓶各一件;白定窑香炉、笔洗各一件……均嘱敝堂,兑将银入赈,然则好古之士何妨善价而沽诸”^[12]。从中可以看出,以捐助书画作品、古董玩物的助赈行为此时已经出现。由此观之,作画工具、字画、古董玩物、书籍等,此时都可以作为赈灾捐助物。《申报》的报道,对书画助赈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而且报馆也被纳入义赈体系中,充当了慈善中转机构。1878年6月13日,《本馆告白》披露,许多不知善堂地址的社会助赈者,将书画、银钱等捐赠物交由《申报》馆来代为转交^[13]。

1878年7月1日,画家金继(一名慎继,字勉之,号免痴,吴县人)在上海首发“捐卖画兰助赈”^[14]。《海上墨林》(研究海上画派人物的重要资料)曾这样介绍金继:“工写兰,下笔敏捷,一日可竟百余纸。尝以书画售资助赈,人来填户,当众挥洒,顷刻而就。沪之有书画助赈,自慎继始也。”^[15]《申报》曾全面报道了金继助赈活动的原因、事件、时间、地点、人物,“今又有金君免痴者夙精书法,绘事尤工,闻今特立愿捐卖画兰一千件,设砚于老巡捕房对门彭诚济堂,集收润笔之资,尽数赈饥之用。因欲速成,特从贱售,计扇册等每件只二十文,条幅四十文,堂幅百文,物美价廉,惠而不费”^[14]。可见,金继的义举一出,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响应,第一天就售出了数十件画作。《申报》记者对金继的行为极为赞赏:“夫以一艺一微,且能力顾大局如此,彼坐拥多金者奈何!”^[14]“新闻如鲜鱼”^[16],《申报》将金继捐赠书画作品助赈作为“新闻”及时刊出,“新闻”一出,书画界同仁便“互相称叹”^[17],纷纷效仿。到7月8日,“堂幅、册页、扇面等千件已尽数画竣,共得笔资钱二十二千九百五十八文,当即邮寄苏垣谢氏助人赈款。然求画者尚接踵而来”^[18]。金继以个人名义捐助书画作品行慈善之举,引起了广大画家的积极响

应,促使助赈风靡于书画界。

3. 报道传播书画助赈信息

新闻报道是报纸媒介的主要功能,然“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19]。《申报》对书画助赈“随闻随录,盖不欲没诸君之雅意,并冀得以广结善缘也”^[20]。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878年7月1日到是年底,《申报》刊登有关书画助赈的报道有98篇。从报道可见,参与助赈的书画家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享誉中国画坛的名人,如张子祥、任伯年、胡公寿、朱梦庐等^[21],还有许多善长书画的社会人士,如张謇、康有为、王一亭、高邕之等。另有一些女性也参与进来,如程味蔬女史^[22]、路石卿女史^[23]等,甚至青楼女子也参与其中,“公阳里陈氏百尺楼主名筠字兰隐,昔为北里翘楚,嗣又遇人不淑,重坠青楼,素精六法,兼通文义,兹以灾区待赈,大发婆心,颇以绘事助赈”^[24]。另外,许多书画组织也发起了书画助赈活动。仅1878年当年就有虞山社、墨稼社、琴川安仁书画社、德星社、上海志仁书画社等参与其中。这些书画社大小不一,参与活动的书画家多少不等。

书画助赈出现的地域不仅仅局限于上海一地,上文中提到的虞山社、墨稼社分别位于常熟、苏州。另外,张味兰女士助赈,是在杭州见到善士书画助赈而引发的,“豫章张味兰女史,夙工山水,向不取润。兹因有事在杭,见诸善士每以书画助赈,其钦佩之,亦愿以五百件为率,十月底为止。计扇册每件百文,三尺屏四百,小横披二百文,以二十日取件,所有润资全数归赈”^[25]。“书画助赈叠见前报,好善诸君,夫固不遗余力矣。”^[26]虽然不能说如此广泛的助赈都与《申报》的影响直接有关,但《申报》对书画义卖盛况的报道为许多书画家指明了参加慈善的方式是毋庸置疑的。

二、晚清书画助赈活动对《申报》的借助

有学者指出,“近代邮电、新闻、交通业的发展,不仅为城市慈善机构广泛救助乡村灾区、发挥慈善救济功能创造了条件,也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27]。在晚清书画助赈推广的过程中,《申报》被书画家充分利用,成为书画市场重要的文化中介^[28]。

1. 发布书画助赈启文

《申报》在晚清书画助赈活动中常被用来发布义赈劝捐公启,通过描述灾情呼吁救灾,以扩大募捐范

围。从《申报》刊载的书画助赈启文来看,初期,大多书画社和书画家个人通过《申报》发布了捐赈消息,如《常熟苏州书画社告白》^[29],周备笙、潘岁宾、郑熙堂、巢子余的《画社助赈》^[30],吴庆余、吴小圃的《聚沙室书画助赈声明》^[31],《德星社续启》^[32],《松江辅德堂书画捐赈启》^[33],《养心书画社续启》^[34]等。而后随着活动的增多,一些书画界同仁开始联合慈善机构在《申报》上发布启文,如施善昌主办的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35]、上海四马路高易赈所^[36]、文报局筹赈公所^[37]、上海三马路陈与昌协赈公所^[38]等义赈组织,都曾在《申报》上发布书画助赈启文。这些捐赈启文的文字长短不等,内容包括助赈原因、对书画家的介绍、书画润例、买卖的方式、捐赈所得润资的去向等。其中涉及助赈原因的描述大多比较简短,整体来看,主要是对灾区人民同情或受义赈同仁影响等。对相关书画家的介绍,也只是简明地介绍了他们的专长,如1882年悼仙楼主的启文:“席君春渔,四川人,工诗,兼精六法”^[39],沪上乐善主人的启文:“磨铁研生陆筱轩,铁沙名士也”^[40]。还有些启文并不介绍书画家,而直接刊登书画作品的价格(润例)。可以说,助赈启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助赈润例,下文将对其进行专门讨论。助赈书画的买卖方式有很多,有的书画社安排具体地点,由画家现场作画,“随到随画,概不延搁”^[31];有的书画社安排收发件的时间,购买者可以在拟定的时间指定或领取画件,德星社就曾定于“二、七日收件,三、八日发件带收”^[32];还有的书画社要求“润资先惠”^[41],过五到十日之后取件。从启文中可知,售卖书画所得润资大多是“悉数交赈局汇寄灾区”^[42];也有一些向读者指明,“如欲指名及点景,并例所不载者,悉照旧例,不入赈款”^[43]。由此可见,当时书画界多会利用《申报》发布自己助赈的详细信息,以此推动助赈活动的有效开展。

2. 公布助赈润例

书画价格公布于众,便于购买者权衡是否购买。在中国古代,书画家主要通过笺扇店、笔墨庄等向社会公布书画作品价格。晚清以降,新闻媒体成为书画市场的文化中介之一,进一步推动了书画市场的扩大,书画家与书画组织常借助报纸公布书画价格。书画作品种类繁多,主要有扇册、条幅、堂幅、堂轴、屏、楹联等,还有火画(即“以香火代笔,凡山水人物羽毛古篆皆能随手熨成,惟妙惟肖”^[44]),书法有行书、楷书、草书等。在书画界,“所定书画报酬的标准谓之‘笔榜’‘润格’‘润例’”^[45]。润例被称作

“艺术家的自我评价和市场定位”^[46],是艺术家与市场相联结的载体。晚清时期,《申报》刊登了相当数量润例的告示,这些告示多涉及捐赠助赈作品的润例。这些润例告示,有的附于新闻之后,如金继助赈的新闻报道,明确了“扇册等每件只二十文,条幅四十文,堂幅百文”^[14];有的载于助赈启文中,详细罗列书画者的润例^[33]。

书画润例的多少常依作品的形式、尺寸、字数,或以书画家名声高低等而定。有的画家以个人名义通过《申报》来调整助赈润例,如金继就曾多次调整其助赈润例。1882年9月22日《申报》上载有“金免痴专写楹联……楹联每幅三角”^[47]的助赈消息;1885年9月10日《申报》公布了金继助赈润例的调整信息:“金免痴写对助赈:四五尺每副减收一百文,宣纸加倍”^[48]。之后金继又多次在《申报》上发布其助赈润例的调整消息,如1886年9月16日的“金君免痴画润助赈,画着色兰花十日,纨摺扇每件减收一角,概不长题,悉数充赈”^[49],1887年3月16日的“金君免痴愿书屏条助赈,今将润资开列于下:四尺屏每堂半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50],1887年7月23日的“堂额一元,中额七角,斋额半元,提拔加三倍,招牌同”^[51],1896年8月29日的“金免痴卖字新例,专书冯景亭先生体,大件照格减半,扇册二角”^[52],这些消息全部来自于《申报》。

在《申报》上刊登助赈润例的并非金继一人,还有许多画家,如任伯年、胡公寿、吴鞠潭、吴楚卿等。除个人外,一些书画社也会在《申报》上统一刊登润例,如苏州墨稼社、常熟虞山社、上海志仁书画社、同仁社、镗铢书画社、养心书画社、片心社、团香社等。镗铢书画社曾在《申报》上刊登“姚飞泉行草隶字,沈云卿芦雁、草虫、翎毛、花卉,扇册条幅每页五十文,横直幅每件一百文,大堂幅每件双百文,书画同例。楹联七八言一百文,凡楷隶者倍之”^[53],片心社曾在《申报》上刊登“片心社书画助赈,唐也僧墨兰,黄笠渔行书,唐芝九行书,黄星庐左笔墨菊墨竹。纨摺扇每柄七十文,楷书加倍”^[54]。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慈善组织也常帮助画家、画社在《申报》上统一刊登润例,如苏州桃花坞谢氏赈寓(谢家福等人于1877年成立的慈善组织)^[55]曾在《申报》上代书画社发布润例章程:“折纨扇册页灯片窗心每件二百文,册页等尺外者加半,对联条幅三四五六七八尺者每件二三四五七八百文,堂幅加倍。大中斋匾每字四三二百文,诗文镌刻合景小楷照松江扬仁社例。”^[56]可见,《申报》在晚清已经成为了书画家宣

传自己书画作品的重要平台。

3. 公开赈款清单

随着义赈活动的不断发展,慈善团体日益重视利用报刊进行宣传,除了在报纸上发布劝捐公启外,还在报纸上公布收捐清单,例如果育堂、保婴局、苏州桃花坞谢氏、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等慈善机构都纷纷在《申报》上登载赈款清单。苏州桃花坞筹赈公所每月的赈款清单都会按旬在《申报》上刊登;截至1896年4月28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以丝业会馆为依托的慈善组织)在《申报》上刊登了4526次赈款清单。^[57]

书画家助赈之初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与组织,所以多数书画善款都交由果育堂、保婴局等慈善机构代转灾区,款数也随组织者的收捐清单一起登报公布,如金继的赈款清单就曾通过《申报》以“苏州桃花坞谢氏经收河南赈款清单”的形式公示:“金免痴画兰助赈钱念千文”^[58]，“金免痴画兰助赈找二员七百五十文”^[59];又如上海保婴筹赈局在《申报》上刊载直赈赈款清单,称“金免痴先生书画润钱十五千一百七十四文”^[60]。当然,除了刊载金继的赈款清单外,《申报》也载有其他书画家的赈款清单,如高邕之于1882年7月21日至8月21日“共收润洋七十元零五角”^[61],由电报局转往灾区;书画社团的赈款清单也在《申报》上公示,如“蚁力画社前已将润资佛洋五十元助入赈款”^[62]，“由德隆彰交到松江辅德堂书画社洋二百十一元、钱三百三十文”^[63]等。从《申报》刊登的苏州桃花坞赈寓赈款清单看,虞山书画社1878年7月上交赈款7次^[64],1880年上交11次^[65];松江扬仁书画社1880年7~9月上交赈款22次^[66-67]。另外,桃花坞赈寓还于1880年10月26日专门刊登松江扬仁书画社的助赈清单,“共钱一千二百二十七千一百六十五文”^[68]。在《申报》上公示的赈款清单很多,也很有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赈款清单登报“能够更及时地让外界了解捐募的具体过程,也更容易取得社会上的信任”^[69]。

三、《申报》对晚清书画助赈的引导

报纸媒体既是一种客观的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同时还会促使社会舆论的形成、转向、扩散与强化。《申报》在发挥信息传播载体功能的同时,还通过刊登读者来信、评论文章及本馆告白等来引导社会舆论。《申报》上发布的助赈启文、助赈润例、赈

款清单,引导了舆论走向,促进了书画助赈的有序化和合理化。

1. 客观描述助赈事实,正面评价助赈义举

《申报》通过一些评论文章对晚清书画助赈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对募款助赈义举的正面评价不仅有利于社会民众对其信任感的提升,也引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其一,对书画助赈事实进行客观描述。《申报》曾刊载:“海上有金免痴以画兰丐资,从贱而售,收钱助赈倡行之,果如所愿。于是书画名家相继而起,苏州、锡山、濮院各开社卖之。今又有任君伯年、吴君鞠潭等七人仿行之。又有沈君俭、金君熙亦举是事,可谓极一时之盛矣。”^[70]其二,理性评价,平实夸赞。《申报》曾刊文以“积土成山”来称赞助赈善举:“上年晋豫灾荒,各处创行助赈书画社,集腋成裘,颇取惠而不费之效”^[71]，“润资助赈,是欲集秋毫之末而拄泰山之倾也”^[72]。其三,倡导才艺助赈的方式。《申报》曾刊文指出,“诸君子于筹捐孔亟之时,不能助以财而助以艺,好善之诚愈笃,获善之报愈隆,本馆闻之亦愿热心香而默祷者也”^[73]，“历来的文人雅士忌谈金钱”^[46]。所以,有些清高的书画家最初对润笔助赈有一定的顾虑。对此,《申报》相关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评论:“夫画韵事也,以之取资,未能免俗。然润笔之费,古人不辞,且寒素生涯,一生聪明皆聚于此。而使终身为人效手碗之劳,抑又何乐焉。故取资本不伤乎廉,而以资助赈则尤不伤乎惠也……人有一材一艺,皆可为善。不必自诿曰:我寒士也何力之有焉。”^[70]《申报》刊文赞赏书画助赈义举,逐步引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书画家的顾虑。《申报》对晚清书画助赈的积极评论,不仅肯定了书画家取润助赈的行为,还呼吁民众以书画助赈的艺术家为榜样,将慈善救济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进一步扩大了助赈范围。

2. 揭露社会丑陋现象,引起社会民众警觉

报纸作为传播信息、制造舆论的工具,其所具有的监督作用对社会不良现象会产生巨大的震慑力量。任何事物都是不完美的,书画助赈作为一种新型的救灾方式,必然会存在不少问题。特别在兴起之初,这种活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自发性,同时由于运行程序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监督与管理,导致一些书画家妄想借助义赈之风沽名钓誉,中饱私囊。此时,媒体的舆论监督就显得至关重要。

《申报》经常刊登文章,谴责在书画助赈活动中的鱼目混珠者,如“书画助赈果属惠而不费之善举,

钦佩良深。然其中捐滴归公者,固有多人,而借名渔利者,亦复不少”^[74]，“书画助赈原是文人之善举,本馆故不惮一再登报,以结善缘。其中实心为善者固属指不胜屈,乃不意近有借助赈之名而所得润笔仍入己囊者,言与行违,殊令闻者齿冷”^[75]。《申报》甚至有更加尖锐的批评:“沪上书画家麇聚如林,其佳者岁进数千金,未必肯以润资助赈。有等初学涂鸦草草不工者,群创为减润助赈之举。无论其无人求取也,即幸获润资,往往私人己囊,全不缴局。闻之筹赈诸君云,历办以来,《申报》所登书画助赈诸君不下数百家,实则缴润者不过十中之二。噫嘻,阳托行善之名,阴存利己之见。润格一出,名利兼收,试诛其心,直与吞赈之官胥不相上下。”^[76]可见,《申报》作为新闻媒体及时刊载文章反映书画助赈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警告了那些借捐赈之名中饱私囊者,这有助于人们更为理性地看待书画助赈,扼止了不良之风的蔓延。

3. 提出切实可行办法,推动助赈活动健康开展

在晚清书画助赈中,《申报》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针对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帮助社会和管理者完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助赈者将赈款私人己囊,《申报》馆公开告白:“嗣后诸君如尚欲以润资助赈,其收付各件由诸善堂经手,本馆当遵谕入报,否则勿勿将润格交来。”^[75]

《申报》除了以《本馆告白》的形式发布报馆的立场观点之外,还会登载一些社会人士的建议,以促使助赈活动的顺利开展。《申报》曾刊文指出,“兹为思得一法,凡真心移润助赈者,其笔资正不必亲收,只须求书画者查明报上仿格,将笔资先交金州矿局掣取收条,即以收条连书画件送交本人,乞其动笔。如是一转移间,省却许多周折,而人皆知其以实心行实事”^[74]。这些建议使人们了解到由慈善机构代收赈款的好处,许多书画社、书画家在发布助赈润例的同时,会声明由义赈组织为中介机构负责办理。例如,虞山诗文书画旧社在发布润例消息的结尾,就标明“笔资先交金州矿局掣取收条,即以收条连件送交本人,铜洋自重,外埠寄局,信力自给”^[77]。紧随其后,《申报》登载的大量润例都清晰地标明由上海陈家木桥金州矿务局(以中国电报局与轮船招商局为依托的慈善组织)来代收笔资,如《绿桔轩主书画润笔助赈》^[78],胡悦彭《润资助赈》^[79],《书画润资助赈》^[80],《五岳山樵钟鼎篆隶墨梅助赈》^[81],《同人书画篆刻题咏书稟减润助赈》^[82]等。实际上,当时许多慈善组织都纷纷充任书画义卖中介机

构的角色,影响较大的如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1884年南沙湘兰女史的助赈润例中称,“其洋须先交丝业会馆赈所,以收据作凭,写件交由大马路抛球场戏鸿堂代收”^[83]。更值得一提的是,《申报》馆自办的协赈所还直接代售书画,“所得之资,即由本馆解赴灾区散放”^[84]。慈善组织的介入,促进了监督机制的形成,将书画助赈活动纳入有序的运行轨道。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申报》在书画家群体以己之力贡献社会的初期,以新型传媒的姿态,多角度、多方位地影响与支持着晚清书画助赈事业的早期发展。通过灾情报道、救灾动员,在让民众了解灾情的同时,唤起其救灾意识;助赈新闻的刊登又进一步促动书画助赈这种新型赈灾方式的传播,对晚清书画助赈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同时,助赈同仁也非常注重对报纸这种文化中介的利用,通过在《申报》上发布助赈启文、公布润例广告、公开收支清单等方式,使晚清书画助赈成为一个公开、透明的慈善活动。另外,报纸登载的相关评论文章、读者来信、报馆告白等,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的功效,有利于助赈机制健康、有序的发展。

《申报》对书画助赈的支持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报纸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从区域扩展上看,报纸新闻传播和舆论的导向,将一定区域内的书画助赈活动迅速推向了全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助赈风气的形成;从善款筹集情况上看,由于报界对书画助赈的介入,助推了慈善活动的透明化、公开化;从手段上看,报纸传媒成为书画助赈推广的重要技术工具,实现了新式传媒与新型救灾方式的二元重构。事实上,在报纸与书画界的互动过程中,报纸的内容也得到丰富,读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就书画界而言,助赈事业的发展以及报纸媒体的介入推动书画家纷纷定润,社会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增强;书画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刊登润例成为书画市场的重要一环;由于助赈的需求,书画作品呈现批量化的创作态势,间接推动了书画界的近代转型。书画助赈将传统中国文化与慈善事业相结合,在救贫济困的同时,塑造了社会助益氛围,利于近代城市慈善风尚的养成。对晚清书画助赈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当代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为探讨近代城市慈善风尚的养成提供了学术空间。

[参 考 文 献]

- [1] 宋军.《申报》的兴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2.
- [2] 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3(2):21.
- [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M].张汇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341.
- [4] 王卫平,黄鸿山.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C]//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91.
- [5] 吴榜蓓.早魃为虐,善于人同——《申报》有关“丁戊奇荒”的报道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 [6] 山西荒象[N].申报,1877-10-16.
- [7] 豫省荒歉情形[N].申报,1877-12-07.
- [8] 劝捐告示[N].申报,1878-03-08.
- [9] 论戏园节钱助赈事因述所见[N].申报,1877-05-25.
- [10] 碧梧秋馆书画助赈[N].申报,1879-09-16.
- [11] 润资助赈[N].申报,1882-08-11.
- [12] 割爱助赈[N].申报,1878-06-14.
- [13] 本馆告白[N].申报,1878-06-13.
- [14] 捐卖画兰助赈[N].申报,1878-07-02.
- [15] 杨逸.海上墨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7.
- [16] 徐宝璋.新闻学[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25.
- [17] 课金助赈[N].申报,1887-07-04.
- [18] 画兰助赈续闻[N].申报,1878-07-08.
- [19]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58.
- [20] 一粟书画社助赈[N].申报,1878-08-15.
- [21] 书画作赈[N].申报,1878-07-17.
- [22] 女史书画助赈[N].申报,1878-08-31.
- [23] 女史法书助赈[N].申报,1878-09-09.
- [24] 女史画赈[N].申报,1889-12-12.
- [25] 画合赈[N].申报,1878-10-08.
- [26] 书画助赈汇录[N].申报,1878-08-06.
- [27]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近代城市与慈善事业[C].//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03.
- [28] 林历.近代书画市场中的中介机构[J].艺苑,2013(3):41.
- [29] 常熟苏州书画社告白[N].申报,1878-07-19.
- [30] 画社助赈[N].申报,1878-08-16.
- [31] 聚沙室书画助赈声明[N].申报,1878-08-16.
- [32] 德星社续启[N].申报,1878-08-19.
- [33] 松江辅德堂书画捐赈启[N].申报,1878-08-21.
- [34] 养心书画社续启[N].申报,1880-07-24.

- [35] 篆隶减润助赈[N]. 申报, 1885-07-31.
- [36] 书润助赈[N]. 申报, 1886-06-19.
- [37] 书画助赈[N]. 申报, 1886-09-08.
- [38] 书润助赈[N]. 申报, 1886-12-03.
- [39] 书画助赈[N]. 申报, 1882-08-12.
- [40] 书画减润助赈[N]. 申报, 1882-08-18.
- [41] 画润助赈[N]. 申报, 1881-09-16.
- [42] 润资助赈[N]. 申报, 1882-09-28.
- [43] 书画社减润助赈[N]. 申报, 1878-08-12.
- [44] 火画代赈[N]. 申报, 1878-07-10.
- [45] 周积寅. 中国画论大辞典[K].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28.
- [46] 王中秀. 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J]. 新美术, 2004(2): 14.
- [47] 润笔助赈[N]. 申报, 1882-09-22.
- [48] 金免痴写对助赈[N]. 申报, 1885-09-10.
- [49] 金君免痴画润助赈[N]. 申报, 1886-09-16.
- [50] 字屏助赈[N]. 申报, 1887-03-16.
- [51] 匾对招牌助赈[N]. 申报, 1887-07-23.
- [52] 金免痴卖字新例[N]. 申报, 1896-08-29.
- [53] 镗铢书画社助赈[N]. 申报, 1879-09-15.
- [54] 片心社书画助赈[N]. 申报, 1880-06-22.
- [55] 照录苏州赈所禀呈李爵相、谭抚宪、许藩宪直隶筹赈局稿[N]. 申报, 1881-07-27.
- [56] 桃花坞赈寓代收书画社润章程[N]. 申报, 1880-09-09.
- [57] 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少钦经收直、河南、山东、湖南赈捐二月初一至十三第四千五百廿六至一百三十九次清单[N]. 申报, 1896-04-28.
- [58] 照录苏州桃花坞谢氏经收河南赈款六月十一至十五日清单[N]. 申报, 1878-07-24.
- [59] 照录苏州桃花坞谢氏经收河南赈捐六月十六至二十止单[N]. 申报, 1878-07-26.
- [60] 书画助赈汇录[N]. 申报, 1880-08-31.
- [61] 同仁社来函[N]. 申报, 1882-10-13.
- [62] 书画社续闻[N]. 申报, 1878-09-12.
- [63] 助赈续记[N]. 申报, 1878-09-21.
- [64] 照录苏州桃花坞经收豫赈七月中旬清单[N]. 申报, 1878-08-27.
- [65] 接录苏州桃花坞江浙同人经收直省放赈捐款七月上旬清单[N]. 申报, 1880-08-24.
- [66] 接录苏州桃花坞江浙同人经收直赈七月中旬清单[N]. 申报, 1880-09-07.
- [67] 接录苏州桃花坞赈寓经收直赈九月中旬清单[N]. 申报, 1880-10-29.
- [68] 桃花坞赈寓承收松江扬仁书画社诸先生助润清单[N]. 申报, 1880-10-26.
- [69] 朱泚.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55.
- [70] 广卖艺助赈说[N]. 申报, 1878-08-01.
- [71] 书润助赈[N]. 申报, 1879-06-26.
- [72] 润笔助赈[N]. 申报, 1879-07-06.
- [73] 书画镌刻助赈[N]. 申报, 1878-07-31.
- [74] 来信照发[N]. 申报, 1883-08-14.
- [75] 本馆告白[N]. 申报, 1880-09-05.
- [76] 筹赈宾谈[N]. 申报, 1885-07-21.
- [77] 虞山诗文书画旧社[N]. 申报, 1883-08-20.
- [78] 绿桔轩主书画润笔助赈[N]. 申报, 1883-08-23.
- [79] 润资助赈[N]. 申报, 1883-08-29.
- [80] 书画润资助赈[N]. 申报, 1883-09-24.
- [81] 五岳山樵钟鼎篆隶墨梅助赈[N]. 申报, 1883-09-27.
- [82] 同人书画篆刻题咏书禀减润助赈[N]. 申报, 1883-09-28.
- [83] 画润助赈[N]. 申报, 1884-06-12.
- [84] 名画助赈[N]. 申报, 1899-06-1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61-06

《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与 余秋雨的出版理念浅析

张世海

(安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余秋雨在文学界的成名始于《文化苦旅》,这本散文集的出版一波三折,最后取得非凡的传播效果和销售业绩,其出版历程体现了出版业中创造与传播的良性互动。余秋雨对出版业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出版的重心是创造与传播,出版要立足当代,传播文化,并创造新的文化;现代的出版机构要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把目光从浩如烟海的典籍转向生动的社会生活,在策划选题前走出办公楼,走进知识和文化创造者的世界,发掘其才情智慧。“创造与传播”的出版理念对当代出版业有重要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具有传播和创造的主体意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建设的历史经验、西方文明成果三个源头获得资源,促进了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对于古籍出版者来说,不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值得出版和传播,对历史文献的筛选、整理和出版,若缺乏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需求的深刻洞悉,就可能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又无益于当代文化的创造与传播。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苦旅;出版理念

[中图分类号]G239.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1

出版理念,简言之就是对出版业的本质和核心任务的想法,这种看法会直接影响出版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出版业的成败。一般来说,每隔十年左右出版业的从业人员都会有一定比例的更替,新的出版从业者必须对这个问题有透彻的思考。当前,传统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出版行业所面临的技术基础、社会观念、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已先于学术界的研究和思考。

在印刷时代的黄金时期,英国出版业巨子、出版思想家斯坦利·昂温在1926年出版了《出版概论》一书,该书被喻为西方出版业的“圣经”。昂温认为,“出版工作要向准备跟随先驱人物走新路的人提供远为激动人心的奇异经历,应热心帮助人们克服麻木不仁、无知和偏见,尤其要帮助人们关怀真理

的发展”^[1]。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异军突起,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吴士余在谈到这批书的策划时写道:“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除了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历史沉淀,形成其稳固的民族传统文化外,从横的层面来说,每一个特定的时代,又都必须致力于建设和创造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并使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断得到充实。”^[2]关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我将在下文作深入分析。著名出版家聂震宁认为,“出版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作者协同进行内容创新,发现作者、发现文稿、策划选题并组织内容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给读者做好服务、引导和推介,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创新的过程。出版者在内容创新中应当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3]。面对数字技术给

[收稿日期] 2015-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XW072);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

[作者简介] 张世海(1977—),男,河南省信阳市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传播学与编辑出版学。

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危机,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雷华认为,出版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出版人的创造力不足,传统出版业面临的问题“不是读者变刁难,难以伺候,而是出版人智穷,缺乏创意,出版物质量下降。创意是一种创新,要求我们的理论、思想、方法、手段必须是独到的、新颖的、从没有过的;创意是一种突破,要求我们在产品内容、呈现方式、传播渠道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4]。

除以上来自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观点值得关注外,当代文化界名噪一时的余秋雨的出版理念也值得编辑出版理论界关注,其原因有二:其一,他是当代中国罕见的畅销书作家,尽管饱受争议,但谁都不能否认,他多年来所出版的每一本书都销量不俗,深入探究这一出版现象对中国编辑出版业有现实意义;其二,余秋雨作为文化研究者,其研究对象很宽泛,其中也包括出版业,曾专门撰文探讨出版业的使命。由于余秋雨出版的著作数量较多,常需要与编辑出版界交流,因此他对出版领域的了解与认识比一般的作者更多、更深。出版界和学术界研究出版理论时,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背景,较务实,而余秋雨的讨论多务虚,其视野较为宽广,时间跨度上百年,纵横古今,横跨中外,角度新颖,很值得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对《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与余秋雨的出版理念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为当今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与《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

文化散文是在余秋雨成名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历史为题材、语言优美华丽、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散文几乎专属余秋雨,这个文体的盛与衰也系于余秋雨这个人,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坛上并不多见。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经历了一个最初只是在文化圈小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到结集出版遭遇挫折,再到1990年代中期风靡一时、最终影响力才渗透到市民文化层面的过程,其实这是余秋雨个人的主观创造和出版界营销传播方式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余秋雨的语言才华和叙述技巧在其早期学术著作里就已显露无遗,他于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时将其更名为《世界戏剧学》)语言还比较庄重质朴,但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枯燥,已经显示出其散文的特定语言风

格了。兹举一例。在分析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学时,他写道:“这种文艺发生在贵妇人主持的客厅里,一切文艺作品若想流行于法国上流社会,先得进一这些客厅的大门,博取坐在那里的高贵的主人和客人们的微笑。可以想见,这儿需要矫饰、缠绵、纤巧。自命风雅而又有着较高文化教养的人们毕竟也是爱挑剔的,因此这儿要求着词章的纯粹、风格的高雅、文体的整饬。”^[5]余秋雨语言才华在其后来的写作中得到充分释放,其散文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语言华丽优美和叙述精巧别致。朱国华曾深刻地指出,“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已经成为余秋雨散文写作的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6]。

有人说余秋雨的散文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缺乏思想深度,这是有失公平的。因为余秋雨早在1980年代中期成名之前,学术上就已经有了极扎实的积累,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应该说,其钻研的深度和广度都高于同侪。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思维训练为他后来创作的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毋须讳言,他的思想缺乏系统,大多是灵光乍现,包裹在华丽的词汇中。由于他拥有极高的语言和修辞天赋,再加上他对戏剧表演及受众心理学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创作心得,能活学活用,所以,一个日常简单的道理,经余秋雨一表述,就立即显得有深度有韵味,再加一抹淡淡的感伤怀旧,使人读起来感到满口余香,回味无穷。

语言优美、叙事精巧、浅显通俗、有思想闪烁、有淡淡的感伤,这些正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特质。余秋雨创作才能已具备,只缺发掘他的“伯乐”了,而他又幸运地遇到了“伯乐”。

2. 《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

1987年中国正值散文热,但当时的散文存在很多弱点:有的偏重于政治说教而失去了文学的可读性,有的充满学术语言而晦涩难懂,还有的过于浅显以至于显得幼稚。当时,余秋雨的大学同学李小林在《收获》杂志担任副主编,借这种同窗之谊,余秋雨先向李小林提出想写散文,他试写两篇后,李小林读来感觉不错。1988年1月,《收获》杂志专为余秋雨开设了《文化苦旅》专栏。1989年,创刊不久的《鄂西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组笔谈文章,编者按认为,《文化苦旅》“表现出对人类文化整体生存命运的关注,显示出一种由传统散文的‘悟道’与现代人的开放思维交织而成的恢弘深邃的艺术境界”^[7]。余秋雨感觉遇到了遥远的知音,还应邀寄去一篇文章交代写作缘由。由此可见,《文化苦旅》这个专栏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仅限于文学圈。

余秋雨的散文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需要遇到编辑出版界新的“知音”和新的“贵人”,而他又幸运地遇到了,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南方有一家出版社跟余秋雨商量后,决定将其散文集结出版,放在旅游景点销售。当然,他们一开始可能并没有告诉余秋雨这个真实的意图,等他们开始着手编辑时,发现这些“苦旅”文章并不适合在景点销售,于是不得不大幅删减。李小林得知此事后出面干预,要求这家出版社把原稿寄回。可寄回的原稿已经面目全非,“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8]。余秋雨看到这堆稿子也不禁心灰意冷,“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9]。

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这一散文集放在他们的散文丛书中出版,余秋雨嫌丛书作者太多,他的散文可能湮没无闻,并没有同意。就在这时,余秋雨遇到了他的另外一个“贵人”——与余秋雨有多年私交的上海知识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的编辑王国伟,当王国伟得知此事后,决定对余秋雨的散文重新编辑,精心策划,此决定是余秋雨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王国伟的建议也得到了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施伟达、社长朱效荣的鼎力支持”,“决定作为本社重点图书立项和运作,出版形式决定以精装本为主。在当时出精装本是出版社给作者一种高规格的出版礼遇”^[9]。之后,王国伟又让余秋雨补写了几篇文章,书稿从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文化苦旅》最终得以出版。

《文化苦旅》出版之后的营销也做得很成功,一些举措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举。上海知识出版社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行《文化苦旅》首发式,吸引了五十多家京沪媒体集中报道采访,出版方“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签名售书、讲座报告会、见面会及读书活动等”^[8]。出版社的精明与远见还体现在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数量庞大的中学生群体。当时政府大力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一些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学生群体中没有太大吸引力,效果不彰,而《文化苦旅》中很多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篇章,对传统文化虽有一些埋怨,但总体上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恰恰暗合了这一主旋律。于是,出版方“利用多种渠道和影响力,向教育部门推荐,《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顺利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8]。学生毕业一届又有新的一届,这种稳定的读者群使《文化苦旅》保持长期畅

销的势头。

经过这次精心策划、编辑出版和市场营销,余秋雨之前的知识和理论积累、丰富的游历、高效的“流水线写作模式”开始产生作用,其丰富的创造素材和技巧得到了出版界的认可。至此,散文家余秋雨正式闪亮登上中国文坛。余秋雨经过这次商业出版的洗礼之后,对出版界的作用有了深刻认识:“对我来说,我的落脚点就是出版社,因为只有出版社才能将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产品,流播于世,它是让作家与读者直接接触的前沿。”^[10]

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究竟是一种文化快餐还是文化精品,它有没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是否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范式并对未来的文学创造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它有待文学理论家进行深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版界发掘并成就了文化散文,其成功得益于对传播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余秋雨散文的出版过程和空前成功证明了出版界在文化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余秋雨的出版理念

余秋雨的研究兴趣很广泛,从最初的戏剧专业跨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1990年代中后期他借着《文化苦旅》的热销持续发力,创作了大量文化散文,将其语言才华和高效的写作模式发挥到了极致。笔者粗略统计一下,他的各类作品仅在中国内地就被超过20家出版社出版过,其对国内人文类出版社的运作流程较为熟悉,对文化与出版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1. 出版的重心是创造与传播

余秋雨的出版理念散见于他的各种作品中,最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篇题为《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里,他直接而清晰地阐述了他的核心观点:“出版的重心是传播与创造”,“在一个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的境况中,出版的主要责任在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但在如今这个时代,积累和传承却只是出版的小部分的、非重要的使命”^[10]。我们认为,余秋雨提出的“传播”与“创造”是两个并列关系的词,通观原文,余秋雨在使用这两个词时并没有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系。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会根据论述内容的逻辑调整这两个词的顺序。余秋雨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而文化的转型却显得迟滞,这种迟滞会使人们在适应社会变化时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

的问题和最重要的议程,并非所有这些问题都能从历史和传统中找到答案和启示。出版要立足当代,传播文化,并创造新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说,余秋雨的观点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笔者完全赞同。

余秋雨的观点虽然比较简单,但理论的力量恰在于简单所揭示的本质,如果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了编辑出版业最重要的职责,就能在我们的出版活动中建立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在中外出版史上,积累与传承和创造与传播是两个不同的原则,它们各自产生的结果也有天壤之别。

余秋雨比较了近代以来中西方出版理念的差别和它们产生的不同社会影响。他认为,向后看,创造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向古老和细节上深下工夫,推至极致,以段玉裁、姚鼐、翁方纲为代表的学者在古文字领域投注了巨大的精力;而此时西方却出版了黑格尔、康德和席勒等学者的原创性著作,从而揭开了启蒙运动的序幕。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也出版了一批经典著作,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西方的差距由此越来越大。1831—1832年,中国重修《康熙字典》,现在那个字典的很多文字已经死去;而法国出版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部经典至今仍然焕发着艺术魅力。1832年6月,中国学者王念孙和英国学者边沁同时去世,前者皓首穷经,把毕生心血都耗费在古典文献上;后者着眼当下和未来,出版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形态^[10]。

余秋雨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版业高度繁荣,人人都爱读书,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气象和国民生存状态都将发生巨大转变。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感性华丽的语言建议青年人多到书店走走,感受文化创造的前沿,享受书香氛围,接受知识熏陶:“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11]

2. 出版者要走进文化创造者的世界

在当代国际社会,文化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当前也正处于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态势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性深处也有无法压抑的对新奇丰富的精神活动的追求,在物质发达的年代,这种需求更加强烈,而

当前中国的文化产品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经济的信息化、知识化,以及对智力创造活动的更高依赖,对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出版业是文化产业所有门类中最基础的产业,它不仅直接生产文化产品,还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原创性的知识,推动社会变革,并为转型期人们迷惘躁动的心灵构建温暖的精神家园。余秋雨认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版社很难以堂皇如衙门般的阵势,通过安排人事和选题而产生优秀文化成果^[10]。现代出版机构应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把目光从浩若烟海的典籍转向生动的社会生活,在策划选题前走出办公楼,走进知识和文化创造者的世界,发掘他们的才情智慧。“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年代,优秀的写作者总是极少数,这样的写作者,有着独特的气质、超于凡众的高度,他们身上闪耀着可以打动读者心灵的亮光,优秀的出版人,要能够一眼发现这样的人。”^[10]只有这样,出版业才能更好地承担创造与传播的社会职责。

《文化苦旅》在文化界一炮走红之后,余秋雨又陆续出版了多部畅销书,其本人的出版营销技巧也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在凤凰卫视录制的一个系列节目成书出版时,余秋雨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主要亮点,是我和北大学生一起创造了一种最生动的课堂方式,曾在播出时让知识界极为感动。这将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12]这段话后被印在封面折页上,上面还配了一幅余秋雨坐在椅子上派头十足地挥动双手讲话的图片。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他参与的节目收视率也不差,但远没有达到“让知识界极为感动”的程度,当时很多看过电视节目的观众现在只记得一些镜头中的肢体语言,记不起他在电视上到底讲了些什么;根据该节目而结集出版的书籍销量确实不错,但远远没有“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

作为一个常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畅销书作家,余秋雨有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文化视野,他观察出版界的角度更独特,融入了个人的出书经验。他的畅销书出版的过程其实也是他对个人出版理念的诠释过程,他在与出版社的互惠互利中,完成了对自己作品的创造与传播。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用自己方式对历史进行解读,并且其解读方式不是传承与积累,而是创造与传播。他称受黑格尔的启示,认为“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历史学家常常不得不承担化验和清理灰烬的任务,而作家则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感知历史的余温”^[13]。这种写作方式跟他的出版理念也是一致的。以余秋雨的观

点推之,即使是出版经典文献,也不能仅仅把目标定为传承与积累,一定要加入创造性的元素,比如使用新的载体,加入新的阐释,进行新的编排,增加新的材料,以及创新传播方式,总之,应在经典文献与当代社会之间创造一个沟通对话的机会。

三、创造与传播在当代出版实践中的运用

尽管面临着数字技术的强烈冲击,但当代中国出版业仍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创造与传播及社会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创造与传播的出版理念正在当代出版实践中得到运用。

1.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创造性策划

中国的现代出版理念始于商务印书馆,而商务印书馆的核心理念也可以归结为创造与传播。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能为剧烈转型的时代提供新的文化成果,并传播这些文化成果。正如现代出版家王云五所总结的,“政治上每经一度之变动,文化上辄伴以相当之改进。而对此改进之工作,三十年间不绝赞助且赞助最力者,其唯我商务印书馆乎”^[14]。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经济体制大转型的前夜,那时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僵化,“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又割断了中国的文脉,知识阶层弥漫着焦躁的气氛。中国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但这种创造又不是凭空的,它需要出版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在分析的基础上有准确的判断,有针对性地发掘以往文化成果,以便为这种创造提供基础。

在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现代的学术视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道教史》《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士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等;第二类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前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法学40年》《经济法》等;第三类是西方学术经典及当代最新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包括近千页的大部头工具书《外国学术名著精华辞典》和系统全面的《青年译丛》等。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种明确的主体意识,希望从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西方文明成果三个源头上获得资源,以促进中国的新文化创造。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吴士余先生在谈到策划这三类著作出版时说:“应该说,接受前人的文化遗产,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有选择、有创造性的。这种文化传递中的主体意识,同样也是出版工作者所必须的。”^[15]如果出版者失去创造和传播的主体意识,追求利润至上,一味迎合读者和市场,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损失。当代中外出版界的很多问题虽有技术方面的冲击,但主要在于创造力的丧失和对市场无原则的迎合。日本出版理论家小林一博研究了日本的出版危机后也得出结论:“对市场的时尚的亦步亦趋扭曲了原本的文化教育和文化追求,文化变成了对市场和时尚的讨好与追求;出版对阅读口味和视野的引导,变成了对读者偏好的迁就和附和。读者的口味愈下降,出版就愈迁就,长此下去,读者和出版的素质都会下降,社会文化也会日益滑落。”^[16]

2. 古籍出版中的创造与传播

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发现,“几乎所有亚洲社会都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态度深深植根于亚洲传统之中,而且可能恰恰是亚洲传统的最基本要素。东亚的经济奇迹显然得力于集体努力追求这个优异的亚洲传统。因此,亚洲高速现代化的强大深层基础乃是它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方式”^[17]。在普通民众层面,比起政治说教或者西方的价值观,人们发现传统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念能更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问题,如诚信问题、家庭教育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等。

在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这种传统文化热潮的本质是一种创造当代新文化的强烈需求,人们希望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来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纠偏。这种需求带动了中国相关领域的出版发展。当出版者在选择积累和传承某种类型的经典时,必须对当代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并预先设想出未来新文化的形态,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可以用来建构新文化的元素,为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奠定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庞杂的整体,每一种理论体系都有其优劣,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代以前的各学派有过精辟的论述:“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

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18]而汉代以后到清代的漫长历史留下了更为浩瀚多元的传统文化资源,后世的很多新思想和新观念,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渊源和理论依据,这给古籍出版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门需要精心研习的艺术,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因此,对于中国的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岳麓书社这样的以出版古典文献为专长的文化机构来说,创造与传播这个理念也有一定的价值。不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值得出版和传播,对历史文献的筛选、整理和出版,若缺乏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需求的深刻洞悉,可能会因出版物的滞销而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又无益于当代文化的创造和传播。黑格尔曾在《美学》中写道:“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有一度存在过。……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19]

[参 考 文 献]

[1] 罗紫初. 出版学理论研究述评[J]. 出版科学, 2002(增

刊):5.

- [2] 吴士余. 出版坐标:文化的积累、建设与传播[J]. 编辑学刊, 1992(1):38.
- [3] 聂震宁. 内容创新是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有机结合[J]. 出版参考, 2013(3):6.
- [4] 雷华. 回归、坚守出版的本质——创意[J]. 出版广角, 2014(9):1.
- [5] 余秋雨. 世界戏剧学[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65.
- [6] 朱国华. 另一种媚俗——《文化苦旅》论[J]. 当代作家评论, 1995(2):60.
- [7] 佚名. 《文化苦旅》笔谈[J]. 鄂西大学学报, 1989(2):1.
- [8] 王国伟. 我和余秋雨的交往与误解[EB/OL] (2013-11-21)[2015-06-17].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105>.
- [9] 张弘, 王梦菁. 《文化苦旅》:掀起“文化大散文”热[N]. 新京报, 2008-12-06 (C10).
- [10] 余秋雨. 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J]. 编辑学刊, 2005(6):17.
- [11] 余秋雨. 青年人的阅读[J]. 新湘评论, 2012(8):18.
- [12] 余秋雨.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封面.
- [13] 张国龙. 2000—2010 中国散文现象批判[J]. 南方文坛, 2012(6):104.
- [14] 高翰卿.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284.
- [15] 吴士余. 出版坐标:文化的积累、建设与传播[J]. 编辑学刊, 1992(1):40.
- [16] [日]小林一博. 出版大崩溃[M]. 甄西,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4:151.
- [17] [美]罗兹·墨菲. 亚洲史[M]. 黄磷, 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574.
- [18]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2556.
- [19] [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朱光潜,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4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67-06

文明河南建设背景下推进中原文化传播的路径思考

李晶

(中原工学院 信息商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 推进中原文化广泛传播,弘扬中原人文精神,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可不断提高河南人民的道德文化素质,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从而从根本上推进文明河南建设。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关键在于文化的创新,文化传播样态创新,需要在形式和内容上共同推进:在艺术表现手段上,应紧跟媒体技术时代发展步伐,实现从传统传播渠道向高科技手段转变;在内容上,不但要吸纳中原历史文化元素,还应结合当代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去加工、改造传统内容,打通传统与现代的脉络,赋予中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具体来说,首先,应确保中原文化占领主流文化传播阵地,发挥其对文化的引领和价值支撑作用;其次,应加速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的融合,创新传播形式,使中原文化永葆自己的生命和活力;再次,应深入挖掘中原文化资源,赋予中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传播中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实现中原文化的传承创新;最后,应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升中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 中原文化;文化传播;文明河南;新兴媒体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2

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建设高度契合了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部署,是立足河南省情、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动实践。这“四个河南”建设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文明河南”建设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部署,可为河南省中心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曾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P105)]。《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明河

南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进文明河南建设,有利于生产、提供更好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解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提升人们幸福指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可见,文明河南建设与中原文化传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文化包含着道德,社会的文化程度昭示出社会的道德水平,而社会的道德水平又反映出社会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高尚的道德文化品质会促使人们产生文明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取决于该地区的文化认同度和文化自觉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孕育着河南特有的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

[收稿日期] 2015-07-26

[基金项目]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402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三重”专项计划项目(2014-DC-235)

[作者简介] 李晶(1984—),女,河南省博爱县人,中原工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认同与传播。

中原人文精神和道德品质,这些文化元素是文明河南建设的根基。中原文化的精神实质对提升民众文化素养、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力量。因此,推进中原文化广泛传播,弘扬中原人文精神,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可不断提高全省人民道德文化素质,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从而从根本上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当前,河南省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紧要关口,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要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总目标,切实推动“德润中原、文明河南”道德素质提升工程,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原文化凝心聚力的作用,在精神上聚集价值,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上达到一致。

目前关于中原文化的研究颇多,但多偏重于中原文化形态及内涵、中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以及古代中原文化的当代转型、中原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应用对策等研究,仅有个别学者着重探讨中原文化的传播机制,如杨杰的《论中原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弘扬传播》、骆玉安的《论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和特征》等,关于文明河南建设背景下的中原文化研究尚属新兴领域。鉴于此,本文拟在继承和吸收理论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中原文化在文明河南建设背景下的历史新特点,思考创新中原文化的传播样态,拓展中原文化的研究视阈,推进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中原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文化的创新,而文化传播样态创新需要在形式和内容上共同推进:在艺术表现手段上紧跟媒体技术时代步伐,实现从传统传播渠道向高科技手段转变;在内容上,不但要吸纳中原历史文化元素,还应结合当代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去加工、改造传统文化内容,打通传统与现代的脉络,赋予中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具体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占领主流文化传播阵地,发挥中原优秀文化的价值支撑作用

没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不能称为真正的民族,不能构成真正统一的国家。中原文化的传播就是为了促进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2013年河南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实施了以“人人讲文明,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德润中原,文明河南”道德素质提升工程,

以期用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原优秀人文精神,为文明河南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基础。而弘扬以中原文化为底蕴、以现代文明为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灵魂的中原文化精神,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占领主流文化传播阵地,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作为基础工程,融入文明河南建设的全过程,使之成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且自觉践行的价值观念,筑牢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舆论引导,坚持正面宣传,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全面提升河南形象,用正确的舆论导向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应积极推进“中原文化大讲堂”、道德模范故事会、中原道德文化宣讲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宣讲活动,突出中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作用,使中原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再造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资源。

二、创新中原文化传播样态,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这样谈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同样,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2]而传播方式的创新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途径,中原文化要想永葆自身的生命力和活力,就必须创新传播方式,以符合时代所需。

1. 加速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创新文化节目传播样式

当前,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高度发展,新媒体以其方便快捷、信息海量、受众门槛低等优势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烈冲击。随着河南省网络建设的发展及网民数量的提高,截至2013年9月底,河南省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5488万户,居全国第6位,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一。其中固定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1087.6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4400.3万户,网民规模达到5755万人,手机网民数量为4735万,手机网民占全省网民的比例高达7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3]。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基于新媒

体的传播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方式,占领着大众的碎片时间,急剧改变着中国的传播生态和舆论格局。因此,扩大中原文化的传播力,应着力加大网络新媒体技术的研发和运用,积极创新文化传播新样态,占领新媒体传播的制高点。

为此,传统媒体纷纷推出新媒体战略,拓展自身传播空间,而新兴媒体更是凭借技术优势整合传统媒体资源再传播,从而引发新一轮的传媒革命。例如,电视传媒和各大门户网站通力合作,或利用网络直播,或建立网站等对优秀节目进行宣传,以扩大栏目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比如2013年底河南卫视推出的文化类栏目《成语英雄》,就是借助网络新媒体技术给文化传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运用舞台多媒体、通过互联网传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扩展了传播范围。除此以外,《成语英雄》栏目还创造了同名APP游戏,将中华成语文化通过看图、猜图和玩家合作或PK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游戏覆盖了各年龄层的玩家,让人们在游戏中体会中国成语文化的智慧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事实证明,这一有效方式不仅提升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成为同类节目可资借鉴的范本。

可见,文化传播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发挥文化的渗透作用,使之具备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深入持久的影响力,而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予了中原文化传播更广阔的空间。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工作,充分发挥诸如手机报、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媒体传播样式的优势,充分利用数字媒体形式宣传和推介中原文化,使其传播形式适应时代需求,逐步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2. 打造区域文化交流平台,搭建中原文化融入现实生活的桥梁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应“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4]。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需全力打造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使中原特色文化以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人民群众。中原文化要想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需凝炼中原人文精神,打造区域性平台,搭建其融入现实生活的桥梁,以引导民众

在文化建设中展现自我,提升个人文化素质。

目前,河南卫视比较成功的两档节目《梨园春》《华豫之门》,就是依托了中原戏曲文化资源和收藏文化资源制作的优秀电视栏目。2013年,《梨园春》引入季播概念,使节目焕发出新的活力;《华豫之门》也全面升级改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节目在传承和传播中原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提高了自身品牌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其成功之处在于这类节目为广大戏曲爱好者和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广阔平台。特别是这些栏目还利用微博平台,加强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从而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在这里,民众不仅能够实现自我表现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同时也将保护中原戏曲文化和珍惜历史文物的社会共识推广开来。因此,搭建更多文化交流平台,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推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明河南形象的文艺作品,已成为河南文艺创作的核心任务。

总结以上两点,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中原文化传播面临着时代发展的新挑战,要实现中原文化传承的社会共识,需要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深化全媒体布局,推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手机报、官方微博、微信等全媒体联动发展,创造尽可能多的双向交流平台,发挥网络媒体的信息发布功能、舆论传播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在各种思想舆论交互叠加状态下有效控制其负面影响,加强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为传播中原文化,提供更多平台;另一方面,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人们广为关注的文化热点,不断进行文化节目创新,提升文化节目层次,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加强文化的原创力和吸引力,在深层次、宽领域上推动中原文化传播。

三、深入挖掘中原文化资源,展示中原文化独特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时曾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1](P104)}这对于推进中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河南省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大省,全省18个地市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我们要

深入挖掘中原特色文化资源,赋予中原文化以时代新内涵,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传播中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实现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 注重文化创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厚重的中原文化是几千年来华夏文明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文字的发明,更是反映了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发端于五帝时代的文字,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汉字的鼻祖,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再到楷书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传承和发展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是中原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电脑的普及,键盘输入取代了规范书写,造成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于电脑打字的依赖,甚至对于具体汉字写法都模棱两可,错别字、书写不规范等错误百出,中华汉字的魅力及其所体现的珍贵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现代科技发展的挑战。为重拾中华汉字魅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河南卫视借助中原汉字文化的历史优势,重磅推出了《汉字英雄》节目,集知识性和综艺性于一体,将文化与娱乐相融合。这一原创类文化节目不仅引领了电视栏目新方向,展现了中华汉字之魅力,也为青少年打造了展示汉字掌握水平和个性的机会与平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甚至要求广电系统学习借鉴《汉字英雄》栏目的做法,积极开办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文化节目。《汉字英雄》栏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经久不衰的体现。

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但其蓬勃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因此,在当下,要想更好地促进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深挖中原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要研究传统文化资源中便于与时代衔接的元素,通过创新展示方式、创新寓意内涵、创新语言风格、创新平台载体等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的传承和表现形式的传承有机结合,让传统文化的精华活在当下,为增强中原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认同、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发挥更大作用。”^[5]因此,从这一点讲,《汉字英雄》的热播给中原文化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中原文化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人文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中原文化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除汉字文化以外,民以食为天的农耕文化、血脉相连的姓氏文化、天地人和道法自然的老子文化等都是中原文化的宝贵资源。

当下要实现中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绝不是将这些文化符号视为“居庙堂之高”的空洞理论,更不是将其尘封在故纸堆里,而是要深入实际研究和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实质,并契合时代特质利用当下时兴的语言风格将之推广和传播给民众。《汉字英雄》栏目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启示:文化的传播需要赋予其当代价值,运用娱乐化的表达方式,加之新媒体技术对节目编排的创新,在展现其独特魅力的同时,也要让广大民众实现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主动接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发挥地方高校资源优势,深挖传统文化资源

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的发展,只有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推动文明进步。因此,文明河南建设必须根植于中原文化的深厚沃土,立足于中原地区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就中原文化资源的探索与挖掘来说,河南省高校有着得天独厚的在中原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优势:河洛文化、固始根亲文化、仰韶文化、大河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和突破。因此,在中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河南省高校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例如,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国学院,就是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培养国学高端人才;依托地域特色的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以“黄河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为主要研究方向,突出中原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其优势在于文化、文学、历史、民俗和哲学等学科之间的融合;依托历史文化资源的安阳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中心,以“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汉字文化研究”“红旗渠精神研究”等为内容,重点围绕殷商文明与中原经济区文化建设、汉字起源传承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开展高层次理论研究。同时,在豫高校还注重发挥中原文化的凝心聚力作用,十几年来,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学院等部分在豫高校,先后与台湾清华大学、静宜大学、台东大学等高校建立联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互聘讲学、举办学术论坛、合作研究等,在深入研究中原文化、传承华夏文明、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形势新任务,为深挖中原文化资源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特别是2013年以来,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河南省高校(豫南)成立了廉政文化研究中心,不断深入挖掘中原廉政文化资源,致力于当前如何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标

本兼治遏制腐败等问题研究,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廉政建设出谋划策。例如,河南省内乡县衙官德廉政文化研究就在此背景下取得了新的突破。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衙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封建时代县衙,其厚重的廉政文化与官德文化深受各级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和认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菏泽召开座谈会时专门引用了内乡县衙三省堂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内乡县衙官德文化研究在受到中央河南省省委、河南省政府和地方高校的高度重视下,不断取得新突破,在打造成为官德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成立古代官德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础上,采取分阶段、分主题对县衙官德文化进行深度挖掘,逐步丰富官德廉政文化的精神内涵,拍摄了首部反腐倡廉的微电影《楹联背后的故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公生明、廉生威”的廉政文化实质,为倡导高效、廉洁的文明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河南省高校在中原文化研究上尚面临着资金、技术等问题,在涉及中原文化交叉学科研究方面还需要不断取得新突破。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深入了解高校在新媒体时代推进中原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积极鼓励在豫高校不断加大现代技术与中原文化资源间的融合,并为将中原文化资源优势转换为品牌优势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各级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科研奖励,鼓励高校积极创建中原地域特色文化研究中心,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性的攻关研究,挖掘中原文化新的价值内涵,促进中原文化研究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3. 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展中原文化传播范围

一种文化越是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越是具有更广阔的地域价值和价值普适性,就越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优势。文化的的传承与创新还要求其扩大对外交流,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例如,《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明确指出:“要传承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区。”为此,近年来,河南省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地方

政府高度重视根亲文化的发展,以此为内容的大型节庆活动在创新文化传播样态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以《大河儿女》《窑变之大宋风云》《老农民》为代表的电视剧,以《海外少林》《我与红旗渠》为代表的纪录片都以其更广的传播范围,在中原文化对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2013年河南省成功举办了中国(河南)国际民间艺术节,这是我国规格较高、规模较大的国家级国际艺术盛会;2014年中国文化部与河南省文化厅在泰国合作举办了“中国河南文化年”,通过演艺、展览、讲座等多项文化活动,将嵩山少林、龙门石窟、殷墟、白马寺、云台山等中原符号传播到泰国,让泰国友人领略到了中原文化的精美绝伦。近年来,河南省承办的高层次的文化交流盛会不断增多,这些活动在提升中原文化内涵、借鉴他国文明成果、传播中原人文精神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升中原文化核心竞争力

文化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中原文化传播要想获得长足发展,离不开层次合理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更离不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无疑是未来中原文化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原文化传播人才相对匮乏,尤其是缺少文化名家、大家和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更缺少在国内外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名家,这也是河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网络技术革新,河南省相关技术人才更显匮乏。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解决文化传播人才匮乏问题,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等多方的通力协作。

首先,政府应承担起主要职责,采取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机制,做好青年文化人才的培养工作;应积极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完善高层次人才、网络高端人才的选拔、聘用和激励机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其次,各级文化企业应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为了留住人才、稳住人才,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完善相关激励机制,为文化人才成长提供土壤。同时,各级文化企业也应不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从多方面为高层次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最后,高校应担当起文化人才和网络高端人才

培养的任务,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推进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创新,与文化产业部门建立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培养文化发展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具有交叉学科知识的综合性人才。例如,基于新媒体的微传播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需要一大批紧跟信息时代步伐、具有网络技术创新能力的高端传播人才。这就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首先,要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学生综合素质、文化创意理念、创新精神的培养。其次,要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文化传播的创新不仅仅是基于单一学科的研究,也不是多个学科的简单交叉,而是多学科的融合与创新。最后,还应从市场需求出发,注重专业理论培养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理论指导具体的实践,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要,创造更多满足市场需求和人民需要的文化作品。高校只有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原文化传播的人才培养之路,使得文化传播各个环节中的人才构成有效衔接,才能不断增强中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使人才培养真正成为中原文化传播的助推器。

五、结语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孕育了河南特有的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原人文精神。提升河南人民整体文化素质,助推文

明河南建设,要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道德营养。首先,应确保中原文化占领主流文化传播阵地,发挥其对文化的引领和价值支撑作用;其次,应加速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的融合,创新传播形式,使中原文化永葆自己的生命和活力;再次,应深入挖掘中原文化资源,赋予中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传播中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实现中原文化的传承创新;最后,应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升中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总之,只有多方协同联动,才能再造中原文化的新辉煌,为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深入推进“一个载体、三个体系”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 [2] 费孝通.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308-309.
- [3] 卫绍生. 河南文化发展报告(2014)[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0.
- [4]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 人民日报,2012-11-18(01).
- [5] 王桂兰. 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研究论纲[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73-04

新媒体视域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初探

原茵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是公民文化的实质,随着公民文化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文化逐渐成为公民文化的核心。公民参与文化在网络上主要表现为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即公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语言或者其他方式,对某些公共事务或社会问题提出意见、表达看法。新媒体视域下我国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信息过量下的盲从性、文化多元下的复杂性、虚拟世界中的真实性等特征。当前我国需要培育的文化,重点之一是参与型的现代公民文化,而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给这种文化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片土壤。针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应健全法律法规,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提升公民素养,引导公民理性参与;完善信息通报长效机制,强化正面导向力,以培育高效有序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新媒体;公民文化;网络政治参与;参与型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06;D62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3

公民文化的实质是公民政治参与文化,它是一个国家维持政治稳定和提高政治效率的心理条件和价值观基础,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新媒体的发展给公民的政治表达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加强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在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网络事件的涌现和网络政治舆论的形成,表明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常态。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广泛性、盲从性、复杂性、真实性等特征。

国内关于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研究在1980年代得到重视,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政治参与文化的成长与国家、社会对精神文明的倡导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决定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形态,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背景使百姓形成了顺从、接受的心理状态,臣民文化和村民文化仍存在于参与型文化之中,并对参与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作用。而时代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

殊性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文化需要在新媒体的环境中成长^[1]。本文拟以新媒体为视角,从公民文化入手,分析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的特点,就如何培养建设性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进行探讨。

一、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内涵

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是公民文化的实质,它随着公民文化的发展逐渐成为公民文化的核心。自1960年代起,“公民参与文化”一词在西方的政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伯,他们在1956年首次将公民政治参与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独立的体系进行研究。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中,通过分析公民的政治行为与国家民主制度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公民参与对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们认为,公民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不仅要依靠政府机构和政治秩序,还需要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即政治文化,只有政治文化与政治系

[收稿日期] 2015-07-25

[基金项目] 郑州大学招标项目(XMTGGCBYJS32)

[作者简介] 原茵(1991—),女,河南省新乡市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

统相匹配,政治系统才能正常运行^{[2](P1)}。由此可知,公民文化主要指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其衡量的标准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和程度。阿尔蒙德和维伯指出: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一种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2](P519)}。可见,公民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不仅源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融入了现代社会的诸多因素,是处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文化。根据公民对于一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态度和认知,公民文化又可以分为三类:村民文化(地域型文化)、臣民文化(依附型文化)和参与者文化(参与型文化)。

在以参与型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文化中,虽然有部分人消极被动,机械接受国家的统治,充当着臣民的角色,但大部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沟通着政府与公民,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保持政治效率,可以保持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间的关系、公民主观能力感与主动参与政治的关系、公民群体功利与情感间的关系、公民之间政治一致与政治分歧间的关系^[3]。正是这种诸多交织在一起的公民政治文化,达成了公共政策的底线共识,成为了公民日常生活的准则。

二、新媒体视域下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

公民参与型文化在网络上主要表现为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即公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发声或者其他方式,对某些公共事务或者社会问题提出意见、表达看法^[4]。如今,新媒体已经逐步成为国家传播政治思想、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重要工具,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来看,这主要是由下面两个方面决定的。首先,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自主性、交互性、便捷性等特点,为公共议题创造了传播与沟通的平台。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大众媒体在我国具有宣传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解释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舆论引导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媒体不仅是一个传播消息的平台,同时还肩负着组织社会的重任。新媒体更加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这是由于新媒体打破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边界,使各种传播形式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实现,它的低门槛使其逐渐成为社会意识自由表达、社会情绪宣泄的主要渠道,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看法,

参与政治讨论,并且在必要时聚集网友形成力量来影响政策决定,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大。其次,新媒体推动着网民向网络公民身份转变。不断发展的新媒体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成为民众参政议政最常用的平台,广泛的政治参与重构了人们的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网络舆论焦点事件,大量的网民参与到一些涉及个人或者社会利益事件的讨论中来,社会转型中公民的责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觉醒,并且具有了公民参与的味道,公民参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公民参与文化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5],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越来越带有“公民行为”的色彩,网民的公民意识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得到觉醒。

如上所述,新媒体以其独特的传播特点而成为公民获取信息、表达民意、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相应地,新媒体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也表现出新的特征。

1. 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准入门槛低,人人都可以平等地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这使得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舆论阵地,广大公民在此找到了政治参与和宣泄的平台,并借助这个平台发表政治见解。

网络的开放性催化了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一个普通网民就可以凭借独到的言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参与人数众多,任何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络对社会事件发表看法,虽然参与者来源多样,立场不尽相同,但共同形成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合力;其次,参与对象涉及面广,既有事件的当事人,也有全国各地各阶层的网民,而且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几乎包含了所有年龄段。近几年来,“厦门PX事件”“躲猫猫事件”“郭美美事件”等网络维权和群体事件屡见不鲜,一些事件造成了轰动效应,在全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我国新媒体的使用人数不断增长,基本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6.6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8.8%^[6],并还在持续上升,这表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主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政治敏感度有所增强。

2. 信息过量下的盲从性

在我国,千百年来臣民文化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公民对上面的政策是盲目地、被动地接受的,这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往往会通过国家、宗教、法律、监狱等方式来培育符合其政治利益的臣民文化。在虚拟世界中,公

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的盲从性,除了现实原因外,还与新媒体本身的特殊性有关。

表面上,在无限扩张的全球连接中,人们仿佛可以随时随地接触更多有益的信息,但新的断层正在形成,新媒体中“数字鸿沟”现象使得公民接触的资源,本来多者更多,本来少者更少,这加剧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公民在现实中接触到的信息是有限的,这与个人的文化水平、社会环境和交往范围等呈正相关,想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必须依靠网络。由于“数字鸿沟”现象的存在,一些公民在网络中面对过量的信息缺乏主见,希望有现成的答案,常常顺从意见领袖的选择,进行大胆的转发和扩散,缺乏自身的思考。同时,无限制的网络自由导致了网民非理性情绪的泛滥,网民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负面信息和谣言,此时不少网民常会不假考证地跟随其他网民对政府发表不满言论,从而造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盲从性。

3. 文化多元下的复杂性

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公民都渐渐形成了各自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使得公民政治参与文化表现出多元性。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把关人”的存在,恶意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难以进入公众视野。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开放的网络环境使公民都可以在网络上各抒己见,公民不同的文化和观念背景,有时甚至会成为网络上舆论冲突的导火索。如在微博上,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信息传播上的优势,大力推行西方文化,使之成为网络上的主导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通过网络渗透到我国的民族文化之中,其动机具有文化殖民倾向。当然,也有大量的网民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往往左右着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在新媒体平台上发生政治博弈,出现相互对立的两种或者多种舆论,其斗争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

4. 虚拟世界中的真实性

网络自诞生以来,就成了虚拟世界的代名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的政治参与形式,虚拟性贯穿到政治参与的整个过程。其一是参与者身份的虚拟性,网民在网络上的身份是利用文字、图像符号来描述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网民都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中,这是虚拟性的一种表现;其二是网民身份的不确定性,即网民的在线状态是不确定的,并不一定与现实的身份重合或者相一致;其三是社会等级的重建,即网络上所呈现出的

社会等级关系的出现重构了一种与离线(现实)社会等级关系不同的等级^[7]。然而不能因此就否定网络政治参与的真实性。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以现实为基础进行的,不会完全脱离现实社会,公民在网络上表达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一旦被相关部门采纳,也将反过来在现实社会中推广实施,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扩大了民主参与的范围,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然而,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实现应以公民的理性为基础^[8],在许多网络事件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公民打着道德至上的旗号对政府发动攻击,与政府为敌,无视党纪国法,并大肆传播谣言,形成社会恐慌,这种缺乏理性的网络暴力,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真实性带来了严峻挑战。

三、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的培育

有学者认为,对于从封建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而言,培育一种同西方国家类似的公民参与文化任重道远。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与之相对应的臣民文化根深蒂固,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思想观念不鼓励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另外,中国长久以来缺乏有效的政治表达渠道,再加上公民政治参与意识薄弱,政府的政治输出没有与公民的政治输入保持平衡,这对于我国的政治稳定和政府工作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9]。

当前我国需要培育的文化,其重点之一是参与型的现代公民文化,而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给这种文化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滋生于这片土壤。笔者认为,培育有序高效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健全法律法规,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效率最大化需要一个有序的网络环境,而法律法规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健康有序的重要保障。当前新媒体蓬勃发展,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愈来愈成为一股重要的话语力量,它表达着公民群体的呼声,发挥着网络监督的功能。自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颁布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部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对于规范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相较于近几年新媒体的飞速发展,目前我国的网络立法发展滞后,现有的法律保障措施难以跟上网络发展的速度,针对微博上层出不穷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事件,可参照的法律条文较少,

对不良网络现象难以有效治理。由此可见,为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我国应制定一部完整的有关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利用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和引导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明确政府、网络媒体、公民三者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应整合相关法律规范,提高立法的层次与水平,并认真监督法律的实施。

2. 提升公民素养,引导公民理性参与

良好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环境的形成,与公民自身的道德素养、媒介素养息息相关,也离不开公民的理性参与。美国知名企业家埃瑟·戴森曾经指出:“网络在赋予个人强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求个人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10]公民在网络中充当着信息的传播者和反馈者的双重角色,拥有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也应随之增加,其自身的媒介素质、社会责任感、道德修养等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效果。

培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提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引导公民理性参与,提升公民素养是关键。首先,应培养社会大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包括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除了对公民进行权利意识的培养外,还应该更加注重对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其次,应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和道德素养。公民应掌握网络信息的浏览能力和思辨能力,能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从而把虚假的网络信息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同时应严格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明确自身言论的是与非,真正实现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价值。

3. 完善信息通报长效机制,强化正面导向力

完善信息通报长效机制,可进一步保障网民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知情权,使得政府可以更好地掌握舆论的主动权,从而有效引导舆论的走向。政府对网络政治参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及时作出回应,对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和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应完善信息搜集机制,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事件。政府应遵循有情必报、规范运作、快速反应的原则,及时处理各种信息,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向。同时应建立信息应急管理部门,面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出现的刺激性言论,及时整合收集,作出相应的处理,并对一些有价值的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实施。

其次,应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利用新媒体促进政府与网民之间的双向沟通。目前有许多政府网站存在信息更新不及时、网友留言得不到及时回复等问

题,削弱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鉴于此,政府部门应明确网站职能,派专职人员对政务网站和帐号进行管理,提高网上服务质量,实现政府与公众互动平台的对接。同时应鼓励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加强与之的沟通、互动,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新媒体的普及扩大了公共领域的边界,延伸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和培育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下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表现出广泛性、盲从性、复杂性、真实性等特点,也有一些学者对参与者身份和言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表达政治意愿、参与公共事务的趋势不可逆转。因此,如何引导公民进行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是需要各方共同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们相信,在法律规范、道德教育和政府管理的共同作用下,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必将沿着更加理性和有序的方向进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黄建洪. 公民文化——中外语境下的考量与公民文化培育[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2): 38.
- [2] [美]阿尔蒙德, 维伯. 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 徐湘林,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3] 王乐里. 政治文化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46 - 151.
- [4] 朱世欣.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问题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2): 14.
- [5] 师曾志. 沟通与对话: 公民社会与媒体公共空间——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J]. 国际新闻界, 2009(12): 82.
-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5-07-22) [2015-07-25].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hlwtjbg/201507/t20150722_52624.htm.
- [7] 黄永林. 网络舆论检测与安全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3.
- [8] 王晓升. 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J]. 学术研究, 2011(4): 18.
- [9] 梁莹. 媒体信任与现代公民文化的成长——影响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媒体信任因素探析[J]. 学海, 2008(5): 90.
- [10] [美]埃瑟·戴森. 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77-07

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林善炜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部,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在对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借用Feder的分析方法,分析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考察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和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技术外溢作用,可得出结论:(1)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溢出效应越大,经济发展的效率越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也越大;(2)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比重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也越大;(3)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长越快,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也越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也越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出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情况下,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必须通过积极培育先导产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优化生产和出口结构,即完成生产和出口结构从初级产业及产业链低端向高级产业及产业链高端的转变。

[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后进国家;出口贸易;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4

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口部门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一国短期贸易利得的大小,而且会影响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部门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选择。选择未来潜在市场需求大、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出口部门,积极创造比较优势,不仅会提高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而且还会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引导产业升级,进而促进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本文拟在对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借用Feder的分析方法,分析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考察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和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技术外溢作用,进而提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

一、静态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

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

与贸易过程中都应该遵循“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现有条件下(即国内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供给基本不变),一国如果集中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富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1],则可以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比较优势一旦形成,就将长期存在。任何违背比较优势原则、试图利用任何产业政策进行经济干预的行为,都将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进。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正是在传统贸易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但在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下,各国间的分工往往呈现两极分化的格局: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等优势占据有利位置,从事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并在这些高附加值的部门确立比较优势;后发国家则由于先天的不足,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只能从事低技术产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并在长期的分工与贸易中形成静态比较优势,而在高技术、高

[收稿日期] 2015-05-20

[作者简介] 林善炜(1969—),男,福建省大田县人,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贸易。

附加值领域长期处于比较劣势地位。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坚守静态比较优势,意味着长期锁定在低价格弹性、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这不仅会影响后发国家的贸易利益,导致后发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长期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种分工模式的继续,后发国家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也进一步延续:出口能耗大、高度依赖于原材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污染本国的环境^[2],浪费本国的资源,换取微薄的利润和工资报酬,让发达国家享受后发国家生产的低成本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也就越严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也就越突出。^[3]长期坚持这种低效型发展方式,让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高消耗,无疑是换取短期利益的“慢性自杀”^[4],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具体而言,静态比较优势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从负面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

首先,静态比较优势容易导致后发国家陷入低水平陷阱,出现巴拉萨所说的“贫困化增长”^[5],而“贫困化增长”又反过来使得低效型发展方式无法改变(如图1所示)。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后发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但其需求弹性比较低,从长期来看,其价格有下降的趋势。此外,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单位价值量比较低,生产商一般只能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才能增加收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度增长虽使其出口能力大增,但又会进一步促使其出口价格下降,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虽然可以通过提高产量来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应(比较 S_1 和 S_2),但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本国实际消费水平 C_2 还不如经济开放前自给自足的消费水平 C_1 ,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也出现下降(比较 U_1 和 U_2 两条无差异曲线),从而导致陷入低水平陷阱。由于产出效率低,后发国家只有扩大生产和出口规模,才能维持一定的产出增长,而这个过程同时也使得低效型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地延续。

其次,静态比较优势导致产业结构锁定在低端领域,技术进步缓慢,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低下,从而使后进国家陷入低效型发展方式。静态比较优势强调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忽视新的、潜在的比较优势的培育,鼓励资源往比较优势大的部门转移。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进行国际分工与合作,虽然

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和“出口中学”等途径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但同时也放弃了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机会。由于“干中学”只是在原有技术框架下求微小进步,其效应是有限的,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日趋衰微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只能根据现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其技术进步及其速度对生产效率的贡献是有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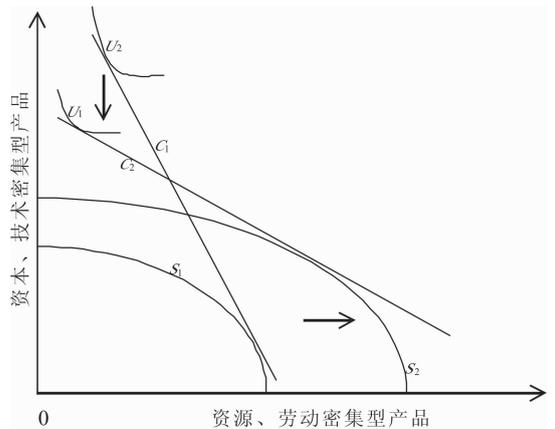


图1 低水平陷阱与贫困化增长

再次,静态比较优势容易导致忽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人力资本逐渐取代资源、资本和普通劳动力而成为最为关键的要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片面强调现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较为低级要素的使用,而忽视人力资本要素的培育,特别是忽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如卢卡斯所言,各国如果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即初始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专门从事学习效率高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初始人力资本缺乏的国家专门从事学习效率低的低技术产品生产,那么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会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生产技能和经验,并获得比封闭状态下更高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而人力资本缺乏的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封闭状态下情形。^[6]

总之,后发国家如果完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选择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生产,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分工利益,但会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贸易利益无法保证的局面。过分强调发挥现有优势,会使得后发国家长期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丧失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动

力,导致其经济发展方式处于长期落后的局面。

二、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战后,世界各国纷纷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以日本、韩国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迅速崛起,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很多学者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rugman等^[7-8]相继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认为“东亚奇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实施,即通过补贴和保护政策等,对某些产业进行重点扶持,促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动态比较优势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动态比较优势强调在开放和竞争中提高竞争力,而贸易保护主义则认为对某一产业的保护应该关起门来进行。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尽管人们在很多场合提到动态比较优势,但并没有对何为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统一的认识,这或许是由于这些亚洲国家获得成功的背景和具体途径各异,也或许是因为学者们对东亚各国发展原因的看法不一。

Redding^[9]首次将动态比较优势定义为:一国在时点 t 上实现 i 部门生产的机会成本增长率比其他国家更低,则该国在时点 t 上关于 i 部门的生产活动就具有动态比较优势。Redding的这一定义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并被很多学者加以引用。但他的定义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更多地强调后发国家如何通过降低机会成本增长率,使某些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动态地获得比较优势。可以说,这一认识,并没有突破世界现有的产业格局。实际上,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差异化,很多新的产业会层出不穷地涌现,后发国家更应该将目光投放到那些尚未被开发的领域,而不是仅仅依靠“干中学”去获得某项学习效应有限的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此外,Redding的定义似乎有一种“马后炮”的味道,因为他只回答了动态比较优势“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回答哪些产业可以培育成为动态比较优势,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实现动态比较优势。

笔者认为,动态比较优势是立足于未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而主动培育的一种潜在优势,即产业的选择应该面向未来的潜在市场需求,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帮助,鼓励企业进入,发挥领先者的优势,先发制人,积极创造和培育全新的比较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仅是在某一时点上获得的生产成本优势,更是一种以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等为支撑的竞争优势。动态比较优势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靠产业保护就能简单实现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要素禀赋结构动态升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专门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结果,其目的是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培育新的要素禀赋,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动态升级,进而引起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出口部门的优化。

静态与动态之区别,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战略选择着眼点的不同所导致的。按静态比较优势还是按动态比较优势进行资源配置,既是一个发挥比较优势抑或获取潜在优势的两难选择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重当前利益或重未来发展的权衡取舍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贸易,虽可以获得交换利益和专业化利益,但不利于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而着眼于未来发展的角度配置要素资源,表面上看,损失了当前的贸易利益,但可获得未来的先进生产力,实现在未来某个时点上对发达国家的超越,甚至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贸易理论引领着贸易实践的进程,而贸易实践又反过来检验贸易理论的适用性。任何一个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应用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选择什么样的贸易理论、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必须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外贸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理论指导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就二战后各国的贸易战略及其效果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动态比较优势战略的贸易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完成了经济发展的飞跃,但这种现象在同样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的拉美国家中并没有出现。很多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将东亚国家近几十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称为“亚洲奇迹”,认为这是个谜。实际上,认真分析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背景,可以发现,两者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正是这种背景差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也为是否应该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提出了一个时机标准,即产业结构是否已经进入工业主导阶段?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国是否有足够大的市场,或者本国的出口贸易是否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很显然,在这些方面,众多拉美国家都存在不足,或者说贸易战略转

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三、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

发展战略的选择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效果。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强调发挥现有资源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往往意味着现有资源要素的过度开发,而对更重要的动态要素,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和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能力等重视不足。以这一战略为指导,容易导致经济发展过分追求短期利益增长,忽视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容易导致经济陷入 Krugman^[10] 所言的“投入驱动型增长”,即高经济增长率与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产出效率并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益突出,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这种战略及其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不是一国长期发展的最优选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发展方式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出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调整出口结构,即通过比较优势部门动态变化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 基于出口分类的三部门模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拉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之一的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16世纪,重商主义学派就认识到出口贸易的重要性,指出应该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等措施增加本国的货币和财富。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进一步提出了分工与贸易的思想,更加明确指出一国应该如何参与国际贸易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福利的改进。在经历了192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鼓励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开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凯恩斯对整个经济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做了全新的梳理,认为按总需求划分,国民经济可以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个部门,国民收入恒等式为: $Y = C + I + G + (X - M)$ 。此后,很多学者在凯恩斯的开放经济四部门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常见的方法是将上面等式左右两边分别对时间求导,其结果为:

$$\dot{Y} = \dot{C} + \dot{I} + \dot{G} + (\dot{X} - \dot{M}) \quad (1)$$

对①式进行简单运算可得:

$$\frac{\dot{Y}}{Y} = \frac{\dot{C}}{C} \cdot \frac{C}{Y} + \frac{\dot{I}}{I} \cdot \frac{I}{Y} + \frac{\dot{G}}{G} \cdot \frac{G}{Y} + \frac{\dot{NE}}{NE} \cdot \frac{NE}{Y} \quad (2)$$

其中, $NE = X - M$ 为净出口, $\frac{\dot{C}}{C}$ 、 $\frac{\dot{I}}{I}$ 、 $\frac{\dot{G}}{G}$ 、 $\frac{\dot{NE}}{NE}$ 分别为各个变量的增长率, $\frac{C}{Y}$ 、 $\frac{I}{Y}$ 、 $\frac{G}{Y}$ 、 $\frac{NE}{Y}$ 分别表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1],各个部门通过乘数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出口部门通过贸易乘数的大小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乘数大小为 $\frac{dY}{dX} = \frac{1}{1 - \beta + \gamma}$,其中 β 为边际消费倾向, γ 为边际进口倾向。由乘数等式可知,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 β 成正比,与 γ 成反比。这种分析方法较为直观,数据也较为容易获取,因此长期以来广受学界的青睐,但其存在的缺陷也很明显。根据这种方法,只能测算出整个出口贸易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无法获知哪个出口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也无法比较不同出口部门对本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作用的差异。在国际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种方法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因此需要对这一方法进行改进,考虑不同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以便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扶持性和抑制性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凯恩斯的开放经济模型作适当调整,按总需求划分,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三个部门统称为国内部门,与此相对应的是将贸易部门称为国外部门。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出口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将出口部门划分为基于现有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而进行生产的静态比较优势部门和基于未来潜在市场需求、对国民经济具有先导作用的动态比较优势部门。这两个出口部门除了通过外贸乘数促进经济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率差异和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国内部门,引导资源在各部门间的优化配置,促进整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部门间的作用机理见图2。

2. 基本机理分析

在对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本文借用 Feder 的分析方法,考察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和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技术外溢作用。假设经济存在如上三个部门,由此可得出如下公式:

$$Y = N + S + D \quad (3)$$

其中, Y 代表总产出, N 表示国内非贸易部门的

产出, S 表示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产出, D 表示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产出。

由于要素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因此各个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假设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具有技术外溢效应,动态贸易部门对静态贸易部门也有技术外溢效应,三个部门的生产率不同,由此可得出各自的生产函数如下:

$$Q_N = F(L_n, K_n, \gamma_n^s, \gamma_n^d) \quad (4)$$

$$Q_S = G(L_s, K_s, \gamma_s^d) \quad (5)$$

$$Q_D = H(L_d, K_d) \quad (6)$$

$L_i, K_i (i = n, s, d)$ 分别表示各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投入, $\gamma_n^s, \gamma_n^d, \gamma_s^d$ 分别表示 s 部门对 n 部门、 d 部门对 n 部门、 d 部门对 s 部门的外溢效应。假设生产要素总量全部用于这三个部门的生产,可得式⑦:

$$L = L_n + L_s + L_d \quad \partial L = \partial L_n + \partial L_s + \partial L_d \quad (7)$$

假设三个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且满足:

$$\alpha_s / \alpha_n = \beta_s / \beta_n = 1 + \delta_s \quad (8)$$

$$\alpha_d / \alpha_n = \beta_d / \alpha_n = 1 + \delta_d \quad (9)$$

其中, $\alpha_n, \alpha_s, \alpha_d$ 分别表示三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 $\beta_n, \beta_s, \beta_d$ 分别表示三部门资本边际生产率。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出口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高于国内非出口部门, $\delta_s > 0, \delta_d > 0$; 此外,动态贸易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高于静态贸易部门,因此满足 $\delta_d > \delta_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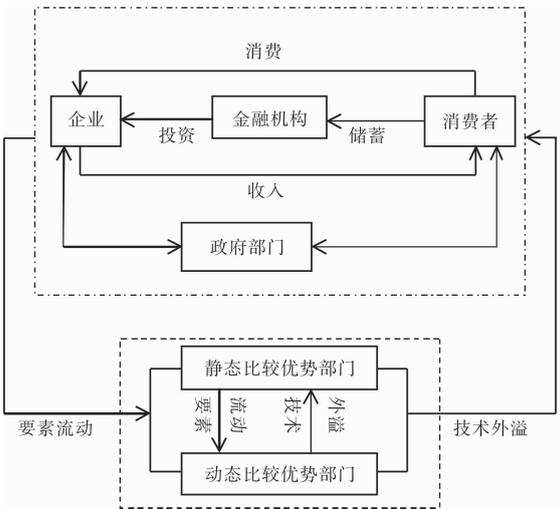


图2 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

分别对③④⑤⑥等式两边求微分,可得:

$$\partial Y = \partial N + \partial S + \partial D \quad (10)$$

$$\partial N = \alpha_n \partial L_n + \beta_n \partial K_n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quad (11)$$

$$\partial S = \alpha_s \partial L + \beta_s \partial K_s + \gamma_s^d \partial D \quad (12)$$

$$\partial D = \alpha_d \partial L_d + \beta_d \partial K_d \quad (13)$$

根据⑩~⑬式进行整理可得:

$$\begin{aligned} \partial Y = & \alpha_n \partial L_n + \beta_n \partial K_n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 \alpha_s \partial L_s \\ & + \beta_s \partial K_s + \gamma_s^d \partial D + \alpha_d \partial L_d + \beta_d \partial K_d \end{aligned} \quad (14)$$

由⑦⑧⑨⑩式可知:

$$\begin{aligned} \alpha_n \partial L_n + \beta_n \partial K_n = & \alpha_n (\partial L - \partial L_s - \partial L_d) + \\ & \beta_n (\partial K - \partial K_s - \partial K_d) = \alpha_n \partial L - \frac{\alpha_s}{1 + \delta_s} \partial L_s - \\ & \frac{\alpha_d}{1 + \delta_d} \partial L_d + \beta_n \partial K - \frac{\beta_s}{1 + \delta_s} \partial K_s - \frac{\beta_d}{1 + \delta_d} \partial K_d \end{aligned} \quad (15)$$

将⑮式代入⑭式,可得:

$$\begin{aligned} \partial Y = & \alpha_n \partial L + \beta_n \partial K + \frac{\delta_s}{1 + \delta_s} (\alpha_s \partial L_s + \beta_s \partial K_s) + \frac{\delta_d}{1 + \delta_d} \\ & (\alpha_d \partial L_d + \beta_d \partial K_d)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 \gamma_s^d \partial D \end{aligned} \quad (16)$$

将⑫⑬式代入⑯式,可得整体经济边际产出 ∂Y 与静态比较优势部门边际产出 ∂S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边际产出 ∂D 之间的关系如下:

$$\begin{aligned} \partial Y = & \alpha_n \partial L + \beta_n \partial K + \left(\frac{\delta_s}{1 + \delta_s} + \gamma_n^s \right) \partial S + \\ & \left(\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right) \partial D \end{aligned} \quad (17)$$

其中, γ_n^s 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的外溢效应,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表示动态贸易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的外溢效应, $\frac{\delta_s}{1 + \delta_s}$ 和 $\frac{\delta_d}{1 + \delta_d}$ 分别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的要素产出效率差异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

⑰式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不仅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有关,还与三个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差异以及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大小有关。由⑰式可得定理1。

定理1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溢出效应越大,经济发展的效率越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也越大。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是以未来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技术创新创造优势的部门,它不仅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且还通过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带动静态比较优势部门和国内非出口部门的发展。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越大,即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溢出效应越大,则对其他部门生产效率的影响也越大,因此对整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也越明显。

根据 Bruno 和 Feder 的假设,一个给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人均劳动力产出存

在线性关系^[12], 即:

$$\alpha_n = \alpha(Y/L)$$

同时,我们对资本边际生产率作对称性假设,即满足:

$$\beta_n = \beta(Y/K)$$

则⑰式可表示为:

$$\partial Y = \frac{\alpha Y \partial L}{L} + \frac{\beta Y \partial K}{K} + \left(\frac{\delta_s}{1 + \delta_s} + \gamma_n^s \right) \partial S + \left(\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right) \partial D \quad (18)$$

对⑱式两边同时除以 Y, 并进行简单运算, 可得:

$$\frac{\partial Y}{Y} = \frac{\alpha \partial L}{L} + \frac{\beta \partial K}{K} + \left(\frac{\delta_s}{1 + \delta_s} + \gamma_n^s \right) \frac{\partial S}{S} \times \frac{S}{Y} + \left(\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right) \frac{\partial D}{D} \times \frac{D}{Y} \quad (19)$$

其中, $\frac{\partial S}{S}$ 、 $\frac{\partial D}{D}$ 分别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的增长率; $\frac{S}{Y}$ 、 $\frac{D}{Y}$ 分别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占经济总量的比重。

⑲式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整体经济发展效率与出口部门的构成存在紧密联系。由⑲式可得定理 2。

定理 2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比重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也越大。

由于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即 $\delta_d > \delta_s$, 满足 $\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delta_s}{1 + \delta_s}$, 这意味着单位要素配置在动态贸易部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高于静态贸易部门。定理 2 说明,资源应该从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非出口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向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动态贸易部门流动,这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比较优势部门的升级是如何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国内非出口部门的生产,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

将⑮式代入⑩式,可得:

$$\partial N = \alpha_n \partial L - \frac{\alpha_s}{1 + \delta_s} \partial L_s - \frac{\alpha_d}{1 + \delta_d} \partial L_d + \beta_n \partial K - \frac{\beta_s}{1 + \delta_s} \partial K_s - \frac{\beta_d}{1 + \delta_d} \partial K_d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quad (20)$$

将⑫⑬⑳式代入⑩式,可以得到如下一个关于 ∂N 的函数式:

$$\partial N = (\alpha_n L + \beta_n K) + \left(\gamma_n^s - \frac{1}{1 + \delta_s} \right) \partial S + \left(\gamma_n^d - \frac{1}{1 + \delta_d} + \frac{\gamma_s^d}{1 + \delta_s} \right) \partial D \quad (21)$$

仍假设 $\alpha_n = \alpha(Y/L)$, $\beta_n = \beta(Y/K)$, 则⑳式可以变形为:

$$\partial N = \left[\frac{(1 + \delta_s)(\alpha + \beta + \gamma_n^s) - 1}{(1 + \delta_s)[1 - (\alpha + \beta)]} \right] \partial S + \left[\frac{(1 + \delta_s) \left[\alpha + \beta + \gamma_n^d - \frac{1}{1 + \delta_d} \right] + \gamma_s^d}{(1 + \delta_s)[1 - (\alpha + \beta)]} \right] \partial D \quad (22)$$

㉑式说明,国内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受静态比较优势部门和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发展的影响。由㉑式可得定理 3。

定理 3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长越快,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也越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也越快。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动态贸易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的发展都会对非出口部门生产产生影响,影响的途径是通过要素生产率差异和外溢效应的联合作用进行的。当 $\delta_d > \delta_s$ 、 $\gamma_n^d > \gamma_n^s$ 时,即动态贸易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与技术外溢效应都比较高时,满足

$$\left[\frac{(1 + \delta_s) \left[\alpha + \beta + \gamma_n^d - \frac{1}{1 + \delta_d} \right] + \gamma_s^d}{(1 + \delta_s)[1 - (\alpha + \beta)]} \right] > \left[\frac{(1 + \delta_s)(\alpha + \beta + \gamma_n^s) - 1}{(1 + \delta_s)[1 - (\alpha + \beta)]} \right]$$

说明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长越快,其对非出口部门生产率进步的贡献也越大。这个定理也从侧面证明,资源从非出口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向动态贸易部门转移,是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四、基本结论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一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是选择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还是选择积极创造比较优势,是一个发展战略的权衡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贸易利益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长期贸易模式及其经济发展方式。遵循静态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虽可以实现当前的贸易利益最大化,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可能导致本国陷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动态比较优势,虽然会损失当前的比较利益,但可获得潜在的发展机会,使后发国家摆脱低水平的发展陷阱,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完

成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

创造动态比较优势是一种战略,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通过实施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有重点地优先发展一些先导产业,有选择地培育专门要素,有意识地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可以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由于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代表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先进水平,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加快发展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加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比重,不仅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且有利于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国的贸易模式、长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贸易比重的大小及比较优势部门的分布情况,都会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必须通过积极培育先导产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优化生产和出口结构,即完成生产和出口结构从初级产业及产业链低端向高级产业及产业链高端的转变。

[参 考 文 献]

- [1] 陈利霞,王长义.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维护[J]. 商业研究,2005(3):13.
- [2] 张鸿.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思考[J]. 国际贸易,2005(9):4.
- [3] 何帆. 进口是贸易战略的另一只翅膀[EB/OL]. (2005-04-21) [2015-05-10]. [http://www. ce. cn/new_hgjj/jjxr/xuerenziliao/200504/21/t20050421_3670483.shtml](http://www.ce.cn/new_hgjj/jjxr/xuerenziliao/200504/21/t20050421_3670483.shtml).
- [4] 杨英杰,杨小科. 包容性增长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超越[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84.
- [5] Bela Balass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visited: An analysis of relative export shares of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1953 - 1971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 Social Studies, 1977(4):327.
- [6]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3.
- [7] Krugman Paul. The narrow moving band, 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 Thatcher: 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1987(1-2):41.
- [8] Grossman G M, Helpman E.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1):43.
- [9] Redding 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Human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M]. Oxford Economic Paper, 1999:15-39.
- [10] Krugman Paul. 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3):483.
- [11] 汪浩瀚. 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理论与经验模型验证[J]. 经济地理, 2005(4):449.
- [12] 许和连,栾永玉. 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三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9):10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84-0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筹资机制分析

——借鉴德国城镇化进程中筹资模式的思考

刘萍萍¹, 彭新万², 车美兰²

(1. 江西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2.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 重在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必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 现行的筹融资模式单一, 资金构成不合理, 债券市场规模较小, 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发展, 无法满足市场对大量资金的需求。德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采取的实行地区间补贴、土地出让采用“选择期”、间接筹资等方法, 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现代农业, 借助土地流转、产业引入、城镇规划等方式进行筹资, 以实现集约型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特色城市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筹资模式; 德国城镇化建设; 农村; 农业

[中图分类号] F299.22; F832.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5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同时也包括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1996—2014年,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快, 完成了加速发展阶段的前半段(城镇化率从30%提升到55%), 在将来的20~25年里, 我国的城镇化将步入加速发展阶段的后半段(城镇化率从55%提升到70%), 在这段时间里, 我国将面临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拐点。^[1] 为了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不能盲目地去扩大城镇数量和规模, 而应促进第一产业继续发展, 提高农村收入水平, 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在保障农业用地情况下, 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的资金, 传统的融资方式, 即依赖于政府筹集资金这种单一的融资模式, 已经满足不了新型城镇化对资金的需求, 而且某些地区的政府财政能力比较弱, 不具备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能力。^[2] 因此, 在目前情况下, 解决资金困难是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筹资模式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借鉴德国城镇化进程中筹资模式的经

验, 进而提出完善我国新型城镇化筹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新型城镇化与我国当前的筹资模式

1.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所谓新型城镇化, 就是对传统城镇化模式的优化。传统城镇化是只关注城市优先发展的模式, 而新型城镇化遵循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 是一种更为科学的系统性工程; 更重要的是, 新型城镇化提倡人的城镇化、土地利用集约化、城市生态宜居化和社会和谐发展。^[3] 新型城镇化不仅可推动工业发展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提高现代工业的增值能力, 降低工业发展中的能源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 而且可推动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 而农业现代化要以农业规模效益为支撑, 但现行的小规模、细碎的传统农业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因此需要不断推进城镇化发展, 不断转移农业人口, 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新型城镇化有多种内涵: 从经济角度来看, 新型城镇化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实现工业、农

[收稿日期] 2015-06-10

[作者简介] 刘萍萍(1977—), 女, 江西省安义县人, 江西财经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发展经济学。

业、信息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从社会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要求城乡公平和谐发展,从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重新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

新型城镇化要求完善的社会保障,实现人口实质上的城镇化。在我国前期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事生产效率高的工业行业,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要更加重视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切实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当前,我国虽有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但是没有取得户籍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不仅制约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且在城市内部产生了分化,导致新进城人员收入水平较低。因此,我们要逐步完善居民居住登记,完善教育、计生、租房、交通、医疗等社保制度,以实现农村进城人员与城市居民获得社会公共资源的待遇均等。在目前条件下,我们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口取得城市户籍的问题,而且要增强中小城市对外来人员的吸引能力,防止人口过度移向大城市,导致大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中小城市发展缺乏必要的劳动力等问题的产生。

新型城镇化要实行土地集约利用,其重中之重就是保护耕地,防止由于城市规模过快扩张导致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城市面积扩大而占用耕地和土地流失的现象。在我国前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过人口城镇化速度赶不上土地城镇化的现象,盲目拉大城市框架,乱占土地扩大城区,甚至出现占用农地情况,土地利用十分粗放。鉴于此,我国新型城镇化应从提高土地利用方面着手:一是要复垦农用地,激励土地流转,增加农业经济效益,为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二是要解决城乡土地开发不均匀的问题,加强小城镇建设,扩大其吸纳能力,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协调推进大小城镇共同发展,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在之前的城镇化过程中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投入,但在目前的城镇化中只靠政府财政来解决资金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加强中小城镇的建设,建立合理的融资机制,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2.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筹资模式

当前我国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要求更高,不仅要满足人们对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而且要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资金困难

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融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财政资金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尽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融资方式逐渐多样化,但是政府的财政资金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融资来源。分税制改革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融资方式逐渐多元化,现阶段城镇化建设主要的融资方式除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外,还有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债、土地租让等形式。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的方式,即政府成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划分土地筹资资产,帮助其形成一个资金状况达标的公司,这些公司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公共事业建设进行融资,政府信誉为其提供隐性担保。

地方债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时要考虑发行对象信用是否良好,是否有还本付息能力等。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利用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取得的收入。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财政具有非常大的作用,是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主要的资金来源。

二、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筹资存在的问题

1. 资金构成不合理,筹资模式单一

在金融服务融资方面,我国面临的问题很多,尤其是间接融资在城市建设融资领域所占的比重过高,直接融资几乎不到1%,且绝大部分是债券。1999—2007年,我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银行贷款在自筹资金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在城市建设融资中金融服务融资占一半,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信贷。^[4]在资本市场还需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城镇化中主要利用银行信贷的方式进行筹资是必然的,但同时也会使得银行体系与地方经济发展产生更复杂的关联和风险因素。市场化融资渠道不顺畅,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处于基层的县乡政府筹资来说是一个难题,有限的财力很难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2. 债券市场规模小

基础设施直接融资,是指以地方债或城投债的形式、参照联合国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举债额度而进行的融资。我国政府发行债券规模应控制在发债城市当年GDP的1%~2%,每年滚

动发行,余额控制在该城市当年GDP的20%以内。^[5]以北京市为例,2013年北京市的GDP是19 500.6亿元,按1%发行债券一年可发行195亿元,但2013年北京市实际只发行了93亿元的地方债,规模较小。另外,地方债券期限只有3年,不符合城市基础建设投资期限长的现实情况,并且地方政府债券在我国发展较晚,缺少相应法律制度的监督,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我国城投债发行速度虽非常快,2005—2008年,城投债共发行了739.5亿元,2009年发行了2 087亿元,2014年上半年城投债发行总额超过1万亿元,但仍无法满足城市建设的资金需求。

3. 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土地财政是目前我国城镇化融资不可忽略的重要形式,是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土地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只靠一次性批租收入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助长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土地批租巨大的利益空间也容易引发暴力冲突,滋生官员腐败。更为重要的是,土地财政不利于城镇化的长远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抬高地价获取资金必然会引起房价和各种租金的上涨,增加城镇居民生产和生活成本,违背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初衷;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在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时,人口城镇化为政府带来的负担变得更大。

4. 投融资平台有待健全

投融资平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路径,让地方政府在利用各种资源方面提高了效率,但投融资平台也反映出一些不足。融资规模的高速增长容易导致数额巨大的政府隐性债务,融资平台的贷款名义上是公司贷款,但是由于平台公司由政府财政注资或提供贷款担保,这些贷款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的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省、市、县,甚至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乡镇街道,都设立了专门的融资平台公司,但主要管理人员多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调任或兼任,缺乏市场预测、企业管理和风险防范等投融资方面的专业知识,容易产生决策失误。

三、德国城镇化建设中的融资模式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位居欧洲首位,二战后的60年间,其城镇化水平从69%提高到89%,年平均城镇化速度为0.3%。^[5]德国百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只有4座,一些核心城市具有

很强的吸引力,中小城市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在德国,人们对于医疗、教育等的需要,都可以在本市解决,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在德国农村,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状况非常好,农村与附近的城镇交通便利,可以方便地获得城市的资源,享受优良的生活环境。德国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得益于城镇化过程中的有效筹资。

一是地区间的补贴。在城镇化过程中,德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给予城镇化资金融资以巨大帮助。两德统一前,东德经济发展落后于西德,统一后东德人口大量流失,当地经济更加不景气。为了能够实现地区与地区间共同发展,德国政府决定为落后地区的建设进行筹资,以减小各地方间发展存在的差距。联邦政府推出“团结补贴”,收取税率为5%的“团结税”,每年给东部州提供120亿欧元的补贴,一直持续至2019年。这笔补贴一方面用于旧城改造和基础设施修建,以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和形象;另一方面,为入驻的企业提供土地、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在这种优惠政策的鼓励下,东部城市逐渐建成了独具特色和吸引力的城市。^[6]

各州财政平衡制度也是德国促进各个地区协调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制度,它给落后地区带来了融资。财政平衡制度规定,财政收入高的州要通过财政平衡对财政收入低的州进行补贴。比如,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在六七十年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州,要靠其他州补贴财政,实施该制度后,现在巴伐利亚在德国所有的州中最富有,每年补贴给其他州的财政也不少。

二是土地出让采用“选择期”的做法。在土地出让问题上,德国政府采用“选择期”的做法,在选择期间内,要求土地投资者提交方案,阐述如何利用土地,如果在长期内交不出土地规划方案,或者不对土地进行任何处理,政府可以根据法律收回土地。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保证土地的利用质量,而且可以促使投资者优化和完善土地建设方案。政府与投资者意见一致之后,土地才能真正转让。这对于政府和投资者来说可谓双赢。另外,针对因城市发展而引起的人们对住房价格上涨的担心,政府规定不同档次的房价限制,如汉堡市政府规定:中心城区与富人区的房价可达到平均房价的两倍以上。

三是保护原有城镇格局,间接筹资。德国充分保护原有小城镇格局,对具有历史风貌的老建筑基本会维持原来的外观,只是根据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其内部进行改造,并且这一系列的建筑只能用于经

营现在人们所需要的咖啡厅、酒吧等,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而且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参观,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

四、完善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筹资机制的对策

我国城镇化的筹资机制目前还处于初始的制度安排阶段,需要不断地进行拓展和深化。与德国相比,中国尽管在政治经济制度、基本国情、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德国的筹资经验中找到可以学习借鉴的方面:一是可以学习其政府间互相帮助的方法,实现各地区平衡发展;二是学习其怎样保护城市文化并将此构建为第三产业,进行筹资,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完善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筹资机制,应关注发展集约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关注大小城市协调发展,在工业与农业转型、规范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寻找路径。

1. 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进行筹资

前期的城镇化片面扩大城市规模,重点放在工业的发展上,放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上,而新型城镇化在推进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但不是之前小规模个体农业,而是升级的扩大规模的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不仅能支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也能为解决新型城镇化融资问题带来帮助。因此,发展现代化农业,调动政府的积极性,出台政府和农民都可获利的政策,可寻找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筹资路径,构建有效的筹资机制。

一是鼓励农民扩大农业规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化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农民依靠种地获取利益已很少,农业对他们来说可能正在成为一种副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鼓励谋求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民,利用多年来辛勤经营积累的资金和人脉资源,扩大经营规模,减少经营成本,增加单位边际效益,提高收入并实现土地的集约。政府可以对承包地多的农民给予更多的补贴,比如提高自然灾害补贴资金、建立更多的鼓励和奖励机制等,这样虽然会增加政府的农业支出,但是农业的发展必定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益,提高新型城镇化中的融资效率。

二是鼓励农事企业自建农业基地。农事企业包括农场类生产企业、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的企业及经营农产品流通的企业。近年来,有很多农事企业为

了降低原材料的成本更愿意自建生产原料基地,应鼓励这些企业扩大自建基地规模,增加生产量,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可以减少企业税收,对超额完成平均指标的企业或减少环境污染的企业进行奖励,而且可以把农村闲置的土地以低价租给这些相关企业,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租用。扩建农业基用,不但可以提高政府的税收,而且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能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出等问题。

三是鼓励非农企业投资农业。新型城镇化可以调动外来工商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积极性,这些工商企业来自很多领域,过去与农业没有直接联系。近年来,由于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加之一些工商企业在原有领域竞争激烈,经营困难,看到投资农业会取得种种利好,许多工商企业愿意投入农业。鉴于此,政府可举办大型农业招商活动,推动现代农业招商引资,为非农企业制定农业贷款担保、农业保险等系列扶持政策,从租用土地、立项审批、减免税费等方面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投资成立专门的指导和技术服务机构,为工商涉农项目提供人才技术服务,激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产业。鼓励非农企业投资农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融资渠道。

2. 利用土地流转进行筹资

土地流转是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途径。积极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形成,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又一筹资渠道。

一是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中介。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很多时候农民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一些中介组织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不符合土地流转市场的要求,而且一些乡镇和农村的中介组织缺少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无法专业地评估土地并提供公正的服务。因此,要健全、完善土地流转中介,调整中介服务人员;不能片面追求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而是要维护土地流转双方利益,特别是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使土地流转更加高效,筹资变得更加合理,以减少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二是让土地流入市场。让土地流入市场的本质就是区分土地的质量,划分土地的出租价格或调整租金的支付方式。土地分好坏,有些土地属于肥沃地,适于耕种;有些土地属于劣质地,不适于种地。种地者当然需要质量好的土地,所以出租租金可以相对调高;对于用地建厂者来说土地的质量并不重

要,可以出租劣质土地,租金可以适当调低。收取租金可以折价,对方可接受一次性优惠方式或者分期无优惠的方式。在土地流转中,应建立完善的价格机制,把价格信息的来源公开化,多考虑农户的价格要求而不是片面考虑政府提出的价格,并且要像德国区分房价等级那样,对于流通过程中的土地规定价格波动范围,避免出现价格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应在完善土地价格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土地筹资机制,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3. 通过产业引入进行筹资

一是降低准入门槛,吸引投资。降低行业的准入门槛,建设一些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建厂,可在推动农业建设的同时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提高农民就业率和当地经济收入,防止农民过度流向大城市。政府应降低民营企业贷款的利息率,减少民营企业税收,为国外资本的投入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和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农村建设,实现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给新型城镇化中的筹资带来帮助。

二是调动民间资本投入。应广泛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事业,如公益性小学、公益性医疗机构等;并给投入资本者以优惠政策,如给他们提供每年指定额度的购书卡,或者提供每年一次的体检等优惠方式。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人们享受高质量的服务,并可减少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入。另外,应严格依法管制资本流通,避免腐败现象,以建立有效的资本投入体系,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筹资。

4. 通过城镇规划与建设进行筹资

一是区分公共用地和建筑用地。在城镇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区分公共用地和建筑用地会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公共用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并且收益较小,政府可以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给企业创造利

润并减少自己的投资。建筑用地用于建设居民楼、商业楼等,对于由城市发展而引起的人们对住房价格上涨的担心,可借鉴德国的城镇化建设经验,规定不同档次的房价限制,以提高购房率,增加财政收入。

二是建设特色城区,吸引消费。借鉴德国的经验,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古老建筑应基本上保持原来的模样,只根据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其内部进行改造,这样会大大减少重建的资金投入;同时吸引创业资本或民间资本投入经营店铺,增加政府收入。此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当地独有的标志性建筑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参观旅游,扩大消费,增加收入。

5. 通过政府间的协助进行筹资

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各种融资也是以政府为核心引导社会资金的参与。在目前提倡各地区共同公平发展的情况下,政府之间可以通过相互拨款的方式,给欠发达地区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助推其城镇化发展。在发达地区制定一定税率的“团结税”,所降的税收可提供给落后地区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直到该落后地区达到相应发展水平为止。

[参 考 文 献]

- [1] 孙中平. 中国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J]. 世纪桥, 2013(5): 59.
- [2] 邱俊杰, 邱兆祥.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困境及其突破[J]. 理论探索, 2013(4): 83.
- [3] 曾真.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 [4] 张占斌.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方略[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229-230.
- [5] 邱鹏飞, 雍国玮, 蒋道德, 等. 德国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及其特点——以柏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例[J]. 西南农业学报, 2003(4): 78.
- [6] 万博, 张兴国. 和谐之城: 德国小城镇建设经验与启示[J]. 国际视野, 2012(2): 9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89-07

美国创新型大企业分权化管理的高层规制

——以195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为例

杨朝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创新型大企业,为将小公司的灵活性和专注度与大公司的资源优势有效结合,对企业实行了分部制、分权化管理改革。通过实行目标管理,达到中央战略高层对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及其管理者进行控制与协调;通过分权、明确职责和责任链等制度,实现决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在培养和激励管理者与员工的工作热情、积极主动精神、创造性和锐意进取的自我发展与奉献精神的同时,保证公司战略高层对全局管理权力的把握,实现对分权化改革后各级管理者职责和权力的中央控制与协调;通过对晋升与自我发展制度和职业化管理教育与培训制度的控制,实现战略高层的中央控制与协调。通用电气的分权化改革实践对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借鉴其经验,有利于当今创新型大企业组织机构改革取得良好绩效。

[关键词]通用电气公司;分部制;分权化;高层规制

[中图分类号] F270.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6

分部制和分权化管理,是美国大企业科技创新、多元化发展及公司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企业组织管理制度提出的变革要求,以实现企业在新历史时期创新发展的必要制度创新,是美国创新型大企业将小公司的灵活性和专注度与大公司的各类资源优势有效结合的必要途径和手段。在美国的特大企业中,通用电气公司极具代表性,对其分权化管理的主要规制方式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充分展现分权与高层规制在创新型大企业有效结合的具体策略、执行过程和运作方式。

1950年代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改变权力完全集中于总部从而制约公司发展的状况,总裁拉尔夫·科迪纳决定改良组织结构,实行分部制、分权化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大公司的规模和资源优势及创新型小企业的灵活性与专业集中度,更有效地增强科技实力,发掘科技创新潜力,继续开拓公司长期多元化创新发展战略,在达到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保证公司具体业务运营决策的有效性。分部制并不是把通用电气公司拆分成百

余家自主运营的小企业,管理决策的分权也不是放弃权力和责任,分部制和分权化改革只是保证通用电气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是保证和增强公司竞争实力的手段。改革的关键部分是构建并有效实施战略高层对全公司各运营分部、事业部和众多分部、事业部的控制与协调机制,并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央控制与协调机制不断加以改进与完善。这些控制和协调机制主要包括目标管理、双向的权力责任链、总部高层保留的关键职责与权力、职能服务机构对公司整体凝聚力的加强,以及职业化管理制度中管理者与专业人员的晋升和自我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本文拟通过对通用电气公司1950年代分权化改革历程的梳理,探寻其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以期对当今创新型大企业组织机构改革提供借鉴。

一、通用电气公司的目标管理改革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指出,任何企业组织都必须建立起真正的团

[收稿日期] 2015-05-21

[作者简介] 杨朝辉(1980—),男,河北省廊坊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政策史、世界经济史。

队,并且要把每个人的努力融合为共同的力量。企业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不同的贡献,但所有的贡献都必须为了同一目标,他们的努力必须凝聚到共同的方向,他们的奉献精神也必须紧密地合为一体。企业良好发展绩效的取得,要求每一项工作必须以达到企业整体目标为宗旨,尤其是每一位管理者都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追求企业整体利益上。企业期望每位管理者达到的绩效目标,必须源自企业的整体绩效目标,同时,也通过各级各部门管理者对整个企业成功运营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来衡量他们的工作成果。管理者必须了解,根据企业目标他必须达到什么绩效,而他的上司也必须知道应该要求和期望他有什么贡献,并据此评判他的绩效。此乃德鲁克“目标管理”的灵魂。然而,要实现目标管理的要求,就必须投注大量心力,并需要特殊的管理工具,因为,企业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者并不会自动自发地追求共同的目标。^{[1](P98)}

德鲁克不仅是总裁科迪纳在通用电气公司进行组织结构改革、建立职业化管理制度时期的主要管理咨询专家,也是科迪纳对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进行调查、设计与创新的得力助手,并与通用电气负责管理咨询服务的副总裁哈罗德·斯密迪长期保持合作关系,是当时通用电气的内部管理专家,且在1980年代长期担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的管理咨询顾问。1950年代,在当时众多顶级管理专家协助下,通用电气根据自己的业务运营、企业管理发展状况及以往的改革经验,研究编著了公司内部管理教材——《通用电气公司职业化管理全书》,这套管理教科书与其后德鲁克著述的《管理的实践》在管理思想(目标管理)方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纳德·格林伍德在一篇论述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文章中,暗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有很大可能性是从协助通用电气组织结构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获取了实际素材,并运用他和斯密迪等通用电气内部管理专家和部分实践管理者所同时具有的管理思想(虽然公司内部管理咨询专家和管理者没有明确运用“目标管理”这一概念),来继续指导其改革和职业化管理制度构建的进程^[2]。

1. 通用电气公司目标管理的长期发展目标

正如德鲁克所说的,公司各级各部门管理者并不会自动自发地共同追求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因此,必须要倾注心力开发和利用有效的管理工具,制定和实施创新性的企业规章制度,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1951年,通用电气明确制定了公司未来10年或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依据整体目标

制定公司政策,依据公司政策制定规划,并制定和发布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的《部门章程》,及分部与事业部总经理的《职位指南》,以引导和规制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以公司整体目标为导向,以此来制定各自的具体目标和政策,明确了解运营部门各级管理者自身的职责、权力和必须肩负的绩效责任。而这些运营分部和事业部的目标和政策,首先要由各事业部和分部管理机构各自确定,之后由上一级管理层经商讨后批准或重新筹划制定。例如,事业部总经理和事业部各职能经理共同商议在公司整体目标内自己事业部具体的目标和政策,之后呈递给所属分部,经事业部经理和分部总经理商讨后,由分部总经理批准实施。而分部总经理制定各分部的目标和政策时,须与分部各事业部管理者和专家商议,而后要呈递给所属集团副总裁,经所属集团副总裁和分部总经理商讨后,由集团副总裁批准或重新进行规划。至于各集团的目标和政策,由于各集团副总裁都是公司总裁办公室和执行办公室的成员,公司整体目标和政策的制定,要由各集团副总裁和职能部门副总裁协助公司总裁科迪纳确定,而后由各集团副总裁传达给各集团下属分部和事业部,因此,各集团的具体目标和政策必然会与公司的整体目标和政策保持一致。

1950年代初,通用电气制定的长期发展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通用电气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的多元化电力设备业务要富有增长潜力,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业务主要面向工商业、农业、社会公共事业、美国大众和家庭及政府部门等市场领域。(2)在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各科技领域,通用电气都要保持科技研发的领先地位。公司还要把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项职业化的工作来进行研究,努力开发出管理工作的新知识、新技能和新方法。公司要在相关科技领域不断进行研究探索,确保新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不断产生,为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服务方式,新组织方法、组织模式和组织关系的创造性涌现奠定基础,借此实现公司的使命性口号——“发展与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3)通用电气每个事业部都要努力获取顾客信任,获取顾客对公司产品与服务的忠诚度,保证各自的经济效益。(4)通用电气公司所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全部产品都要具有业内最高品质,拥有令顾客满意的使用价值,并制定与所拥有的品质与价值相适宜的市场价格。(5)通用电气公司要精心策划营销战略,努力建设公众对通用电气及其产品品牌的信心与好感,打造拥有高价值含量的公司品牌,赢取顾客信任与忠诚。(6)通用电气要为社会大众不断

创造和提供富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提供合理的薪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奖励与晋升机会,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保证就业稳定,获取员工对公司的忠诚,激发其创造性,充分发挥员工的才能和工作热情,激励他们的责任感,培育他们对公司重大决策和发展战略的参与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基于这些工作,通用电气将每位员工的贡献凝聚为服务于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的集体贡献,同时使员工根据这些贡献和所创造的价值,获取相应的物质回报,并实现其自我人生价值。(7)通用电气公司要长期注重对有能力、有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培养,充分释放与发掘公司各级管理者的奉献精神 and 创造力,充分发挥公司各类专业人员及其他所有员工的个人奋斗与团队合作精神。(8)通用电气公司要通过长期稳定而良好的业绩表现,通过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率,来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和支持,从而保证并持续拓宽支持企业长期创新发展的资金来源。(9)通用电气公司要与供应商、经销商、合同外包公司,以及其他所有参与公司运营活动的工商企业保持紧密而友好的合作关系。这样,通用电气公司就可以富有建设性地把各方力量整合在一起,共同富有成效地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不断增强公司自身和合作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多方经济利益和贡献能力的提升。(10)鉴于公司所拥有的规模,几十年的成功发展经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储备,高效的资源积累与人才培养机制,以及作为一家高技术大型企业所获取的国家与公众信任等等,通用电气将积极进取而充满愿景和想象力地让公司的目标、政策和业务发展等努力适应国家社会需求,积极履行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国防安全的各项“企业公民”职责。

根据这些实际性和使命性的长期运营与发展目标,通用电气战略高层制定了相应的执行政策,由集团执行副总裁传达给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这些政策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性政策,另一种是指令性政策。一般性政策主要起路径规制和方向指导的作用,在一般性政策的范围内,只要各分部和事业部能够在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各自的运营绩效,各分部和事业部就可以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战术,根据自身的业务特征和运营状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路径达成目标。而指令性政策则是战略高层颁布的各分部和事业部必须严格遵行的具体政策,对其内容的理解和执行不能有任何偏差,这类指令性政策诸如战略高层规定的政府所需的税务报表的规范、内容和格式等,各分部和事业部必须

严格遵守。再有,有些具体的人员招募政策规定,对于某些人员(如政府认定的某些持政见异议者)全公司的各分部和事业部一律不得招录。

2. 通用电气公司目标管理的自我控制

目标管理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管理者的自我控制^{[1](P106-110)},即各分部门管理人员要按照公司高层制定的绩效评估标准,检测自己是否在公司政策范围及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下完成了各自的目标,检测自己目前是否处在完成目标的正确路径上,如果偏离了目标,就要依此对自己的管理工作和部门的活动进行调整,从而规制各分部门统一完成公司目标的向心力。这种自我控制的评估标准是由公司高层经过深度调查研究、精心周密设计的。1950年代改革初期,通用电气为各分部高管的自我控制制定了8项评估标准,包括投资回报率、市场份额、生产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领先性、员工发展、员工士气、公共责任,以及长期和短期目标的平衡。^{[3](P7-8)}直到1960年代中期,这8项评估标准一直是公司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常用并为各分部和事业部易于接受的两项标准是投资回报率和市场份额。8项评估标准是分部和事业部经理检测和控制自己及所管辖业务部门工作绩效与努力方向的基本尺度,管理者应据此来调整自己和部门的工作。因此,这些标准不是上级监督下级的工具,而是分部和事业部管理者进行自我控制,使自己的努力方向和贡献与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主要方法。分部和事业部管理人员在据此检测自己和部门努力方向与运营绩效的同时,要将评估结果的副本报告上级单位,作为上级单位掌握各分部和事业部运营情况的信息来源,并作为工作输出标准化管理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结合分部和事业部管理者的自我控制制度,实现通用电气中央战略高层对各分部和事业部运营绩效和发展方向的控制与协调。^{[4](P5-11)}

目标和政策制定,是通用电气实现目标管理、达到中央战略高层对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及其管理者进行控制与协调的重要工具。这些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会适时调整或制定全新的目标。但是,保持科技领先地位,研发和提供符合顾客需求的高品质产品与服务,努力服务于社会和公众,以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做出贡献等,这些使命性的目标是公司长久坚持与追求的。通用电气时常会用“为国家制造更多的能源”“用电力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发展与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等带有使命感的宣

传口号来强化公司目标。自我控制不仅是公司目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建立职业化管理制度、制定自我发展人力资源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4](P285-296)}自我控制使公司管理者、专业人员及其他员工,能以一种领导者的姿态,根据公司的整体目标和部门目标,来制定和实现自己的事业发展目标,使个人的努力与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在自身事业成功的同时,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随着通用电气的不断发展,管理人员和各领域专业人员数目在全体员工内所占比例的增加,这种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对工作和努力方向的自我控制”,以及在公司高层鼓励和协助培养下的自我发展制度,无疑成为战略高层对各分部和事业部管理者与专业人员实现中央控制与协调的有效方法和制度创新。

二、通用电气公司组织结构中的权力、职责与责任链

总裁科迪纳在通用电气建立起了分部制和分权化管理的组织结构,相应设立了大量运营分部和事业部总经理、事业部职能部门经理等管理职位,由公司战略高层向这些管理者层层授予运营决策权。这是在公司业务多元化和公司规模发展到一定时期,原有中央集权式职能制组织结构对于高层有效把握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已经难以胜任的情况下所采取的 necessary 改革措施。

亨利·明茨伯格指出,在职能制组织结构中,信息需要经过多重层级才能传达给公司高层决策者,在经过每个层级时,都会有一部分信息折损,而且不仅是“自然损耗”,因为信息的传递是纵向的,在不同层级的管理者之间流动,这就意味着可能出现对信息的故意歪曲,在传递过程中,好信息被夸大,不好的信息被阻隔。这种信息传递程序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它偏重于对定量信息的汇总,而多数情况下,公司高层制定战略决策时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信息,而是具体的信息。而且,职能制组织结构要求各种问题层层上报,经高层批准或给予指示后再逐层向下传递,高层在决策时经常面临困境,因为在最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真实细节的时候,偏偏因为要解决下级呈报的诸多问题而负担过重,于是,高层只好凭借不完整的抽象信息来做些片面肤浅的工作。因此,随着公司业务多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公司规模急速扩张,要么由战略决策的制定者亲自执行决策,以便在执行过程中随时进行调整;要么由执行者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并根据环境变化进行适应性修改,故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将决策的制定权

分解下放。^{[4](P213-216)}

为了实现有效的决策权下放,使拥有充足信息、负责实地运营的管理者真正拥有决策的权力,通用电气结合组织结构、职位安排和具体业务运营状况等因素,制定了公司管理制度的分权原则和有关授权双方的关系原则,这些原则既进一步说明了公司管理决策分权的原因及权力下放的具体原则和措施,也表现出公司战略高层通过权力、职责和责任链,对授权过程和运营分部与事业部管理者、事业部职能部门经理等被授权管理者的有效控制与协调。

通用电气规定,公司要将决策权置于尽可能接近可以采取实际行动的地方,运用最直接的方式获取最大量、最详实的有用信息,对所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要有及时而透彻的了解,从而做出最有效的分权性决策,以取得最佳的决策效果;只有在权力真正得到授权时,分权化改革的优势才能实现,如果各种细节性问题都要上报,下级所做各种决策都要经上级详细检查核实后批准,就不能做到成功的决策分权;上级要相信下级被授权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能力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决策,公司战略高层、运营部门和职能部门最高管理者都要对下级管理者有这种信任和信心;大量单独有效决策的综合比中央集中控制和规划下制定的决策会更具有效性;运营部门的经理人员要明了公司极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职能部门专家所提供建议与咨询服务的重要作用,寻求他们的帮助和建议,做出针对自己所负责业务运营更加有成效的决策;需要明确制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的长期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各种关系机制的书面介绍,并向公司上下及时准确地传达公布这些信息,确保公司全体成员真正了解公司共同目标、组织结构具体情况和组织结构内各种关系机制等规则和信息,并依据共同目标和政策来评估自己的工作绩效;除去那些涉及全部门和全公司范围必须保留的权力外,公司高层和各级管理者必须确定所授权力真正下放,不能既授权又保留权力,随意干涉下属的工作;公司各层级被授权者必须同时承担起与所授决策权相应的职责与完成绩效的责任;要根据8项测评标准对被授权者的绩效进行评估,被授权者更需要通过这些标准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评估,对能力不足,绩效不佳的被授权者要及时撤换。^{[4](P40)}

但这种向下级的决策授权并不代表放弃权力,通用电气的事业部总经理虽向下属职能机构经理授权,但他仍然是事业部运营绩效的唯一负责人,事业部职能部门的失败,如果不是客观业务原因,事业部经理将负有全部责任。分部总经理虽向下属事业部

经理授权,但分部总经理仍是整个分部绩效的唯一责任人,某事业部的失败,如果没有客观原因,该分部总经理将负有全部责任。同理,集团执行副总裁也要在相同的授权模式下对各业务集团的绩效负有全部责任,这样就加强了公司战略高层对运营分部和事业部管理者的层层控制。这个授权过程涉及三个重要的概念,即权力、职责和责任,上级管理者向下级管理者授予管辖某部门业务的职责时,除去上级管理者需要保留的一些财务等方面的整体性权力外,同时要授予下级管理者行使职责的全部权力。下级管理者在接受这些权力和职责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完成该部门业务绩效的责任。因此,下级管理者在接受上级由上至下授予的权力和职责的同时,也承担起完成部门业务绩效的由下至上对上级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双向的权力、职责与责任链,是通用电气战略高层对分部和事业部管理者施加控制的重要工具。

除实现对各层级被授权管理人员的中央控制外,公司还通过这一权力、职责和责任的双向流动制度,控制和协调每一位员工的具体工作。管理者将一部分工作职责和权力分配给向其汇报工作的员工,但该经理人员并没有摆脱掉这部分责任,他必须确定和保证这部分工作可以顺利完成。如果被授权者工作绩效不佳,职责履行失败,该经理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他的授权行为并没有使他摆脱成功完成全部工作的责任和义务。以这种方式,工作和工作所附带的权力、职责及责任目标,被一步步细分至拥有专业技能和创造力的公司个人贡献者可以胜任和完成的部分。每位个人贡献者在接受工作的同时,也就接受了相应的完成该项工作或任务所需要的权力与职责,同时,他也担负起由下而上完成该项工作或任务的责任与义务。以此上溯,个人贡献者之上的经理人员,也层层向上负有这种责任和义务。职责和权力虽然下放了,但授权的经理人员仍然担负着其所授权力的下属完成该项任务的责任,如果任务失败,他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之前强调的授权并不是放弃权力,而是为了实现公司战略高层对整个分权体系的监督与控制。

公司在权力授受双方的关系原则中还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个老板”,也就是说,他只能向一位上级汇报工作,对这位上级管理者负有绩效责任;经理人员向具体职位的在职者分配了工作职责,他就从自己职位所拥有的权力中分配授予了下属员工完成其工作职责所需的全部权力,并有权力拥有下属接受所授权力以完成所分配工作职责的义务;授予某人的权力、职责和责任范围由授权经理人员负责,所授权力范围和该经理人员的职责范围要有共

同的目标;要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所授权责范围的幅度要尽可能宽阔,以利于被授权者发挥其才能,培养其管理和领导能力;对于涉及到公司共同利益和全局性利益均衡问题,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的指令性规则,要事先明确说明,避免发生误解,从而有利于员工的团结合作,以实现整体一致的共同目标;要使个人工作和团队工作顺利完成,授权要能取得有效成果,在共同目标和全局利益范围内,授权的过程、所授职责、权力和相应的责任义务必须清晰明确完整,要让相关人员清晰无误地了解。

此外,权力和职责必须明确属于个人,不能由一群人或委员会共同拥有同一职责和权力,否则就会造成混乱。组织结构中各个职位所具有的权力、职责和责任在通用电气《职位指南》中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和阐明,其目的是让各相关者都能够清楚了解。所授和所规定职责范围必须清晰、明确、完整,不能出现混乱、裂痕或职责重叠。要确保工作完成,每个工作职责范围都需要由一名经理人员分配给单一个人贡献者。被授权者要了解并接受自己对达成工作绩效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具体职位的接受者,同时也自动接受了对其上级经理所负的责任义务,也就是达成所授职责的工作绩效的责任,直到他离开该职位为止。当在职者自愿接受了这些职责和责任时,他也就自动拥有了该职位履行职责所需的权力,这种权力是组织结构内设立的职位所固有的,在职者在在职期间将一直拥有这些权力,直到他离开该职位。以上所指的职责既包括个人的具体工作职责,也包括团队工作职责。这种团队工作与委员会制度不同,在团队中,每个成员都拥有自己明确的职责,也明确了解自己 and 团队成员、自己与整个团队之间的关系,在承担自身工作职责的同时,也要承担团队工作职责,以促进员工的精诚团结,成功履行和达成被赋予的个人职责和团队或部门职责与绩效。同时,员工和上级经理人员要对团队目标以及公司整体目标有一致的理解。

通用电气通过以上各种分权原则,既可以实现决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培养和激励管理者与员工的工作热情、积极主动精神、创造性和锐意进取的自我发展与奉献精神,同时也保证了公司战略高层对全局管理权力的把握,实现对分权化改革后各级管理者职责和权力的中央控制与协调。

三、通过职业化管理制度实现战略高层中央控制与协调

1. 通过晋升与自我发展制度的控制

员工晋升和奖励制度是通用电气员工激励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体系是公司战略高层对各运营部门和职能部门的管理者、专业人员和其他员工实行控制与协调的另一项制度工具。对员工的奖励,不论管理者还是专业贡献者,都要以公司制定的8项测评标准为依据。这里的专业贡献者指的是除管理人员外,财务、科研、工程或各职能培训教师等服务于公司的各类专业人员。除去物质方面的奖励以外,更重要的是职位晋升与员工的事业发展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专业贡献者,只要有自我发展意愿、拥有敬业精神和实践作为的员工,都可以以测评标准为基础,从基层单位升任至上一层级,直至公司最高管理层或最高层级专业人员团体。这个晋升和事业发展体系由两条梯形线路组成:一条是管理者线路,一条是专业贡献者线路,这两条梯形线路,不同层级间由“横杠”路径连接。也就是说,管理者和专业贡献者的发展路径彼此间有相通渠道。如果一位管理人员发现自己更适合在某个职能专业领域发展,更适合成为一名专业贡献者,在上一级管理者或公司高层的择选和同意下,他可以转至专业贡献者的发展路径。相应地,一个专业贡献者如果发现自己有志于而且有能力成为一名管理者,他也可以在上一级或公司高层的择选和同意下,转入管理人员的发展路径。但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两条梯形线间的“横杠”连接渠道随着层级的升高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每位公司员工最好尽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发展路径,以积累更多的相关知识和经验。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同一层级的管理者和专业贡献者在物质待遇上不会有太大差距,管理者的物质待遇并不会太高于专业贡献者,甚至有些情况下专业贡献者的待遇会高于自己同级乃至上一级管理者的待遇。例如,当一个事业部在某一发展时期对财务、销售或工程专业人员的贡献有特别需求时,这位专业贡献者的待遇就有可能高于他所属事业部职能部门管理者的待遇,甚至会高于该事业部总经理的待遇。

不同层级的每一位管理者和专业贡献者都要按照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根据8项测评标准,评估自己的绩效,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同时,公司会设计各种激励和培训制度来辅助员工的自我发展。例如,开设不同级别的管理培训课程,帮助管理者提升自己的专业管理知识和技能,尽量拓宽不同层级管理者的职责范围,给其更多的发展和历练空间,使其提高管理能力,在更好地履行自己当前职责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升迁与发展机会。公司的各主要职能服务部门也开设有多种培训教育课程,

培训各层级的专业贡献者,以增强其专业知识和技能。

公司战略高层也可以通过权力、职责和责任链,对公司各级管理者施加控制,通过以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为基础制定的8项测评标准,来掌握公司各层级管理者的运营绩效和所负责部门的发展情况,同时为公司当前运营和未来发展培养更多有能力的管理者。

公司的各级专业贡献者也可以参加各类管理培训课程,更加了解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了解自己所在层级分部或事业部的发展和绩效状况,这样可以增强专业贡献者以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为己任、进行自我发展的向心力。

管理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司范围内的职能服务部门所开设的各类职能专业培训课程,在学习和提高职能专业知识的同时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不同信息和各自运营部门的运营与发展状况。职能培训课程也是根据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而设立,从而可以增加公司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管理者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通用电气战略高层正是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有“横杠”联接的梯形晋升和发展路径,以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为基础,以8项测评标准为依据,并通过各种辅助公司员工自我发展的制度设计,使员工将自我发展和公司的整体利益与长期发展目标相统一,从而使战略高层通过这种员工晋升与自我发展的激励体系,对公司全局的管理人员和专业贡献者实行有效的中央控制与协调。

2. 通过职业化管理教育与培训制度的控制

通用电气的分部制和分权化改革,产生了2000多个新增管理职位和职能服务专业岗位,公司不可能立即从开设高级管理专业的院校中招聘到有实际经验和技能的大量管理人才,也不可能从其他公司获取这些管理人才,因此,其高层制定和实施各种措施来培养大量满足现实需要的管理人才,并培养公司因分部制和分权化改革,以及持续多元化战略发展,未来更多管理和职能所需要的专业人才。这些战略举措的实施,不仅培训和储备了大批人才,也是公司高层控制和引导这个庞大管理和专业人员大军的有效方法与途径。

通用电气首先聘请任职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专家和外部管理咨询专家,根据公司发展历程和现实运营状况,参与或协助公司的组织管理改革进程,并组织包括德鲁克在内的管理专家,为公司培养管理人员编著内部管理教材,制定管理规则。通过这些教材向公司各级管理者传播和培植分权管理思想,向

分部和事业部经理人员传播和讲授如何像一家小型企业管理者那样肩负起各种绩效职责,有效运用各种权力,并及时做出最佳的决策。同时,公司还通过这些文书教材的形式,向各级管理人员解释和介绍公司的目标与政策,以强化各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全局目标的把握。

1956年,总裁拉尔夫·科迪纳令公司在纽约市北郊建立起通用电气自己的“企业管理大学”——克劳顿维尔管理培训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公司管理咨询服务部门,由通用电气副总裁斯密迪负责。克劳顿维尔管理培训中心不折不扣地是一所顶级“管理学院”,在这里,公司聘请了全美知名的管理专家任职,并定期邀请顶级管理学院的专家学者来中心讲学指导。公司在克劳顿维尔管理培训中心开办高级管理课程,多为密集封闭式的强化训练,有些课程要求学员在13周的时间内与外界切断一切联系,包括各自的公司内管理事务。该中心同时设计较长期的管理培训课程,为公司培养未来管理者做准备。这里既是总裁科迪纳宣传公司改革思想和职业化管理哲学的宣讲台,更是向公司各级参与培训的管理者宣传公司目标和政策,介绍公司发展状况、国家经济发展环境、公司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管理者之间交流意见,提出各种相关问题解决方案的大舞台。到1980年代,这里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企业领袖——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吹奏“无边界”和“群策群力”等全新管理理念号角的地方,成为整个公司管理层交流思想、加深了解、互通信息、协调合作的场所。该中心对通用电气和美国企业管理方法发展的影响,不亚于公司研究实验室对公司和美国工业科技进步的影响。

公司同时在各分部和事业部、各职能部门举行大量的教育培训课程,有时,这些课程成为分部总经理和事业部经理的部门大会,由此向员工传递公司战略高层制定的发展目标和理念。经常参加公司高等管理培训课程的分部一级管理人员,还会通过分部和事业部举行的管理培训课程,向各分部和事业部员工传播管理思想和管理学新知识、新技能。各职能服务部门既帮助运营部门举办各类培训,也在全公司范围内举行各种培训课程,从而加强了整个公司由上而下、全局范围的融合和内聚力。

这些传播管理思想的教材、管理专家的授课和演讲,以及各职能部门开设的培训项目等,同样是战略高层对公司整体施加影响和控制的重要方式。明茨伯格强调,培训和思想灌输对战略高层掌控公司全局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成员需要了解社会、组织

和团体的价值体系与规范,了解合乎要求的行为模式。组织利用思想灌输对其成员潜移默化,借以实现组织利益。在员工开始工作之前,组织要进行大量的内部思想灌输,确保其充分融入组织,做出符合组织需要的行为。各类培训活动也包含相当多的思想灌输成分,进行这样的思想灌输之后,还要辅之以旨在提高员工忠诚度的活动项目,比如大家一起参加社区工作活动,听取领导的励志演讲等,培养他们对整个组织的忠诚度。不管是组织的哪一部分,如果从事的工作复杂而困难,培训就非常重要;如果工作很敏感,或工作地点很遥远,同时又必须对组织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忠诚感,思想灌输就显得极为关键。在管理层级中,思想灌输就更为重要,因为各级管理者是公司意识形态的捍卫者。^{[4](P45-50)}

四、结语

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创新型大企业,为将小公司的灵活性和专注度与大公司的资源优势有效结合,对企业实行了分部制、分权化管理改革。通过实行目标管理,达到中央战略高层对各运营分部和事业部及其管理者进行控制与协调;通过分权、明确职责和责任链等制度,实现决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在培养和激励管理者与员工的工作热情、积极主动精神、创造性和锐意进取的自我发展与奉献精神的同时,保证公司战略高层对全局管理权力的把握,实现对分权化改革后各级管理者职责和权力的中央控制与协调;通过对晋升与自我发展制度和职业化管理教育与培训制度的控制,实现战略高层的中央控制与协调。通用电气的分权化改革实践对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借鉴其经验,有利于当今创新型大企业组织机构改革取得良好绩效。

[参 考 文 献]

- [1] [美]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齐若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 [2] Ronald G.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s developed by Peter Drucker, assisted by Harold Smidd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1(2):225.
- [3] Th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in General Electric, Book two: General Electric's Organization[R]. Schenectady: Th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1955.
- [4] [加拿大]亨利·明茨伯格.卓有成效的组织[M].魏青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96-03

EVA 绩效评价指标的缺陷及在我国企业应用的对策建议

周春巧

(郑州轻工业学院 财务处,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经济增加值(EVA)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有效地克服了传统绩效评价体系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有利于经营者与所有者目标达成一致,因而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但EVA指标忽略了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计算方法复杂,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加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弱有效性,在我国企业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应结合我国企业自身的情况,将EVA与其他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结合使用,根据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侧重点来编制EVA体系指标,同时应加强资本市场建设,以克服EVA绩效评价体系的局限性。

[关键词] 绩效评价;经济增加值;资本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7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日臻完善,但随之而来的“委托代理”也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企业需要建立有效的业绩评价体系,以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达成一致。寻找一套能真实反映上市公司实际经营绩效、准确衡量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情况的绩效评价体系,已成为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1989年,美国思腾斯特公司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了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以下简称EVA)的概念。由于其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的资本成本和管理层的短视行为等问题,比传统的绩效评价体系更能准确地衡量公司创造的财富,因而引起了全球经济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许多著名的国际公司,如可口可乐、美国邮政总署、麦肯锡、毕马威等都先后采用了EVA指标,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经过12年的发展,EVA指标于2001年被引入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被一些上市公司运用于企业绩效评价。根据EVA创始公司美国

思腾斯特的描述,EVA值是由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得到的结果^[1]。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尚不成熟,实施EVA指标不能简单地照搬,必须在研究、分析、修正的基础上运用,在应用过程中,参数的计算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的修正。鉴于此,本文拟在对EVA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究其在我国应用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对策建议。

一、EVA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1989年美国思腾斯特公司提出EVA概念以来,EVA在国外的已有20多年,对其的理论研究也比较深入。国外对EVA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探讨EVA体系对企业绩效评价的有效性。例如,Stewart^[2]指出,EVA作为建立财务管理和激励补偿一体化分析框架的重要指标,是一种已得到国际公认的有用的企业绩效评价工具;Stem等将EVA理论加以完善,并把EVA表述成一个包括评价体系、激励体系、管理体系和理念

[收稿日期] 2015-06-2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U1404707)

[作者简介] 周春巧(1977—),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体系的综合体系^[3]; Glassman^[4]则认为, EVA 衡量标准既需要通过一些复杂的设计, 以使其能更精确地反映企业绩效, 又能以简单的形式与没有财务背景的营运管理人员进行沟通。二是探讨 EVA 评价体系对公司价值的解释能力和对股价的影响。例如, Makita 认为, EVA 与股价报酬的相关程度要高于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等传统绩效指标^[5]; O' Byrne^[6]则发现 EVA 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解释力要强于税后营业净利润; Lean 等则通过对 EVA 和其他业绩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认为 EVA 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一致的, 从而证实 EVA 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业绩评价指标, 更是一种良好的公司战略管理模式和激励机制^[7]。

EVA 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 加之中国资本市场运作时间短, 尚有许多不规范之处, 所以国内学者对 EVA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目前仅对 EVA 是否优于传统企业绩效评价体系、EVA 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等基本理论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乔华等^[8]考察了 EVA 和其他传统评价指标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 发现 EVA 的解释能力明显高于其他指标, EVA 具有较强的价值相关性; 宋健等^[9]基于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情况的分析, 对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 EVA 值进行了计算; 王宗军等^[10]选用了沪市仅发行 A 股的上市公司 2002 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运用 EVA 评价上市公司绩效要优于目前以利润为中心的传统评价方法; 王平等^[11]采用经济增加值对传统绩效评价模式进行了改进, 建立了整合 EVA 的绩效评价模型, 并采用实证分析说明了绩效评价模式在整合 EVA 之后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 用它来评价和预测公司绩效将更有效; 孔军华^[12]选取了思腾斯特公司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 EVA 值排名前 100 名公司的 3 年数据, 以企业价值为因变量, 对 EVA 和传统会计利润指标与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 EVA 指标比传统会计指标在解释公司价值方面更具解释力; 郭加林^[13]则对 EVA 指标提出质疑, 并得出在中国 EVA 对企业绩效评价效果并不如理论上理想的结论。

综上所述, 可以发现, 目前, 国外对 EVA 的研究已经基本趋于成熟, 众多学者认为 EVA 能够有效衡量企业业绩。国外学者关于 EVA 指标模型的建立和各种相关分析, 为我们研究 EVA 在中国企业绩效评价的应用奠定了一定基础。国内学者对 EVA 进行专题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 现有关于

EVA 值和 EVA 体系的论文和书籍, 还停留在对外文书籍的原版翻译或简单加以说明的阶段, 相关实证分析也仅仅是建立在思腾斯特中国公司对上市公司 EVA 值的主观评价结果之上, 独立计算 EVA 值的成果还很少。

二、EVA 绩效评价指标存在的缺陷

EVA 指标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实施 EVA 对于企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不过, EVA 虽然可以弥补传统财务指标的不足, 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

1. 自身的局限性

一般而言, 与企业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有关方面有: 企业主或股东、企业的贷款提供者、商品或劳务供应商、企业管理人员、顾客、企业雇员、政府管理部门、公众和竞争对手等, 各个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而 EVA 指标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 如企业债权人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 而在 EVA 计算过程中对有些项目进行了调整, 剔除了会计稳健性等原则的影响, 这样虽能更加真实地反应企业的情况, 但忽视了对偿债能力的分析, 无法给债权人提供所需的信息。

2. 外部环境的局限性

EVA 体系的自身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些制约因素, 又进一步影响了 EVA 体系在我国的实施,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计算方法的复杂性和数据收集的困难性。按照思腾斯特公司对 EVA 值的定义, 要想在中国非常精确地运用 EVA 指标值来评价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评估企业的价值, 要做的调整项目多达 200 多项, 其计算方法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并且, 对 EVA 进行项目调整时会涉及到如商誉、研发费用、市场开拓费等, 由于企业出于保密性考虑是不会向外披露这些关键数据的, 这些数据虽对于企业内部人员来说是方便取得的, 但是对于企业所有者(股东)或者与企业有利益关系的人来说会很难以取得。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 EVA 的应用。

其二, 资本市场的弱有效性。不可否认, 我国近几年资本市场发展迅速, 但其发展程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还是不够完善的。股价的高低有时并不是由企业的绩效而是由庄家的炒作来决定的, 市场呈现弱有效性。这就决定了所用的资产定价模型是建立在这种弱有效性的市场之上的, 而这会导致企业的风险系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完善我国现有 EVA 绩效评价体系的对策建议

在分析了 EVA 绩效评价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我国特有的制约因素之后,本文提出如下几点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供有关方参考。

其一,应将 EVA 与其他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结合起来使用。EVA 在某些方面的评价能力虽强于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但也有不足之处,因此在实际评价企业的绩效时可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将 EVA 与其他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相结合,比如将 EVA 指标体系与衡量企业运营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指标相结合,充分满足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其二,为了解决上市公司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要求,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侧重点,编制属于自己的 EVA 体系指标值,从企业所有者、经营者、投资者的不同角度,考虑选取编制属于自己的 EVA 体系指标值。例如,一般的投资者如果出于复杂程度的考虑,可以用会计净利润来代替 EVA 指标体系中的税后净营业利润等。同时要强化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EVA 指标是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为基础,辅之以财务报表附注等相关信息来计算的,但是,一方面我国对有些项目的披露还很不规范,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主要还是以净利润等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可能会造成企业管理者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等不良行为,这两方面共同影响了 EVA 值的准确性。因此,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有关部门应该规范公司会计行为,强化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内部监督,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法规,加强法规的普及、执行力度。

其三,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在指标计算中,资本成本的确定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正确使用该指标的瓶颈。然而我国资本市场的弱有效性导致风险系数的确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正确使用 EVA 评价指标具有决定

性意义。首先,要大力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完善市场机制;其次,应培育理性投资者,改善投资者结构和素质,减少投机因素;最后,一个完善而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是建立高效资本市场管理体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需要监管部门、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随着资本市场在中国的日益成熟,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EVA 业绩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参 考 文 献]

- [1] 曾利. EVA 的含义与应用[J]. 会计之友, 2008(3): 62.
- [2] Stewart, Bennie. EVA: fact and fantasy[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994(9): 17
- [3] 高展, 杨永涛. 剩余收益与 EVA 探讨[J]. 财会通讯, 2009(8): 25.
- [4] [美] David Glassman. EVA: 公司治理新标准[J]. 林榕, 龙森, 译. 环球企业家, 2001(4): 9.
- [5] 滕晓菲. 基于 EVA 的公司股份合理性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1.
- [6] O'Byrne S F. EVA and market value[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996(1): 116.
- [7] 王波. EVA 的财务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J]. 技术经济, 2004(7): 44.
- [8] 乔华, 张双全. 公司价值与经济附加值的相关性[J]. 世界经济, 2001(1): 42.
- [9] 宋健, 曾勇. EVA 计算中无风险收益率指标选取方法的探讨[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4): 9.
- [10] 王宗军, 杨琳. 综合评价的方法、问题及其研究趋势[J]. 管理科学学报, 2004(1): 75.
- [11] 王平心, 陈琳, 李补喜. 整合 EVA 的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模型研究[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6(2): 186.
- [12] 孔军华. EVA 与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分析[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 [13] 郭加林. EVA 优于传统企业业绩评价方法吗[J]. 会计之友, 2009(3): 6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99-04

新媒体时代连环画艺术的受众认同心理研究

汤梦箫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新媒体的出现虽加速了依托于传统纸质媒介的连环画的衰亡,但也为连环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连环画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其传承与发展只有以新时代的受众为核心,对新媒体受众是否可能认同、在哪些层面上认同的心理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准确定位其审美和消费需求,占得市场先机。经典连环画作品作为一种视觉文化,通过在手掌间形成的虚构空间,培养了许多人最初的文学、文化素养,使他们的视觉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和提升,构建了其关于幻想与现实之关系的体验,连环画作为其童年、青春期的重要情感投射,极易成为被其广泛传播的话题,这将有目的地助推连环画的发展。在以浅阅读为特点的现代都市审美习性中可以寻找到连环画艺术的表现空间:一是对经典连环画进行总结、提炼,将其融汇到当前的连环画创作中,在实现跨阶层有效传播的同时,激发受众积极参与都市文化建构的心理,呈现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二是应基于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崇尚浅阅读、浅观看且阅读观看量大的特点,使连环画的发展适应大众的阅读习惯。另外,新媒体时代的视觉艺术必须调动和尊重受众的主体性,实现话题性与流行的消费文化相结合,利用新媒体的互动性,调动起观众的主体性,使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短时间吸引大众目光,在此基础上再对其进行长线开发,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关键词]新媒体;连环画艺术;认同心理;浅阅读;话题性

[中图分类号] J218.4;G22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8

连环画是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一个故事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兴起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是根据文学作品、传说、故事,或现实生活而编成简明的文字脚本,再绘制成小型画幅而形成的,因其主要读者为少年儿童,因此民间俗称之为“小人书”。除“小人书”外,中国古代故事壁画、故事画卷和小说戏曲中的“全相”等,也具有连环画的性质^[1]。我国的连环画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和改革开放后都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发展势头。可以说,电视在中国普通家庭中普及之前,连环画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满足了受众的娱乐需求,更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引领了时代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1980年代之后,连环画艺术逐渐衰落,仅仅作为一种尘封的记忆,间或被人们回味、品评和收藏。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人们娱乐途径、方式

的多元化,尤其是以视听为核心趣味的中外电影、电视、动画、漫画的引进和快速发展,连环画逐渐退出了大众的娱乐、审美与消费视野,并且这种式微的情况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变得更加严重。但辩证地看,新媒体的出现既加速了依托于传统纸质媒介的连环画的衰亡,也为连环画的复苏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新媒体是指依托于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技术等微电子技术而兴起的媒介形式和信息载体。新媒体既包括网络媒体,也包括传统媒体运用新技术或与新媒体融合而产生或发展出来的媒体形式,如电子书、电子纸、数字报、IPTV等。由于网络自身的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融合,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出现了网络化态势,因此新媒体多指网络媒体。^[2]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已

[收稿日期] 2015-04-28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2CYS012);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汤梦箫(1979—),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影视、动画文化及产业。

达6.3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手机网民人数快速增长,2014年为5.27亿人,首次超越传统PC网民规模。^[3]急剧增长的新媒体消费群体为各种视觉文化、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4],而能否借助于新媒体环境的持续发展找到其新的增长点,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对于连环画在新的时代、文化、媒介环境下的发展,有的研究者经由成功案例的个案分析,从连环画借鉴其他视听艺术尤其是影视叙事方式的角度,试图总结出其发展规律,以供创作者参考^[5];有的研究者以新媒体可能改变连环画传统出版、营销的方式为由,提出连环画艺术的发展除了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更新之外,更要充分发挥数字化出版、营销的优势,建立本土独特的连环画品牌^[6]。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连环画艺术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其传承与发展必须以新时代的受众为核心,因此只有对新媒体受众是否可能认同、在哪些层面上认同的心理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准确定位其审美和消费需求,占得市场先机。鉴于此,本文拟从受众的怀旧型消费心理、都市文化建构的参与性心理、基于互动体验的需求心理三个方面,探究新媒体时代连环画艺术的受众认同心理,以期为新时期连环画的创作、营销和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重温经典的怀旧型消费心理

无论是2010年火爆网络的微电影《老男孩》,还是2013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2014年的《匆匆那年》等电影,都以高收视率、高票房数、网络剪热度高、社会话题广泛等特点,展示了当前文化消费的某种怀旧型心理倾向。“怀旧”一词源于17世纪后期的医学术语,意为“返回故土欲望的那股愁思”,是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大批背井离乡、奔向城市的人们由于空间位移产生的强烈失落感而患上的需要治疗的一种疾病。如今“怀旧”一词则被用来描述一种真诚投入的普遍化的情感需求。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以“70后”“80后”为例,他们已经在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逐渐拥有了话语权。我国的社会和文化政策给予了这两代人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和情感体验:一方面,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必须克服童年和青春期的孤独感,在人之外的事与物中寻找情感寄托,小人书、游戏及后来逐渐普及的影视媒介,都参与了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他们的思维和视野得到了空前扩展,培养了他们善于、敢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与习惯。近些年的文化现象已经表明,拥有共同集体记忆的“70后”“80后”,已经将他

们的怀旧情感渗入文化产品、服装、玩具、食品、日用品等各种商品门类中,而作为新媒体的使用和消费主体,他们更是深谙网络传播的力量,因而一旦有切中其情感体验的文化产品出现,就会经由他们的助推充分释放其能量,在为产品赢得巨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传播、巩固着这一群体的价值观。

然而,与1950、1960年代的前辈们不同的是,“70后”“80后”的怀旧具有更加强烈的能动性和实践性。首先,他们对怀旧的消费欲望大大增加,愿意为自己的情感需求进行资金投入,且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而伴随其童年和青春期成长的连环画,是其最为纯真美好的记忆。无论是古典名著、红色经典,还是神话、民间传说等题材的连环画,都以最为精简、凝练的配色、笔触和线条,勾勒出了最具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世界,看似简单,实则体现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一些连环画名家的作品,更是打破常规、大胆创新,极富创造性和个人风格,如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华三川的《白毛女》、丁斌曾和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赵宏本和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尤劲东的《人到中年》、雷德祖的《斯巴达克斯》等,都努力在大众审美需求与创作者的个人艺术追求间找到平衡。与目前市场上大量存在的重复、同质、缺乏个性和深度的漫画作品相比,经典连环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相较于以前连环画以收藏型为主的消费习惯,新媒体的出现无疑提供给经典连环画虽低廉但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如果能根据“70后”“80后”的怀旧型消费心理进行市场定位和推广,无疑能为这一面临衰落的艺术形式提供新的成长空间。其次,“70后”“80后”怀旧型消费的实践性非常强烈,由于新媒体提供了人们开放、便捷的话语空间,这两代人不仅是新媒体的主流受众,更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其建构过程。一旦某种文化产品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就会拥有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的机会。网站、论坛、贴吧、博客、微博、微信、QQ群等都成了重要的信息聚集地。他们会出于个人好恶积极参与其传播过程,在分享和评价的共鸣中享受公共话语空间的多元化,在充分表达自我意识的同时寻求身份认同,获得情感宣泄的满足。如果说怀旧型消费是这代人的某种群体性积习,就如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习性”那样,那么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能动性和实践性则作为一种新的“习性”,是媒介形式与受众相互制衡的结果,其复杂性和变动性是布尔迪厄不曾预料到的。经典的连环画作品作为一种视觉文化,通过在手掌间形成的虚构空间,培养了这两代人最初的文学、文化素养,使他们视觉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和提升,构建了其关于幻想和现实关系的体验。

连环画作为其童年、青春期重要的情感投射,极易成为其广泛传播的话题,这有助于连环画的复苏。

二、都市文化建构的参与性心理

现代都市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便捷、快节奏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在挤压着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空间,经济的压力、情感的稀缺、信仰的失落等,都使人们对必然性和整体感产生怀疑,转而更信任和依赖碎片、短暂的情绪体验,都市人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缓解现实压力,构建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和谐秩序。新媒体充分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并基于此进行了持续更新的技术开发和产品推广。以与连环画最为接近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漫画——为例。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统计了2013年手机漫画和手机动画的销售指数,结果显示,手机漫画的最高销售指数为3 098 257次,大大高于手机动画的最高销售指数30 957次,而移动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手机动漫运营商,其统计数据能够反映出2013年手机动漫的总体发展状况^[7]。这表明手机、移动电脑等新媒介的屏幕对于展示以“格”为单位的漫画具有先天的优势,且随着移动设备屏幕技术的更新及无线网络的普及,用手指“滑”漫画成为了更为方便、快捷的观看方式,且这与受众日常浏览新闻的习惯一致,更能够迅速渗入其日常生活。

与漫画相比,主流连环画的表现形式仍然以页为基本单位,创作者追求单幅画面传递信息量的相对完整和准确,因此在一页画面中经常安排多个角色、并具备前景、中景、后景多层关系,较少见到漫画中常见的、在表现人物表情细节或营造环境氛围中经常使用的特写或远景等镜头,在角度变化上也不如漫画那样灵活,且画面与文字之间的排版方式较为固定。这一方面是连环画的特征和魅力,即每一页画面都在传递较为完整的情节、人物情绪,充分反映了恩格斯“在典型环境中再现典型人物”的艺术创作观念,给人一种均衡、稳定的美感,经得起在反复阅读中去发现可能被忽略的画面信息,这符合连环画兴盛时期受众的娱乐途径少、倾向于对文化消费品反复品鉴的审美习惯;但在另一方面,却与都市人尤其是年轻人浅阅读、且经由影视、漫画作品反复强化的充满冲突和碰撞的视觉审美习惯渐行渐远。而要让即将湮灭的连环画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必须把握都市人碎片化式的审美接受、情感体验习惯,并根据新媒体的技术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项目设计和开发,从内容到形式更新观念。

首先,应在以浅阅读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审美习性中寻找连环画艺术的表现空间。伴随着中国持续

加快的城镇化进程,愈加丰富的都市阶层和群落彰显了都市文明的包容性,新媒体的出现和受众群的迅速扩张更是加剧了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在给与人们空前信息量的同时,也使都市文化越来越趋于表面化、同质化。在短时间内受众或许会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项感到震惊,从而在迅速的取舍之间获得释放和满足,久而久之就会对这种重复的俗套感到厌倦,这也是浅阅读成为大众化的阅读方式后必然产生的危机。因此,能够在都市的各个主体阶层间得到有效传播、并颇具个性的文化形式,会赢得更强的文化优势。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在谈到媒体与都市艺术时说:“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文化信息,由于与先前的文化内容有联系,更容易被吸收到核心里面。从无所不在的文化循环现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文化循环的过程中,包括来自于高雅文化在内的、来源广泛的形象和叙事因素,被融汇到新的流行文化形式中,被置于以各种方式修正了它们原义的新的语境之中。这个循环过程反映了对新奇或新奇表象的执着的追求。”^[8]新媒体既是当前都市文化的直接反映,也从各方面参与了其构建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和改革开放后取得卓越艺术成就的连环画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和绘画技法,且由于当时连环画的广泛普及,这些形象和符号已被社会各阶层所熟悉和接受,如果能对其进行总结、提炼,将其融汇到当前的连环画、漫画创作中,则会在实现跨阶层有效传播的同时,激发受众积极参与都市文化的建构,呈现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其次,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会在媒介和都市的空间中被放大,一方面凸显了其差异与差距,如国内主要的动漫视频网站,以及主流视频网站的动漫分类,基本都是按照国产、日本完结或新番、美国经典、其他国家的划分方式对动漫作品进行分类,文化的碰撞在屏幕上尽显,这种线上的碰撞随着动漫节、展会、嘉年华、主题乐园等在都市中的涌入而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并参与到他们关于中日、中美文化及时代精神的认识进程中;另一方面在经历了震惊和模仿之后,曾经作为受众的创作者们,则会有更强烈的个性表达冲动,而新媒体恰恰提供了一定的表达空间和渠道。近两年微小说、微电影、微博的繁荣反映了现代人敢于、勇于自我表达和分享的个性特点,这为连环画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尤其是目前已具一定市场前景的微动漫,“用简洁夸张的手法来描绘或演绎生活与社会时事……用变形、夸张、比喻、象征、暗示、影射、调侃,以及跨时空的人物嫁接与互动的方法,构成具有强烈讽刺性或幽默感的画面”^{[2] (P98)}。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目

前已经开展相关业务,旨在实现编剧和绘制者的合作,这也是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崇尚浅阅读、浅观看,且阅读观看量大的必然需求。2014年4月,在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委员会的换届大会上,秘书长李晨表示,经典连环画作品数字化是让传统艺术形式留存、传承的重要手段,但是新媒体提供给连环画艺术的发展空间远远不止于此。就如同年青一代对日韩动漫并不满足,拿起画笔进行自我表达,逐渐使中国的绘本业形成规模并显露个性、锋芒一样,连环画的发展一定要适应现代人的阅读思维。^[9]如果新时代的连环画创作者不对新媒体受众做细致研究,无法将都市的生活百态转化为虚构的故事和形象,那么连环画就只能作为一种经典文化的记忆被保存,从而就此失去自我创新的能力。

三、基于互动体验的需求心理

互动性是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核心特性之一。新媒体可以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实现接受体与信息源之间的互动,这种独特的体验赋予了受众极强的主体性,而这恰恰是面临各种压力的现代人生活体验中最为缺乏的。在传统的文化传播和商品销售关系中,受众和消费者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尽管实际上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创作者和销售者,但由于这种潜在的规律性无法通过显现的互动机制来表达,从而掩盖了受众的主体性。除了掌握话语权的少数人之外,接受体很少能与信息源直接对话,新媒体的出现无疑改变了这种信息结构模式。

2012年7月,肯德基与腾讯的微博连环画合作了一次高互动、自传播的营销案例。微博连环画指的是腾讯微博发布框下方三个话题共同组成的社会化媒体广告位组合。三个话题如同连环画一样,既相互联系又具有一定独立性。拿肯德基的案例来说,在第一个话题中,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酷饮;然后就可以进入第二个话题,与随机抽取的网友分享酷饮;最后可进入第三个话题,将活动信息通过微博分享。三个话题的结合将参与者导入肯德基“有料分享”的官网,从而完成广告内容的完整投放。据统计,有43%的网民看到好友的分享信息后会参与活动,从而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成功营销。^[10]这一成功的营销案例捕捉到了年轻人在视觉上容易被主题性的画面吸引,在心理上爱分享、爱评价,且喜欢模仿和复制网络行为的特点,充分发挥了新媒体互动机制中受众的主体性需要,使一杯普通的夏日解暑饮料承载着共享、快乐、友情、群体认同等情感,从而赋予单一的消费行为以多重的满足感。

可见,新媒体时代的视觉艺术必须调动和尊重受众的主体性,连环画也是如此。当代连环画要重新复苏,更需要借助于受众的主体性才能完成。因为相较于电影、电视、动漫,以及其他流行的网络视觉文化,连环画与“90后”乃至更年轻的受众存在着一定的隔膜,而他们又是新媒体潜在的使用和消费群,蕴含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但仅仅依靠在网站发布作品、等待受众点击的传播模式,连环画作品很容易淹没在大量同类的日本及国产漫画作品中,其生存空间是相当狭小的,而实现话题性与流行的消费文化相结合,利用新媒体的互动性,调动起观众的主体性,是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短时间吸引大众目光的有效策略,在此基础上再对其进行长线开发,能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与许多传统艺术形式一样,作为视觉文化产品存在的连环画艺术,其当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重重困境。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众群体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应根据其对连环画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喜好、习惯做出科学的、更加深入细致的定量定性分析,这对连环画的创作思路和经营模式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彩图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820.
- [2] 尹韵公,刘瑞生.成长中的新媒体:虚拟和现实社会的冲突和融合[C]//尹韵公.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3] 中研网.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EB/OL].(2014-07-21)[2015-03-21].<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721/161320934.shtml>.
- [4] 张福平.自媒体情势下的艺术生长[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0.
- [5] 高永利.借鉴·创造:从《魔王》看连环画艺术与影视叙事技巧的融合[J].装饰,2012(2):98.
- [6] 魏美荣.连环画出版“中兴”,路在何方[J].出版发行研究,2013(5):47.
- [7] 卢斌,郑玉明,牛兴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9.
- [8]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
- [9] 中国青年网.新媒体时代连环画何去何从[EB/OL].(2014-04-28)[2015-03-21].http://g.youth.cn/z/201404/t20140428_5105806.htm.
- [10] 凤凰网.“微博连环画”翻开“广告内容化”营销[EB/OL].(2012-08-05)[2015-03-21].http://tech.ifeng.com/internet/detail_2012_08/05/16560919_0.shtml.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103-06

傣族佛幡艺术符号类型研究

果霖¹, 苟双晓², 张雪萍¹, 张天会¹, 徐人平³

1. 云南农业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1;
2. 重庆文理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重庆 402160;
3. 昆明理工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傣族原始宗教化、原始宗教佛教化、佛教傣族全民化,三位一体,深深地贯穿于傣族的历史和文化生活中,而傣族佛幡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鲜活地呈现了这一文化交融的现象。从符号指称对象的角度,即从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种类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绚丽而神秘的傣族佛幡艺术符号。傣族佛幡艺术作为一种图像符号,在内容上多取材于大自然,以客观自然物的生态形状为原型进行仿生、演变等,具有仿生性;又由于织锦佛幡编织工艺按纵横(斜)向的数学规律整合处理,并对图像进行适形简化抽象,傣族佛幡在形态上多为几何形。傣族佛幡艺术作为一种指示符号,传达、展现和宣扬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义精髓和佛教思想,具有指示教育性;根据材质和工艺,可以区别不同地区的佛幡,具有指示区分性。傣族佛幡艺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佛幡上有佛塔、殿堂和亭阁等建筑物图案,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具有宗教的神圣性,是一种神圣的象征符号;其用鲜活的生活与景物阐释宗教内涵,充满世俗味和人间情,是一种世俗的象征符号。

[关键词] 傣族佛幡;艺术符号;仿生性;几何性;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

[中图分类号] J52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9

在傣族的历史上,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灵物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作为傣族的原生宗教,与傣族原始社会、原始先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傣族创世思想和文化艺术的源头。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作为一种比原始宗教更加先进的文化开始进入到傣族人民生活中,并得到迅速的传播与发展。但原始宗教留下的深深烙印并没有因此而磨灭,反而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之后,与之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傣族原始宗教化、原始宗教佛教化、佛教傣族全民化的局面,并贯穿于傣族的历史和文化生活中。傣族佛幡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鲜活地呈现了这一文化交融的现象^[1],因此,研究傣族的佛幡艺术符号,对研究傣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傣族佛幡艺术符号的类型,是理性解读傣

族佛幡艺术的一条重要途径。探讨傣族佛幡艺术符号的类型,可以更好地了解傣族佛幡艺术的表现形式、内涵意义、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傣族佛幡艺术符号的分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所用媒介的特点,可将其分为性质符号、单一符号和规则符号;根据符号的解释关联性,即从符号取得意义的性质,可将其分为名辞符号、命题符号和论证符号;根据其表现内容,可将其分为自然类符号、生活类符号和装饰类符号;根据符号指称的对象,可将其分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由于在傣族佛幡艺术视觉符号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不是把什么当作符号,而是创作符号的方式,因此从符号指称对象的角度,即从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种类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绚丽而神秘的傣族佛幡

[收稿日期] 2015-07-02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N201408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3YJC720049)

[作者简介] 果霖(1986—),男,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农业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民间工艺、设计艺术。

[通讯作者] 张天会(1973—),女,云南省镇雄县人,云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民间工艺、民族艺术。

艺术符号^[2]。以往对傣族佛幡的研究或是从其工艺制作手段和题材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分类,或是探讨其纹样的类型与艺术特点,较少从符号学角度对傣族佛幡艺术展开分类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在探讨傣族佛幡艺术符号的类型基础上,探析傣族佛幡艺术的表现形式、内涵意义,以期对傣族佛幡艺术研究提供参考。

一、傣族佛幡艺术是一种图像符号

图像符号是通过“形象相似”的模仿或图似存在的事实,借用原已具有意义之事物来表达它的意义^[3]。这是一种原始的意义表达方式,直接、简单、清晰、明了,表达性强,识读性好,因此人类的原始艺术都竭力使用大自然的原始形象,表达所欲代表的意义。傣族佛幡艺术即是如此,其作为一种图像符号,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1. 仿生性

傣族佛幡表现的内容多种多样,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仿生。傣族佛幡反映的内容与其居住环境密不可分,即取材于大自然,以客观自然物的生态形状为原型,再对其进行仿生、演变、推理、扩展、适形等,以形成图像符号的基本素材,并以此为基础,应用白、红、黑、蓝、绿、棕等各种鲜艳的色线,编织出诸如孔雀、大象等动物

类纹饰,寺庙、亭塔等建筑类纹饰,以及树木、花草等植物类纹饰。

孔雀纹(见图1)是傣族佛幡中最常见的一种图案。孔雀在傣族地区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其典故又来源于佛教的教义故事: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他的四个兄长不相信其能成佛,并与其打赌,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其兄长便履行诺言,赌手者缺手,赌头者成龙,赌身者成凤,赌尾者成孔雀。因此,孔雀在佛教中有告诫教徒对佛祖要信任、虔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之寓意^[1]。而傣族佛幡中的孔雀纹则又是仿生的结果,据说景洪坝子历史上曾经是成千上万孔雀聚居的地方,因此,西双版纳被称为“孔雀之乡”。傣族佛幡中的孔雀纹是傣族信徒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将孔雀最引人注目的部位(头冠和屏羽)进行夸张处理、其他部位缩略简化而形成的。高高昂起的头部、张开散布的羽尾,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孔雀的特征,并使孔雀的美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4]。

乘象纹(见图2)是对傣族人乘象出行的艺术写照。在傣族地区,象纹不仅在原始宗教中经常出现,而且在佛教中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是忠诚、和善、友好的象征,也作为神兽在佛教的教义中出现,它是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承载体^[1]。另外,象纹也反映了傣族一定时期的社会风俗和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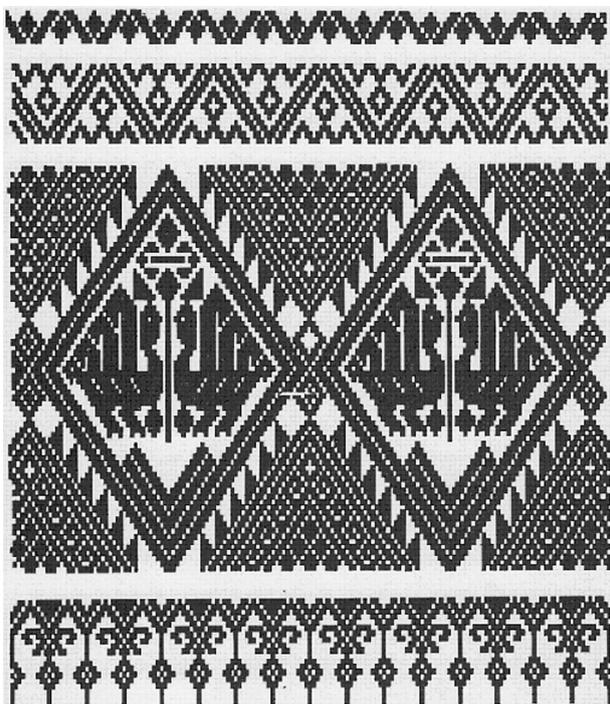


图1 傣族孔雀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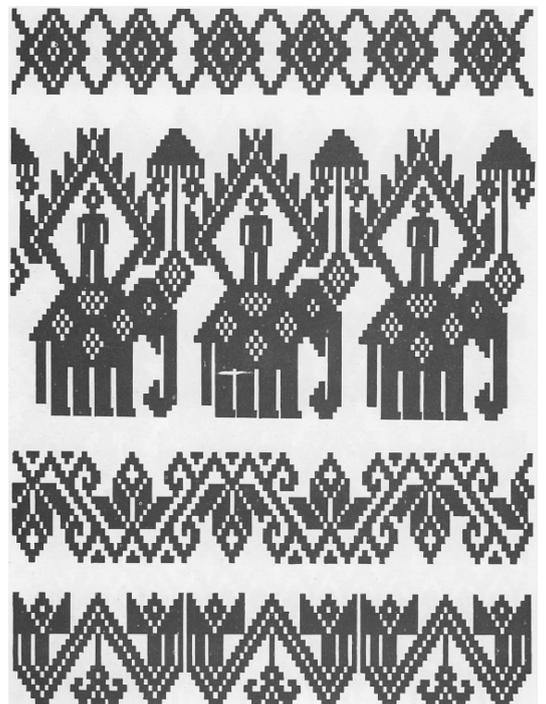


图2 傣族乘象纹

事实。傣族自古就崇拜象,并有养象之习俗,早在唐朝傣族即有养象以耕田的记载,而宋代以后傣族又有以乘象为贵的风尚。乘象纹图案中的象驮宝塔房或象驮颂经亭等纹饰,俨然就是过去“乘象出巡”场面的记录和重现,显得威风凛凛,富贵高雅。这样的仿生图像在其他地区是找不到的。

2. 几何性

傣族佛幡在形态上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但其最大特点可以归属为几何性,特别是对于织锦佛幡来说。几何学从数学的角度来研究物体的形状、大小、位置,以及点、线、面、体的性质,几何形图像符号就是运用几何关系作为基本配置协调关系、遵循美学原则、体现形式美的规律、以几何学的排列和组合方法作为基本构成方法而形成的图像符号。

傣族佛幡图像符号(特别是织锦佛幡图像符号)的几何性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织锦佛幡的工艺特点。织锦佛幡是通过经线与纬线的线型交叉编织而成的,巧妙利用色线的拼接组合来表现事物的色彩、形态、肌理等纹样符号信息。因此在织锦佛幡的织造工艺条件下,比较容易使用那些以 45° 及其倍数角构成或转折的直线条,比较容易形成那些色彩对比清晰明确的图像符号。例如,马脖子和身体成 90° 或 135° 方向的衔接,多采用侧面剪影式、在大的实体面积中(如马身体部分)加些点的处理方法,避免出现跳经过多而导致的超长浮纬,继而影响牢度。这种按照工艺性和实用性而采用的艺术处理手法,可以说是形成织锦佛幡图像符号的几何性和装饰手法的重要原因。因此根据织锦编织工艺,按照纵横(斜)向的数学规律加以整合处理,形成了诸如直线(竖直线、横直线、斜直线)、弧线、曲线、圆圈、方形、菱形、三角形等兼具仿生与简洁明快特征的图像符号。二是适形简化抽象的结果。傣族佛幡图像符号不仅注意形似,更强调神似,其处理方法是一个适形抽象的过程:为了适应织锦工艺的技术特点,常常对于真实图像抽象简化,对其作出相应的形态变化,进行一定的形体调整,从而得到简洁明快的几何图像。然而其语义传达仍然是建立在指示和象征基础上,图像发生扭曲,甚至是变异,具象符号随着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内涵来说,适形抽象并不会影响对其内在神似的表达。例如,对于织锦绕线板单位纹样符号,在简化抽象过程中,有的框架趋于方形,有的框架趋于菱形,但无论是方形框架还是菱形框架,均不会影响绕线板这一图像符号的语义表达。

二、傣族佛幡艺术是一种指示符号

指示符号具有逻辑类似性,即通过因果逻辑,在时间、空间和逻辑上构成指涉关系,使人明白其内在意义。傣族佛幡指示符号同样具有逻辑类似性,其在表面形式与所表达的语义内涵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和实质性关联。从指示功能的角度来看,傣族佛幡艺术既是具有指示教育性的指示符号,也是具有指示区分性的指示符号。

1. 指示教育性

傣族佛幡指示符号的特殊性源于宗教活动形成的指示教育性及其指示教化性效果,主要体现在傣族佛幡的特殊用途上。傣族佛幡在现实社会中常被用于朝供与祭祀佛祖,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最常见的和信徒供佛啖佛用得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悬挂式艺术品。根据佛教教义:通过啖佛可以洗刷个人犯下的罪行,并且多啖多得福,少啖少得福。这种图案精美的傣族工艺品在祭佛啖佛的同时,都极大地通过构图来传达、展现和宣扬南传上座部佛教主张的“行善积德、啖佛升天”的教义精髓和佛教思想。这种啖佛宗教活动的规定性,以及“行善积德”的指示教化作用,使得佛幡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形成了必然的逻辑关系。

傣族佛幡(见图3、图4)一般为长条形,多数宽度为 $20\sim 35\text{ cm}$,长度从数米到十余米不等,上织花纹图案,绚丽多彩,是佛教信徒拜佛祭佛、祈求吉福、表达心愿的一种承载物,是佛教信徒对贝叶经中所载历史、典籍、文学故事等内容艺术化解读,同时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对佛教信徒进行指导宣传教育的一种方式^[5]。

根据傣族佛幡的题材内容,可以将其宣传教化的主题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劝导信仰虔诚,一心向佛。用一切方式敬佛颂佛,赞颂至高无上的佛祖,崇拜佛祖,要求信徒始终严格遵照佛祖的修习言教,将佛祖的本生故事融入到傣族的民间神话传说中,在内容上经常以《释迦成佛图》《佛祖在菩提树下传经》《五位佛祖》《众僧聚会讲经图》等佛教故事、佛教典故、佛教教义为题材,在表现方式上或者直接出现佛祖形象,并以象征佛的菩提树、大青树、莲花、花蔓作为陪衬;或者以佛塔、佛寺等佛教建筑作为象征;或者用传说中佛的化身和使者的孔雀、大象等吉祥物进行表示。总之,时时刻刻、随时随地把佛(或佛祖)放在宣传的中心地位。



图3 傣族佛寺长幅佛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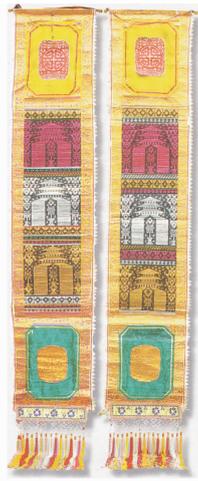


图4 傣族佛寺图案佛幡

第二类是告诫因果报应,一心从善。以因果关系劝告人们弃恶从善,时时不忘赎罪,以求来世安宁美好。按照佛祖的说教进行修行,在具体的实践中主张自我解脱、自我拯救,以达到自身的解脱^[6]。最典型的是根据经书《坦力落》绘制的“天堂地狱图说”佛幡。按《地狱变相》的内容,将画面分成上中下三格:上格,绘天堂,凡十六层,其上又有一最高的境界;中格为执法之诸神,据死者生前的善恶,判其上天堂或下地狱;下格面积最大,以示“天堂门窄,地狱路宽之意”^[7]。这些内容的宗旨都是劝人要寂静苦修、赎佛积善、修行来世,如果今世不布施、不行善,来世将受到打入地狱、转生成为饿鬼畜牲的惩罚。人只有在现实中克服自身的种种欲望,修到最高层次——阿罗汉,才能得道。在苦中才能获得拯救,也只有从不断循环的死与生的轮回中才能获得解脱,并且达到“涅槃”。

第三类是明示慈悲为怀,一心求和。借佛经故事、神话传说对信徒进行善性劝说,宣传佛教慈悲济世、关爱生命、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基本要义,告诫信徒要有一颗宽容、忍让之心^[8],争取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这些佛经故事主要来源于《中国贝叶经全集》第1卷汉译本《佛祖巡游世界》(即经典著作《帕召列罗》),里面既有许多佛祖在不同转世期间的故事,也有“维先塔纳善施”“佛祖过海传教”“舍生饲虎”“五位佛祖”“佛法斗妖魔”“佛祖悟道成佛”等充满了佛教色彩的故事,除了宣扬佛教的力量外,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直接进行佛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教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有“白牛公主”“孔雀公主”“葫芦信”“召树屯”“召相勐”“娥并与桑洛”等故事,同样一心求和,宣

传和谐、乐施好善,起到净化心灵、教化信徒的作用。

2. 指示区分性

指示符号的重要功能是其指示区分作用,即向受众展示某种意义或信息,区分某些情况或类别,识别某个空间或时间。傣族佛幡艺术的指示区分性体现在其可以根据材质和工艺,区别不同地区的佛幡,如临沧地区的刺绣佛幡、德宏地区的剪纸佛幡、西双版纳的傣锦佛幡。

临沧地区的刺绣佛幡,傣语称作“董”,其基本特点是明快艳丽。“董”的内容往往是佛经故事,按故事的情节精选出四个画面,用四幅连环画的形式来连续表达。其方法是每个画面用两块高9 cm、宽21 cm的刺绣片,正反两面订在一块高130 cm、宽21 cm的缎面的下端,不同色彩的绸缎剪成锯齿形钉在两侧装饰,艳丽的丝坠下垂在刺绣片的下端,色彩配置讲究强烈明快,大多选用朱红、桔黄、中铬黄等暖色调作底,整张刺绣片又用银线和金线绣上各种纹样轮廓线作边,以达到单纯中显得丰富、对比中求得和谐的效果。

德宏地区的剪纸佛幡,傣语称作“幌”,其基本特点是生动淳朴。长幌悬挂于佛寺院内十几米高的凤尾竹高杆上,竿头有的是用各种彩色剪纸、绸布等精心制作的华丽彩亭、宝盖加以装饰,目的是为了祈福;有的是用素白色的纸扎作为装饰,目的是为了追念亡灵。形似飘带,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在佛寺中随风飘扬,散发出一派佛意,被认为是灵魂通向天堂的阶梯,成为傣族佛寺的一种象征,也是傣族的一种精美的工艺品。

西双版纳的傣锦佛幡,傣语称作“焕”,其基本特点是精美考究。“焕”一般宽35 cm,长约150~

170 cm,悬挂于寺内大殿佛的两侧,成对配置,也有的长达数丈,从寺庙顶一直拖垂到地。纹样内容极为丰富,编织技艺十分精湛,装饰画面多与佛教有关,以佛塔建筑为主,配以各种与佛教传说有关的人物,以及有吉祥意义的动物、植物,还有亭台、楼阁等,其纹样结构、图案造型、色彩搭配等均可以说是集傣锦精华之大成^[4]。

由于材质、加工工艺的不同,傣族佛幡在纹样、构成、色彩上表现出极大差别,呈现出艺术符号的指示区分性功能。

三、傣族佛幡艺术是一种象征符号

象征是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的一种认识方法。象征符号与其代表的对象之间并没有相似性或存在性的关联,它们之间既无因果相承的关系,也无必然或内在的联系,其表征方式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或人们共同意向的基础之上,是基于传统原因而约定俗成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

傣族佛幡艺术符号不仅是傣族展示美的形式,同时也是傣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傣族佛幡中的每种动物、植物纹样都隐藏着一个优美动听的故事传说和古风遗迹,每一个图案纹样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英国人类学家科恩把象征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是神圣的象征符号,另一种是世俗的象征符号^[9]。傣族佛幡艺术中同样存在着这两种象征符号。

1. 神圣的象征符号

德国宗教哲学家鲁道夫·奥托在《论神圣》一书中把“神圣”定义为“是一个宗教领域特有的解释范畴与评价范畴”^[9]。傣族宗教祭祀用品佛幡上有佛塔、殿堂和亭阁等建筑物图案,因为这些都是供奉于神的象征符号,主要用于宗教仪式,有其宗教的神圣性,绝对不能应用于家庭日用品上。傣族佛幡上还有许多与佛教相关的象征符号,如象征吉祥、圆满的五树六花(五树:槟榔树、大青树、铁刀木、菩提树和贝叶棕,六花:黄姜花、文殊兰、鸡蛋花、黄缅桂、睡莲、地涌金莲),这些都是傣族佛教文化的象征物和代表物。用纹样来代替文字作为象征符号,用于宗教仪式,目的是让佛徒不忘佛祖的教诲,具有特殊的神圣性。对这些神圣的象征符号的创造、制作、传承,以及应用,表达了傣族佛幡视觉符号的独特性和艺术性。

2. 世俗的象征符号

“世俗”与“神圣”这一概念如出一辙,都与宗教有着直接的关联。根据《韦伯斯特大辞典》的解释,

“世俗”一词的意思是“属于或关于现世和尘世事物的,与教会和宗教事务相区别”,世俗化就是宗教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丧失影响的过程,表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阻碍而日趋理性化^[9]。

傣族佛幡艺术虽然具有宗教属性的一面,但南传佛教艺术本身并不像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教条冷漠地刻画阴森的宗教氛围,而是用鲜活的生活与景物阐释宗教内涵,因此傣族佛幡符号也有充满世俗味和人间情的另一面。身处气候温热、水源充足、土地富饶、风光秀美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的傣族不缺乏鲜活的生活与景物,加之民间创作活动的普及,活跃了傣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启发着傣族民间艺术家的思维活动,他们创作出的佛幡图案不仅是单纯地摹仿自然景物,也是对生活的新认识,同时也加进了手工艺者许许多多的主观想象和希望的成分,这使得傣族佛幡符号有了丰富的寓意性和象征性。

例如,傣族佛幡中的孔雀文化符号,是综合生存环境、风土人情和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傣族居住地区气候适宜、雨量充沛、雨林茂密,适宜热带动物生息繁衍。历史上傣族就有饲养孔雀的习惯,尤其是景洪地区孔雀较多,有“孔雀巢入空树上”之说,因此被称为“景咏”(孔雀城)。长期以来,傣族人民一直认为孔雀美丽、善良、智慧、吉祥,把孔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且认为,孔雀沐浴时,总要抖落羽毛上的水珠,水珠落在动物身上,就健美长寿,六畜兴旺;落在地上,明年就五谷丰登,因此对它怀有虔诚的崇敬之情。

在傣族佛幡中还有许多用大自然里的动植物形象来表达美丑、象征善恶的世俗象征符号,如高洁的荷花、亭立的槟榔、艳丽的睡莲、庄重的大象、威严的麒麟、圆润的蕨菜……这些象征符号与其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和世俗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傣族社会劳动生活的反映,表达着人们对和平幸福的美好追求与向往,并应用于世俗礼仪中。

四、小结

傣族佛幡艺术符号按视觉符号对象的关联性可以分成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种类型。对于符号的类型来说,这三种符号的概念是有明确定义的。但对于具体问题,这三种符号类型的分类并非泾渭分明、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强调符号对象关联性的重点不同:图像符号是强调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形态相似性(二者有相似性关系);指示

符号是强调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逻辑联系性(二者有存在性关系),既不是由于形似也不是由于社会习惯或约定,而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的因果逻辑联系;象征符号是强调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约定俗成性和“非理据性”(二者有任意性关系),是意指性联系。

从符号的划分来说,这三种符号类型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从不同角度,可以把一个符号划分为不同的符号类型。例如,傣族菩提双鸟纹的织锦(见图5),从符号对于对象的模拟性质上来说,它具有仿生的几何性,是一种图像符号;从符号与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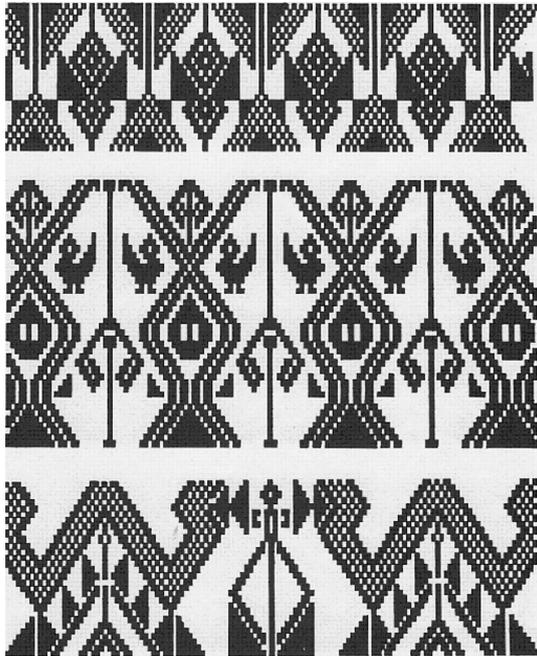


图5 傣族菩提双鸟纹织锦

达对象之间的逻辑联系上来说,其既有指示区分性,又有指示教育性,长期服务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一种指示符号;从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约定俗成性上来说,尤其是菩提树纹样,寓意佛主释迦牟尼的“说法”,象征圆满、吉祥,又是一种神圣的象征符号。

正因为如此,傣族佛幡艺术符号可以通过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等不同的符号类型来传达不同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井菲,郝云华,赵媛媛. 西双版纳傣族织锦及其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运用[J]. 中国报业,2012(16):32.
- [2] 徐恒醇. 实用技术美学[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54-59.
- [3] 胡飞. 工业设计符号基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4-98.
- [4] 钟茂兰. 民间染织美术[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71-72.
- [5] 伍琼华. 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石——中国南传佛教壁画在民族教育中的作用[J]. 思想战线,2007(6):74.
- [6] 牛军. 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审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0-208.
- [7] 欧阳磊. 西双版纳傣族佛寺壁画的艺术形式[J]. 大众文艺,2012(17):205.
- [8] 吴之清. 贝叶上的傣族文明:云南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社会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2-128.
- [9] 龚锐. 圣俗之间——西双版纳傣族皈依佛世俗化的人类学研究[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1-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109-04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人才云空间培养模式探析

肖慧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艺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00)

[摘要]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模式单向被动、课堂环境亟待优化等问题。基于云空间的培养模式具有开放性、主动性、协作性强等特点,可共建共享云空间教学资源群,践行“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教学方法,创建健全的教师教学管理体系,以提高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云空间;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20

随着云技术的发展和渐次成熟,其在国外教育领域受到高度重视。自“世界大学城”项目引入高职院校以来,我国不少高职院校开始酝酿教学形态的嬗变,建立优质的教育资源群,搭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平台,构建以云空间为载体的绿色生态低成本教学形态已成为一个崭新的方向。但由于我国职业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简单照搬国外或本科教学形态并不适合我国高职艺术设计教育现状。鉴于此,本文拟以艺术设计专业为例,以云空间的教学形态改革现有教学模式,以提升教学质量,培养符合社会需求且具有较高素养的艺术设计人才。

一、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培养模式存在的不足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因此,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的教学必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注重技能与实践的培养。艺术设计专业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教学需要体现自身的特色,而传统的教学模式拘泥于陈旧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早已不能满足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教学内容陈旧

随着社会的高速和多元化发展,高职院校专业教学只有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与时代和社会接轨。然而,由于缺乏完善配套的机制和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内容出现了滞后性。由于教学内容不能接触学科专业最前沿,无法适应最新型的教学模式、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致使本来要突出实用性和专业特色的教学活动达不到预期成效,特别是艺术设计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新工艺、新风格、新理念,与陈旧不变的教学内容格格不入,导致学生不能学以致用,进入社会后仍需“回炉”,这不仅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严重脱节。

2. 教学模式单向被动

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采取单独招生政策后,从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生源不足的问题,但也降低了学生从事专业学习的准入门槛,部分学生美术素养相对欠缺,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更多是重讲授、轻实践,这种单向被动的教学模式使学生长期处于涣散的学习状态。另一方面,不少教师忽略了对学生课堂教学的评价和反馈,教学反思和教学总结活动较少,学生不能在课余时间与教师进行广泛交流,教师也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对教学的意见或建议,

[收稿日期] 2015-06-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XJK014BGD013)

[作者简介] 肖慧(1983—),女,湖南省长沙市人,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这种单向被动的教学模式使学生逐渐丧失了主动思考、主动观察、主动学习的能力,导致基本功不扎实的学生丧失信心,无法通过“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提高自己专业素养。学生的专业基本功不扎实已成为提高专业水平的瓶颈,也成为部分高职学生就业竞争能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3. 课堂环境亟待优化

传统课堂教学形式除了板书之外,当下使用最频繁的就是多媒体课件。多媒体课件虽然能通过视频和图片直观地呈现教学内容,在视觉效果上要优于板书,但不能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创新精神和综合能力,结果使学生的创新思维被禁锢,作品频繁出现山寨设计,连抄带改,毫无创意,没有应有的学习成就感,教师也无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设计资源引导学生学习。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实现信息化教学手段与社会需求接轨,打造一个无时空限制、资源共享、互动有趣的教学环境,营造学生爱学、老师爱教的教学氛围,已成为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一线教师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艺术设计专业云空间教学的特色和内涵

云空间是借助 Web 2.0 和云计算技术,依托云平台按照电子身份证号配发的、基于实名的个人学习空间,包括世界大学城空间、QQ 空间、微博、微信等网络学习及在线互动平台,它以网络交互远程教育为核心,综合了远程教学、全民媒体、个性化数字图书馆等功能。云空间新型教学形态是实现传统教学转型的突破口,与传统教学相比,云空间教学不仅是内涵、理念的创新,更是形式方式的变革。“90后”大学生尤其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类多媒体设计软件和网络辅助平台,他们对其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另外,由于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更新日益加快,为与社会需求接轨,云空间的无时空限制的优势,能更好地满足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灵活性和互动性。

1. 打造无时空限制的开放式课堂

云空间新型教学模式,可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提供完全开放的学习环境,解决教学资源发布中的信息孤岛问题,使学生能及时利用手机、电脑和网络形成一个360°的信息多元空间,如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可在手机云平台上实时更新设计行业内的重大新闻,掌握视觉设计的流行趋势;人物形象设计的学生则能在微博或QQ空间及时翻看四大国际时装

周发布的高级时装定制新款和走秀视频,为服饰搭配整体造型做出相应调整;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及时查看楼盘装修施工的第一现场,以及利用微信平台熟悉市场装修材料的更新情况等。这些交互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摆脱了时空限制,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总体设计能力,同时也为师生提供了大量个性化的服务。

2. 实现教学资源多元化协作共享

云空间的共享可让所有的学习者得到平等学习的机会,改变了传统网络简单的“阅读”功能,突破了传统纸质媒介对信息储备的局限性,每一位师生既是教学素材的采集者,也是其使用者和享受者,为教师和学生共享资源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便捷性。云空间既可以承载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形式,还可以实现收藏、分享、发布等多个功能,集多种媒体之长,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充分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云空间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强大的、海量存储的信息储备库中查找各自所需的知识,轻松实现自助式学习,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微博空间、QQ空间的视频直播、电子教室、师生群组讨论、即时通讯、博客、播客等多个强大功能,掌握最新的动态和丰富的影像资源。

3. 促进教学互动与个性化指导

云空间能真正把艺术设计类专业的设计思维、创作技巧与教学实践有机融合,成为师生日常教学活动的综合性载体;可将师生的教与学、教与教、学与学全面链接,并形成良性的生态圈。基于云空间的平台和工具能通过即时通讯、集体讨论等功能使师生之间的互动变得畅通,促进了师生的平等化,也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一种新型高效的教学模式。特别是对艺术设计专业而言,云空间互动教学能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和个性化指导,使学生能以工作室、设计小组等群组形式得到专业教师的分类指导,使以作品拍卖和创意设计为龙头的“契约制”竞赛能带动教学相长,实现产、学、研、做有机结合,真正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老师的具体指导。

三、艺术设计专业云空间培养的基本思路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强调市场业务性、教学实践性、技法务实性,有自身独特的教学规律和

教学模式,其培养的学生既要有艺术设计思维能力,又要具备动手制造创新能力,这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师教学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设计专业云空间培养可按以下基本思路来进行。

1. 共建共享云空间教学资源群

建设云空间教学资源群,是推动主动式、协作式、研究型、自主型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的重要途径。通过共建共享裙带式教学资源,能为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平台,较好地发挥优质教学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实现专业教学质量的均衡发展,提升专业教学质量,因此,它是整个教学的重中之重,其优劣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云空间开放式教学资源群建设是一个资源积累和使用推广的过程,不能简单理解成一个扩容平台而轻易导入一些简单资源,应该由专业教研室主导、学生团体和合作企业支持共建。新建的云空间教学资源群应是包含各类资源管理与共享,支持日常教学活动和教学管理,涵盖硬件、软件、信息等综合资源,兼容并蓄设计基础、素材采储、工学实践、技能认证等的资源群。

其一,共建共享设计基础教学资源群。应以艺术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标为依据,将课程教学设计、课程教学课件、课程教材包含的设计理论、案例分析、手法技巧、软件应用等相关图文视频,纳入基础教学资源库建设的设计中,建立规范的教学资源运用基本形式,统一属性列表和接口标准,缩短共享教学资源检索的时间。

其二,共建共享素材采储教学资源群。应将采风作品、示范作品、学生优秀设计作品、大师作品,包括图像、图片、文字等各类素材,根据艺术设计专业特点,按不同的分类方式重新归类、存储,优化系统结构,以有效支持学校精品课程或特色教学单元的再开发,提高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

其三,共建共享工学实践教学资源群。为满足艺术设计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资源库建设应囊括知名企业、合作企业、实训基地、企业兼职教师、设计案例等,也应包括岗位能力标准、行业法规、企业文化、招聘信息等资源,使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落到实处,使学生明确学习方向和目标,以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其四,共建共享技能认证教学资源群。要按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来建设技能认证教学资源库,形成对学生或社会开展专业资格认证的平台,收集和整理有关专业不同等级的职业标准、相关政策法规

等资料,开发各类不同等级的技能培训资源包和在线测试系统,为高职“双证”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学平台。

2. 践行“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教学方法

在传统模式的“教”与“学”中,教师是主体,学生作为客体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没有积极性的学生往往掌握不了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而在云空间教学模式中,教师主动把课堂还给学生,在教学方法上打破“教—学”的单向模式,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教学方法,比照企业运营模式,营造良好的教学和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具体可采取以下方法。

其一,自主学习法。学生是云空间教学改革中的主体,云空间教学改革全面支持教学开放模式,学生在云空间条件下拥有自己的用户端,教师可以采取任务式教学,按教学进度分时段设计不同的空间任务,学生可以通过教师空间设置的学习流程,自主选择时间与地点进行学习,并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教师可随时检查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及时答疑和引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云空间的自主学习功能,培养学生想学、会学、恒学的自主学习能力。

其二,以赛促学法。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相关职业技能竞赛,通过云空间内部交互系统进行竞赛交流,这是检验云空间教学改革成效的手段之一。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特色就是创新和创意,其培养的学生也必须具备独立设计作品的的能力,以赛代练、以赛促学,是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市场适应能力的有力措施,可使学生通过比赛获得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制造的实际转化能力。

其三,团队协作法。在云空间教学中,实施对象主体既是学生个体更是学生群体。与其他专业学生相比,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个性突出,独立创作的行为特点更为显著。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采取团队协作教学法,能锻炼学生集思广益的作品设计能力。在云空间交互平台中,教师可将学生按照专业相关的设计项目,分成不同的团队或工作室,布置集体任务,由设计团队完成相应考查作业,教师和学生可随时查阅完成进度和团队成员参与程度。

其四,项目驱动法。云空间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牢学生专业基本功,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满足高职院校学习即实战的教学要求。高职院校一般多与企业合作办学,而艺术设计专业行业

领域也比较广泛,在三年学习时间内,学生实训会接触企业的市场设计项目,利用云空间的工学实践教学资源库和交互系统,由学生个人或团队竞标参与企业项目设计,再由校企专家在云空间匿名评选,中标项目经包装或演示推向市场,形成校企共赢的教学良性循环。

3. 创建健全的教师教学管理体系

其一,创建360°多元空间教学群。应以任课教师的空间为基点,利用学生团队、企业技师、职教专家和同行教师等一体空间创建360°多元空间教学群。由于专业、学历层次不同,以及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空间教学群的组建应进行充分的学情调研,制定教学管理制度,选择负责的群带头人,引入空间教学竞争机制,同时还可通过建立职教专家、企业技师等空间导航资源,邀请职教专家、教学同行入群,共同参与空间课程开发和教学实施,让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能随时随地在云空间教学群中参与讨论、无障碍学习,切实保障多元化人才培养质量。

其二,创建教师教学质量考评制度。教师的教学质量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云空间教师教学质量考评制度的建设,应通过专家、领导干部、同行和学生组成的教学能力评估组,遵循科学、全面、民主的原则,通过视频听课和系统信息反馈等途径,全面监控任课教师课上课下教学答疑的全过程,按照一定的权重对教师的教学思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师素养等多方面进行系统的测评,然后上传到云空间数据库,经过综合分析,得出教学质量评估结论,最后将该结论反馈给各个教师,以使教师能更加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根据建议合理地调整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全面个性化的发展。

其三,创建云空间师资发展中心。借助云空间创建院校与媒体、院校与院校、国内与国外开放互动的师资发展中心,是促进专业教师团队开拓视野、深度学习的优良模式。从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需

求和教师专业水平提升的视角出发,实施师资培养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科交叉培养计划和教师职业技能认证提升计划,通过跨学科、跨专业课程的交叉学习,培养教师交叉学习的自觉意识,提升教师开展专业方向合作和团队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以云空间教学资源 and 教学课程群协作开发为切入点,以云空间中的优质课观摩、公开课评议、教学比武、企业考察等教研活动和资源为载体,创建云空间教学特色师资培养机制,进一步提升教师教学科研、实践生产能力,促使专业教师不仅从知识层面上更从教学生态上坚持深度学习,提高教师职业修养和专业水平。

四、结语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而云空间下专业教学模式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基于云空间的专业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次革命,通过云计算技术与教育的结合,可促使师生教学相长,打破教学资源整合开发的壁垒,成就教学团队的互联协作和可持续发展。基于云空间的教学模式改革,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管理领域的应用必将越来越广泛。

[参 考 文 献]

- [1] 李培根.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J]. 中国高等教育,2011(22):8.
- [2] 马树超,范唯. 以专业改革与建设践行高职教育科学发展[J]. 中国高等教育,2009(8):48.
- [3] 王文娟. 艺术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6):68.
- [4] 孙德惠. 关于艺术设计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134.
- [5] 周斌. 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探析[J]. 教育探索,2010(12):91.